

47535

54010

270110

一个老根据地的人民公社

——山东范县龙王庄人民公社史——

中共龙王庄人民公社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下放干部劳动锻炼

山东小组

合编

农业出版社

011475

一个老根据地的人民公社

——山东范县龙王庄人民公社史——

中共龙王庄人民公社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山东小组 合编
下放干部劳动锻炼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总布胡同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6号

新华书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4印张·插页1页·102,000字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3,001—6,500 定价：(7)0.41元

统一书号：4144.37 59.9.京型

目 录

国务院周总理颁发给龙王庄人民公社的奖状

龙王庄人民公社区域图

前言	9
第一章 从范县说起	11
从历史上看范县	11
从地理上看范县	12
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成长	13
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跃进	16
第二章 在封建反动统治时期	20
传说	20
水灾、旱灾、蝗灾	22
地主、恶霸、反动派	25
逃荒	29
第三章 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31
星星之火	31
我们的田区长	33
吴桥之战	36
血海深仇“九·二七”	39
冀、鲁、豫边区青年大会师	41
大参军	43
刘邓大军渡黄河	45
第四章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8
从轱辘到互助	48
人多力量大	51
合作化前后	54

冰天雪地战沙荒.....	59
大辩论、大跃进.....	62
人民公社的诞生.....	65
第五章 人民公社第一年	70
胜利的开端.....	70
工业生产大跃进.....	74
第一个机械厂.....	76
工具改革的基地.....	78
“白手起家”的土化肥厂.....	80
农业生产大丰收.....	82
扩大播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82
密植小麦丰收了.....	88
谷子——生产上的一面红旗.....	91
摘掉了大豆的低产帽子.....	93
推广“胜利百号”甘薯的故事.....	95
老朋友的弟弟——多穗高粱.....	97
堤东之柳.....	99
集体饲养业的先进生产队.....	101
牛肥马壮(101) 青貯饲料喂肥猪(103) “抗鸡”和养鸡场(104)	
“招狮子”.....	107
从黄河捕捞到水库养鱼.....	109
商业工作大发展.....	111
文教工作 成绩辉煌.....	113
学校教育.....	113
农民业余教育.....	116
俱乐部.....	117
卫生工作.....	118
劳武结合全民皆兵.....	119
我们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	122
衷心感谢共产党(结束语).....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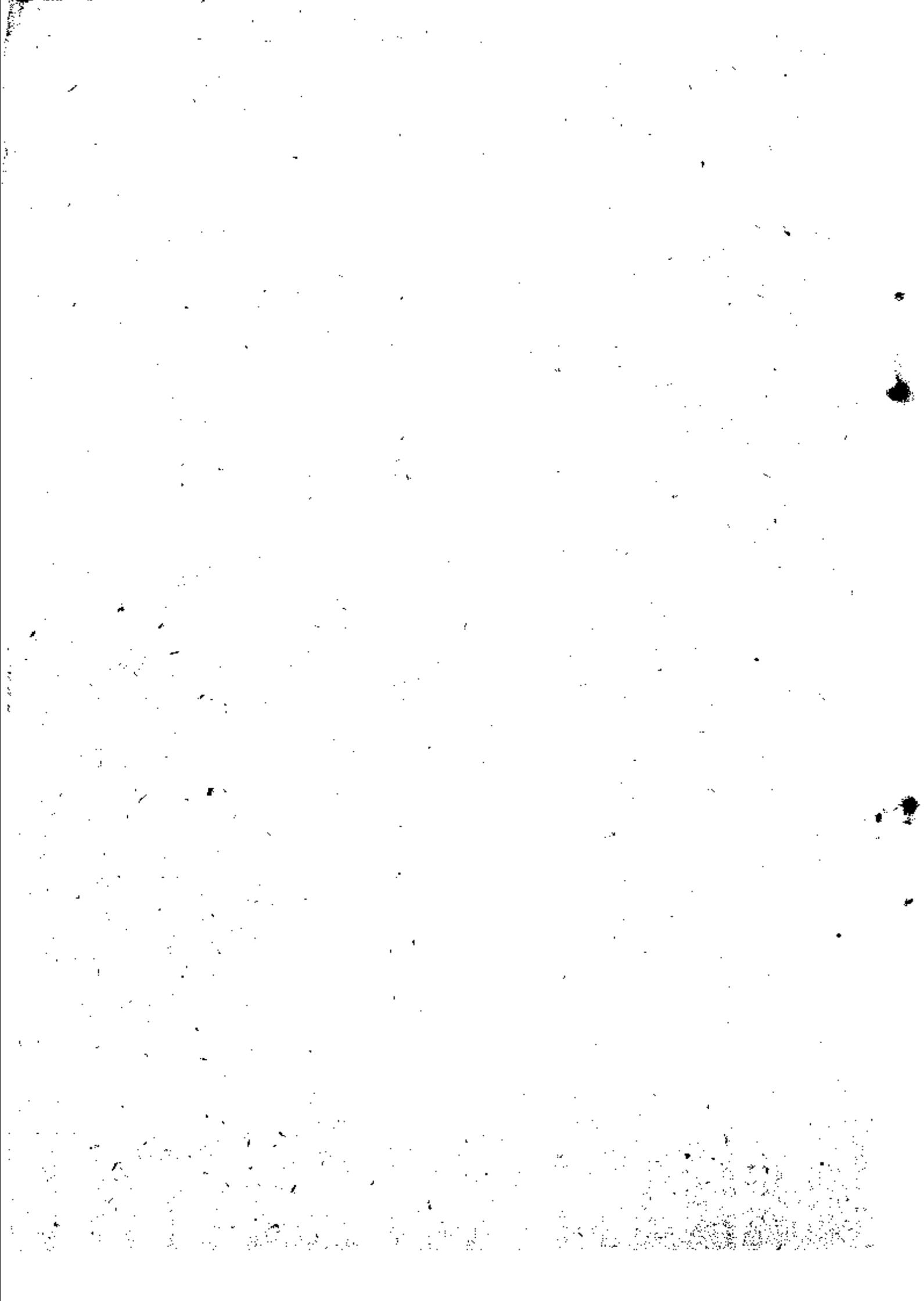
國務院獎狀

獎給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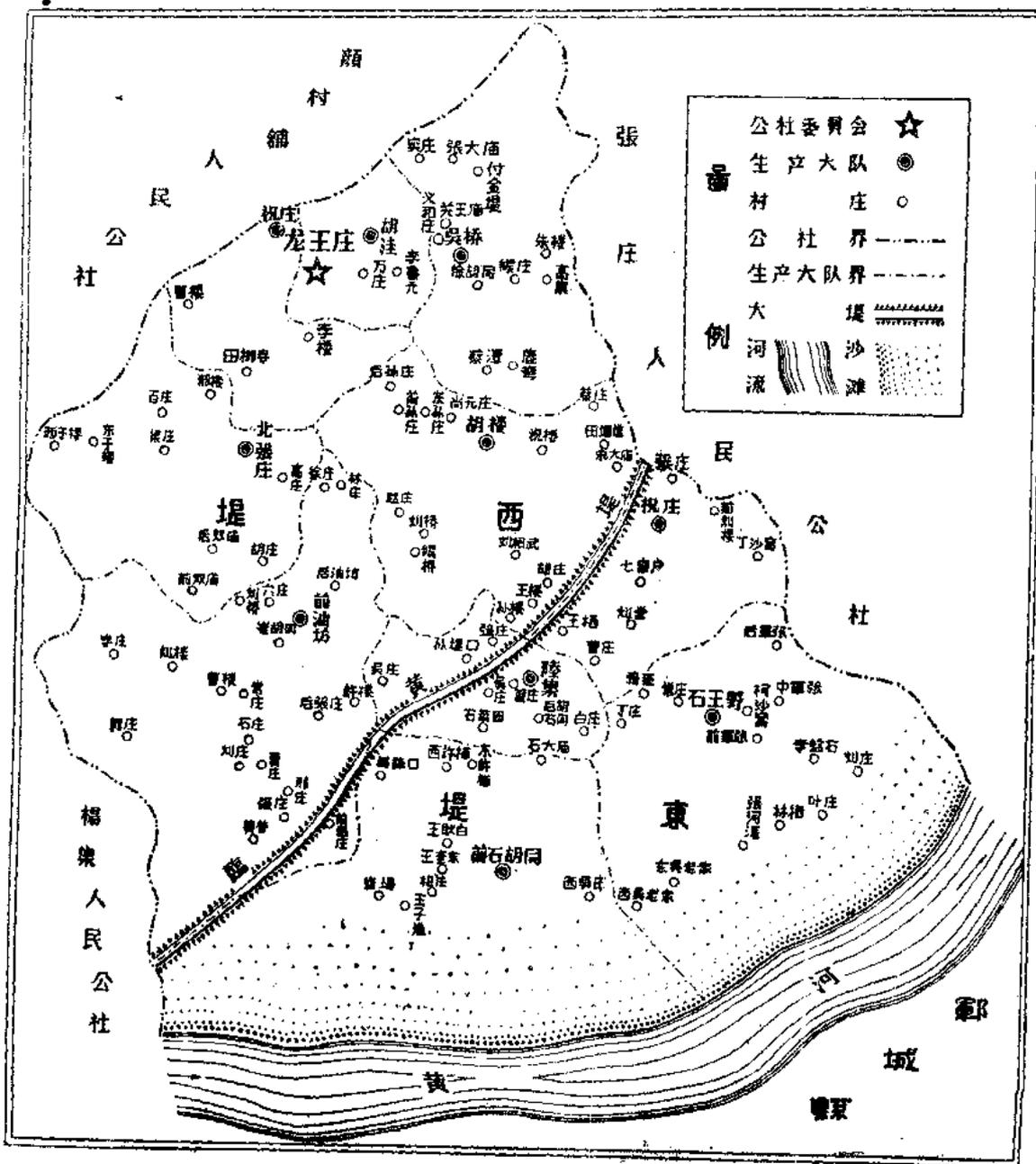
山東省范縣龍王莊人民公社

總理 周恩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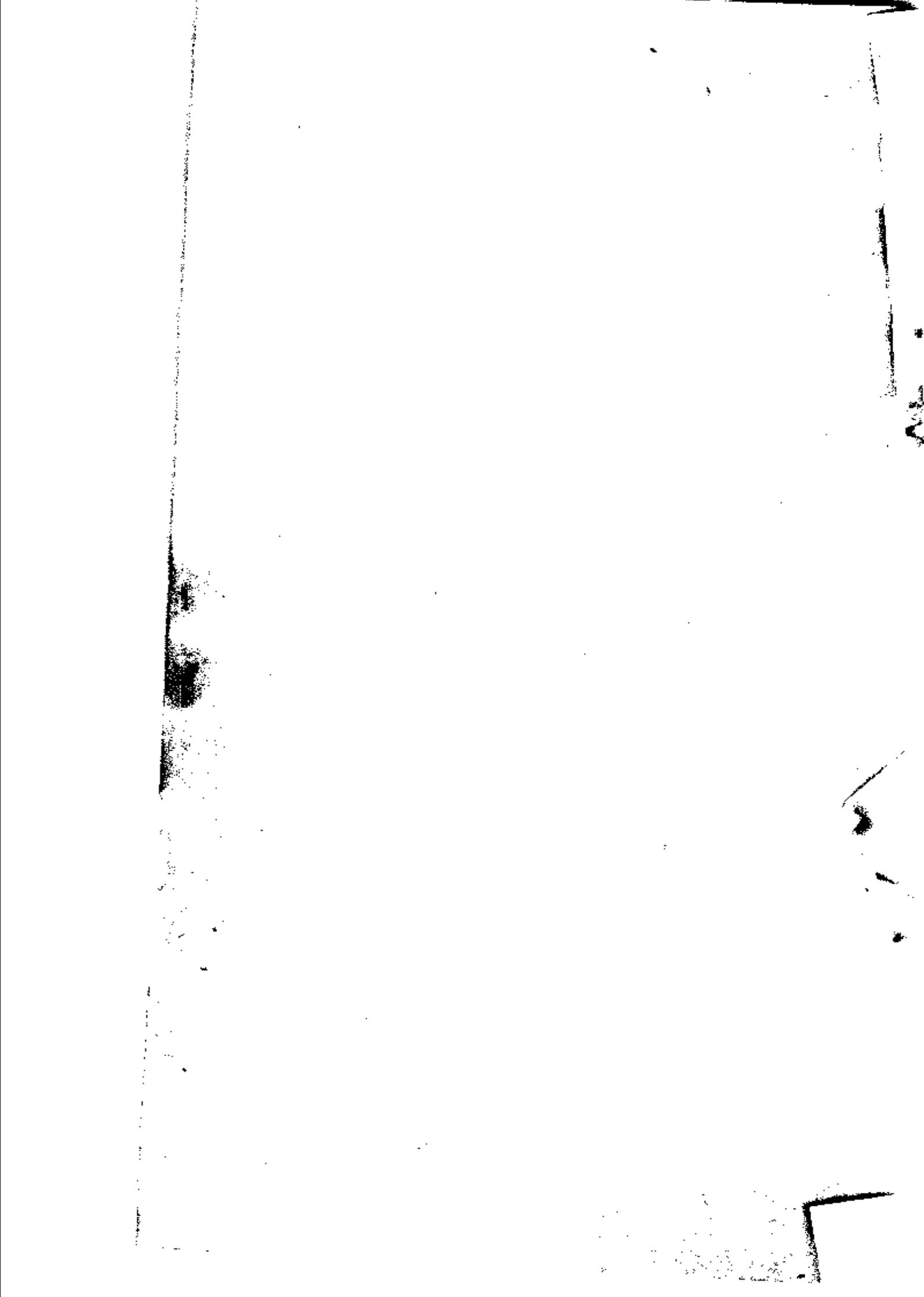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日



龙王庄人民公社区域图



一九五九年八月 比例 1:200,000



前 言

范县位于黄河下游的北岸，冀、鲁、豫三省边界的中心。远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古老而多灾的土地上，撒下了种，扎下了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不久，鲁西南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迅速地扩大并巩固下来。范县成了冀鲁豫区党委和行署的所在地。英雄的人民子弟兵，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粉碎了日本鬼子的扫荡，打垮了国民党匪帮的侵犯，实现了土地改革，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威震敌后，远近闻名。在整个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范县一直是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县境以内，从未有过任何敌伪反动政权。当时，人们都以敬爱的心情，把这兒称为“陕甘宁第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继承着老根据地光荣传统的范县，又进入了和平建设的新阶段。修河堤，搞水利，打蝗虫，闹生产，发展互助合作，推广先进经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这里的人民一个劲地奔向社会主义。1958年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掀起了工农商学兵全面大跃进。农作物的产量，显著地增长，谷子、甘薯、大豆、玉米，连续出现高额丰产纪录，光荣地参加了聊城专区农业展览会、济南全省农业展览会和北京全国农业展览会。

范县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但又是一座不久以前才由五个县合并而成的新县。这个新县，在1958年秋天，先后建立了16个人民公社，其中头一个建社的便是龙王庄。

龙王庄人民公社就在范县东南、黄河北岸的一段河滩上。八十多年前，这片河滩还经常淹在水里，以后，虽然筑起了临黄堤，但

情况也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土壤瘠薄,灾祸频繁,产量低,疾病多,因此在人们往日的印象里,这儿不但偏僻,而且很落后。

自从来了共产党,龙王庄跟所有的解放区一样,改变了旧的面貌,获得了新的生命,特别是建立人民公社以后,出现了工农商学兵全面跃进,农林牧副渔普遍发展的新气象。缺粮区早已成为余粮区,几年来一直都超额完成了征购的任务;落后区也已成为先进区,生产、教育、文化、财贸、卫生、民兵以及修水利、办工厂,样样都是标兵,项项都得红旗。

其实,龙王庄依然还在黄河北岸的“豆腐腰”(意思是说这一段河堤沙土多,不牢固,容易决口)上,耕地 97,000 亩,人口 37,000 多人,基本情况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就是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下,成立了人民公社,鼓起了群众的冲天干劲,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然还必须郑重指出的是,这只是生产力提高的开始,也只是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初步体现。

至于为什么它能发展得这样快,表现得这样好,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愿意冷静地从历史唯物的观点上来加以分析和解释。为此,我们整理了这部龙王庄人民公社史。

第一章 从范县說起

从历史上看范县

范县，古已有之。

夏商周三代以前的名称是“颍城”、“廩邱”、“秦亭”。秦汉以后，两千多年来都称为“范”。

战国时，有个小国，名叫“卫”。卫曾建都于此。

战国时，孔子的大弟子子路，曾在此講学。另一弟子閔子騫，死于此地，現仍有閔子墓。

范县境内无山，平原一片。但南有黄河天險，中隔两道大堤，在軍事上具有一定的价值，自古以来，是兵家必爭之地。

战国时，齐国的大将孙臧和魏国的大将龐涓交战，結果龐涓战死于馬陵。这件事在我国古代軍事史上很有名。馬陵就在范县城郊。

三国时，范县为曹操的屬地，曹操手下的大臣，如荀彧、程昱，都做过范县的县令。曹操的兒子曹植，在范县筑过一座高台，名“愁台”，还留下一些詩文。当年曹操和呂布，也曾在范县一带作战。

这以后的一千多年，据县志所載，历代都有战事，到处都是战场。如：“唐光啓三年，朱全忠攻濮州，朱瑄战于刘桥，杀数万人。”古远的情况，暫不細說，只講清朝一代，也只講农民起义，最初（1644年左右），就有榆林軍的暴动，連續二十多年；乾隆时（1774年）又有以邻县寿張义民王倫为首的农民暴动，攻占县城；以后，太平軍北上时，大将李开芳，曾进据范县；不久，以宋景詩等为首的五

大旗农民暴动,也曾占领范县,攻入县城。这些次暴动无不给反动统治者以严重的打击,但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最后都不幸失败。

可是,对勇于反抗反动统治的英雄人物,广大的劳动人民总是念念不忘的。到今天还流传着一些生动的传说,如:城南不远的十字坡,就是当年梁山泊好汉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开店的所在。附近还有两座村庄,一座张青营,据说那兒还有张青穿过的靴子;一座樱桃园,传说那兒就是孙二娘的娘家呢!

从地理上看范县

范县,在山东省的西南部,属聊城专区。西北与河北交界,离邯郸不远;西南与河南相邻,离安阳很近。有公路,往东可接京滬线,往西可接京汉线。由此去济南,不过150多公里。北上北京,南下南京,都只有600公里左右。

范县,位于北纬 $35^{\circ}56'$,东经 $115^{\circ}22'$ 。气温最高 42°C ,最低零下 18°C 。早霜10月初,晚霜4月末,全年无霜期185天以上。年平均降雨量600毫米左右,大半集中在8—9月。

范县,境内无山,一片大平原,滚滚黄河,由西而东,贯穿着整个县境,全长45公里。古时候,境内有一条小河,在县城东,叫范水,范县因此得名。可是,现在不但范水,连那座范水旁边的县城,也早已湮没不见了。

现在的范县,是从1956到1958年由范、濮、观、朝、莘五县先后合并而成的。共有土地210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776,626亩,人口679,586人,1,550个自然村,16个公社。这些公社的名称是:濮城、古城、莘城、杨集、城镇、张鲁、王庄、刘店、颜村铺、观城、古云、张庄、朝城、十八里铺、妹塚和龙王庄。这个新县的县址,设在全县的中心,金堤的北岸。

至于1956年以前的范县,人口14万多,耕地45万亩。旧县县址,是明朝洪武年间(1370年)所建,而今为古城公社的所在地。

在这五县合并的整个范县境内，有着两条大堤，横隔全境。往南，靠近黄河的是临黄堤，清末所筑；往北，在县境中部的叫金堤（固若金汤之意），汉朝以前就有了。两条大堤正好把全县划成三个区域：第一、临黄堤以南，也就是堤外那一片，是河床地，共约11万亩，因为地势很低，只要黄河一发水，马上就淹掉。而黄河差不多每年夏秋，都要漫滩。所以经常一年只种一季冬小麦。第二、介乎临黄堤与金堤之间的那一大片土地，面积最广，有90多万亩，是滞洪区。也就是说，如果黄河泛滥到最严重的时候，为全面利益打算，就得主动地把临黄堤挖开，让洪水暂时滞蓄在这里。不过，这种情况，自1933年以来，没有再发生过。而且，待位山工程不久竣工以后，这种威胁也就全部解除了。第三、金堤以北的土地，一般叫做上堤地，共有75万亩。这里不会受到洪水的为害，不过土质比较瘠薄，主要是青沙地（粉沙壤土），疏松易耕，只是难于保水。

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成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鲁西平原上的古城——范县，已开始出现了共产党员活动的踪迹。

那时候，连年水灾，生产不断下降，租高税重，农民无法安生。

据县水利局对有关资料的分析：解放前40年内，范县曾先后发生水灾34次，旱灾23次。每年要使50%左右的土地减产，甚至全无收成。1933年在观城、大吕海、山谷、王店和邵张屯等31个村庄所作的灾荒情况调查：因灾饿死的占总人数4.8%，因灾致病而死的占总人数6.5%，妻离子散的占总户数21%，乞食逃荒的占总户数62%。

又据兵役局对解放前范县人民生活情况的资料分析：全县除1.5%的地富，长年有吃有穿以外，能自足的仅占19.5%，缺粮的占60%，讨饭的占19%。

越来越残酷的反动统治，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唯一的出路，只

有反抗，只有斗争！

然而，对鲁西的劳苦大众来说，农民起义的血的历史，不是生疏的，而是惨痛的。

怎么办呢？

党给我们带来了新生的希望，为我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那是 1931 年的某一天，古旧的范县县城里，突然出现了大量的红色标语：“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城门口大街上，一直贴到公安局的局长室、县政府的大礼堂。吓得那一小撮反动分子张惶失措无可奈何。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暗暗欢喜。

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惊人的举动，是范县最早的党员崔信岳等勇敢机智地完成的。当时，他们的社会面貌，有的是刚从河北大名回来的学生，有的是正在伪建设局、教育局工作的工友。

也就在 1931 年左右，范县县城开办了范、濮、朝三县联立乡村师范，这个学校，是党在范县的最早的基点，这个学校的学生如王继奎、金瑞、陈东生、田子建……都成为范县的最早的党员，当时，反动派曾三次包围搜查，并逮捕了大批的进步学生。斗争是十分尖锐的。

在农村，党的活动，早已开始，不过最早的支部，根据已有资料判断是 1933 年在现属颜村铺公社的馮堌村建立起来的，书记姜文资，组织委员姜文耀，宣传委员姜文普。上级党的领导人是刘晏春、丁汉三和从上海来的甘肃人小魏同志。支部建立后，发展很快，也很活跃，曾在孟楼和县城之间，破坏敌人的交通；1936 年春天，曾发动 150 余人，和反动军队面对面地进行战斗。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我八路军东晋支队在陈光司令员的指挥下，象一把尖刀似地，插入鲁西，进据范县，大力发展人民武装，逐步展开敌后游击战。

当时，聊城的国民党山东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兼游击司令范筑

先，在党的啓发和帮助下，积极抗战，七七事变发生不久，他就委派我地下党员周子明为范县县长，吕世隆为莘县县长（原是范县邻县，现已与范县合并）

也正在那个时候，日寇的精銳部队，侵华北軍司令土肥原部，以及板垣师团等，先后进犯范县一带。如1938年5月，范筑先在我楊勇司令員的协助下，和板垣师团在濮城（原范县邻县，現屬范县）展开激烈战斗，結果打死日寇400名以上。

1939年年底，在党的领导下，范县正式成立了民主抗日联合政府。不料1940年3月，国民党第十軍团司令石友三，突然率領四个师的兵力，进占邻近的濮城。随即还在那兒建立起范县的反动政权。明目張胆地亲日反共，并多次侵犯我根据地，騷扰搶劫，群众痛恨万分，可是对当时敌我力量，人們还認識不清。但見“十軍团”有騎兵，有大炮，而我八路軍只是小米加步枪，信心不足。

1940年8月，我軍在楊勇司令員的指揮下，連續在顏村鋪和吳桥，打了两次胜仗，每次都斃伤或俘虏敌人一百多名，狠狠地打下了“十軍团”的气焰，坚定了群众的斗志。

可是敌人还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不到一个月，又来我金堤以北的道口一带进犯，还企图搶劫。結果被我軍迎头痛击，落荒而逃。这一仗俘获更多。当时群众曾組織大規模的慰問，庆祝胜利。

对“十軍团”的战斗，一直坚持到1942年3月，終于被我全部赶跑。

当然，在打击和驅逐“十軍团”的同时，以及那以后的一段时期中，对日寇的斗争，是更加严重和殘酷的。虽然在县境以內，从未有过日伪政权，但是日伪武装，却曾多次侵入，瘋狂地进行所謂“鉄壁合圍”。有一次在白衣閣村，我200多干部和群众，全部牺牲。另一次，我軍和日寇在苏村发生遭遇战，日寇以数十倍于我的兵力，将我軍两个連層層包圍，并施用毒气。結果虽然我軍損失惨重，但敌人却受到更大的杀伤。据当时亲眼看到的群众說，只講敌人的

死尸，就拉了十几部大卡車。

在那艰苦斗争的日子里，广大的农民群众，紧紧地和党站在一起，参军支前，拥军优属，切切实实地做到了一切为抗日，把一切献给党。

当时，优秀的青年，绝大部分都参了军。未参军的17岁到60岁的男子，也几乎没有谁没当过民伕，上过前线。甚至有一次，还有一千多名女青年自动组织起来，坚决要求参军，不过最后未被批准。

范县原是个封建闭塞的地区，农村妇女不但很少下地干活，甚至连大门也不迈，当时十多岁的姑娘，还包着小脚。可是，在党的启发号召下，她们都动员起来了。制军鞋，洗军衣，为伤员捐献鸡蛋，为抗属磨面煮饭，特别是在抗战后期和自卫战争的紧张阶段，她们在动员自己的丈夫、儿子参军之后，不但把地里的农活分片包干下来，而且，还组织了女民兵，每村20—30人，一样地背着枪，站岗巡夜，坚持斗争。

1947年进行了土改复查。这时抗日战争虽已结束，人民解放战争的炮火又响了。刘邓大军、东北大军的部队，先后由这里渡黄河而南下。范县的民兵，在支援大军南渡，粉碎对岸国民党蒋匪军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从七七事变到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十多年的斗争中，冀鲁豫边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长驻于此，并在此建立过兵工厂、军服厂、印刷厂，开办过抗日大学和干部学校，出版过鲁西日报和许多刊物，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的革命干部，而成为当时人们所称誉的“陕甘宁第二”。

1949年冀鲁豫边区改建平原省。光荣的历史任务，至此告一段落。

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跃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从此，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

的范县,进入了和平建設的新阶段。

领导力量是坚强的,群众基础是雄厚的。然而,从經濟建設的角度来看,却不能不承認这个事实:由于多年的灾荒和战事,財力物力,一穷二白。为此,必須繼續发揚老革命根据地的光荣傳統,积极展开建設社会主义新范县的新的战斗。

第一个十年的战果,果然灿烂輝煌。今昔对比,尤其令人振奋。

建国以后,党领导广大群众,在进行抗美援朝、鎮反、三反、五反、肃反等偉大运动的同时,又进行了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里原来有着組織起来生产支前的傳統,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迅速而健康。1950年就出現了初級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紀念它的誕生,定名为“五〇社”。1952年,参加各种形式的互助組的农户,已达到总农户数的一半以上。1955年更出現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質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在 全县 范 圍 內,完成了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历史任务。

1958年,划时代的年代来到了,在整风反右胜利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从而带来了农业生产的空前大跃进。各項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普遍增长。全县粮食作物的每亩平均产量,高达331斤,大大地超过了战前水平,而个别丰产地的高产成績,有的已經打破了全专、全省,甚至全国的記錄。

本来,在战前范县的农业生产中,以粮食作物占絕大部分,其中又以小麦和大豆为主,其次是高粱、谷子和玉米,甘薯是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当时每亩粮食作物平均产量,在正常年景下,也不过100斤左右,1949年建国以后,才提高到約130斤,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計劃結束时,已上升到205斤。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跃进到400斤,也就是說,十年来全县粮食平均每亩产量增加了两倍半以上,平均每年增加約15% (实际1958年比1957年跃增95%)。这个速度,特别是在黄河以北,經常受水,复种指数还

比較低的地区,显然是很高的速度。同时自 1954 年粮食統購統銷以来,范县——包括以后陸續合并的濮、观、朝和莘县,年年都光荣地超額完成了征購任务。

至于战前范县的工业生产,那就更談不到了,有之,也只是 1931 年开办的一个平民工厂而已。这个工厂,共有 13 台小机器,其中一部分还是木制的,产品只是有限的一点洋布、毛巾和小学生用的筆記本子罢了。

經過十年来的建設,主要是 1958 年的跃进,范县的工业生产,已具有一定的規模。現有正規化的中、小型工厂 170 多处。它們的分类是:机械、木业、化肥、面粉、縫紉、造紙、化工、建筑、榨油、制酒、皮麻、編織、制鞋、磚瓦窑、副食品加工……,它們的产品,仅以重工业中的机械工业來說,已試制成功了煤气机、柴油机和龍門刨床。

1959 年,全县共有技术工人 6,000 多名,大部分具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全年工业生产总值,估計将相当于农业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左右。这許多工厂,大多属于地方国营,其中几个較大的新建的厂,都集中在新县址。

新县县址,1957 年开始新建。寬闊的大馬路,密茂的行道树,宏大的农业展覽館,高聳入云的工厂大烟囱。远望近看,都是一派新兴城市的新气象。里面还有:劇場、食堂、医院、銀行、学校、花园、幼兒園、圖書館、大礼堂、广播站、新华書店、百貨公司……。已有的建筑面积,将近 10 万平方米。出城不远,濃蔭之下有长堤,长堤之外是一片秀丽的人工湖。湖上有亭,有牌坊,还有陈伯达同志的亲笔題字:“春景湖”。

街道很干净,市面很熱鬧。就是到了晚上,百貨公司的几家門市部,照样还挤滿了人。八年来,商业工作的发展,已达到了村村都有商店,到处都有貨郎担。1958 年的營業額与 1957 年比較,生产資料提高了 26.7%,生活資料提高了 73.3%,而 1959 年上半年

的情况，又比 1958 年同时期有了很大的增长。比如棉布、汗衫、胶鞋、纸张以及罐头、水产、自行车等等，最少增加了 1 倍多，有的竟增加了 10 倍以上。

假如要对比一下从前的景象，在旧县城里，一共就只有聚货成、福聚成、泰丰等几家店铺，当然都是官僚、地主和投机商人所经营的，那些店铺也没有一定的营业项目，啥有利就做啥，不过主要的还是粮食，买青苗，放高利贷，囤积居奇。那时候百货一类的商品很少，一般农民除了办喜事，谁也不会去买花布、洋袜子。乡村根本没有什么商店，货郎担也很少，商业性的往来，全靠赶集。

鲜明的对比，尤其表现在文化教育事业上。据县志：1935 年以前，全县的高小毕业生，不过 500 人左右，中学以上毕业生只有 50 多人。县内没有中学，仅有 3 县联立的乡村简易师范一处，初级小学 73 处（有几班高小，附设在里面）。

今天，全县共有初小 550 处，完小 125 处，小学生 86,473 人。中学 10 处，其中初中 91 班，高中 19 班，中学生 5,810 人。另外还有师范学校、农业中学、业余中学、扫盲学校等，尚未计算在内。至于学习的内容质量，更加无法比拟。1958 年大跃进中掀起了全民学哲学的高潮，共组织了 7,100 个小组，参加人数达 13 万以上，这是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这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群众性的文化活动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而普遍展开。在这拥有 67 万人口的全县范围里，共有公办和民办的文化站 16 处，农村俱乐部（附设图书室）945 处，文艺创作小组 745 个，美术小组 160 个，歌咏队 431 个，业余剧团 213 个，电影队 7 个，职业剧团 8 个；另外，还有规模较大的县文化馆和图书馆各一处，单只这个县图书馆的藏书，就有 73,000 册以上。

社会主义的新范县，正在加速度地成长和壮大。

第二章 在封建反动統治时期

傳 說

大凡沿河靠水的地方，往往会有龙王庙。龙王庙的所在地，自然而然地就被称为龙王庄。可是，龙王庙虽有千千万万，但能有这兒这么多傳說或神話的，恐怕很少。

先从县志說起。

“龙王庄在县南 20 里，傳为刘累豢龙处。”

豢音患，豢龙者养龙也。这刘累呢？据說是三、四千年前，堯舜时候的人，而且是头一个姓刘的，是汉高祖刘邦的始祖。刘累以养龙聞名于古代，后人乃于此筑庙作紀念。

另有民間的傳說。

从前，这兒住着个老头，沒兒沒伴，只带着个閨女，靠种园子过活。有一天，来了个小伙子，想在他家帮工，老头見他很結实，很能干，就留下了。后来，那閨女也嫁给了他。

不久，发生大旱，別处的庄稼，枯的枯，死的死。可就只有这一带，滴水不缺，一片青葱。

原来这小伙子是海龙王变的，每天早晚，他只要到井里一蹲，水就嘩嘩地涌上来了。

这奇怪的事兒，終于讓他媳妇知道了，起初是怀疑，最后竟提出要求，要变給她看一看。

他答应了，两人来到井边。只見他縱身往里面一跳，立刻出現一条金鳞金甲的巨龙，两根龙須跟水管一样从井里噴出水来。

小媳妇吓得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从此,这小伙子不见了。以后,再遇上天旱,人们都不免要想起他,希望他再来。于是修了这座庙。

因为这座龙王庙的龙王爷,在大家的印象里,原是个热情能干的人,所以这神话就随着人们的天真的愿望而继续发展下来。

龙王庙修成以后,最初竟成了一座农忙托儿所。这话怎么讲呢?据说是当时妇女们都把小孩送到庙里去,再爱闹的,一进龙王庙就乖乖地睡觉了,让妈妈们好安心地去干活。可是,以后因为妈妈们太不爱干净,弄得龙王庙里到处是屎呀尿的脏极了,于是龙王爷生了气,不管了。

提起龙王爷,在别处,他总是呼风唤雨涨大水,令人害怕;在这里,他却成了劳动人民的好朋友,亲自来给庄稼人哄孩子,甚至还告诫人们要讲卫生,爱清洁。

可是美丽的幻想,到底敌不过无情的现实。那时,这龙王庄一带,不是涝来就是旱,更加上贪官、污吏、地主、恶霸……,苦难的年月,实在熬不下去了,成群的人,忍着泪、低着头,离乡别井下关东。

到了那人地生疏的远方,谁也不免想家。而家里的老人,更是常常牵挂着漂泊在外的儿女。山河阻隔,无可奈何,这时龙王爷的神话又继续来安慰那些可怜的人们。

据说,那龙王爷离开了这里,就到了黑龙江,可是它还常常怀念故人。所以,黑龙江上,虽然浪涛汹涌,但只要船里坐着关内来的,特别是范县来的旅客,它就一帆风顺,平安无事。

本来这龙王庄,不过是一座黄河边上的小村子,可是望上看,与古老的堯舜时代相联;望远看,又和辽阔广大的黑龙江有关系。真是历史悠久,气派很大的地方。

可是,它那光荣的历史,劳动人民的气派,却是在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以后,才真正开始。那以前的岁月,只是一片凄凉。

水灾、旱灾、蝗灾，

从公社的最西面到黄河，不过 20 里左右。八十多年前，沒有修建那道沿河的临黄大堤时，这兒还經常浸在水里。秋冬水退，种上一季麦子；夏天水来了，人們又提着个籃兒逃荒去。生产扎不下根，生活漂泊无定。

清代光緒初年，即 1878 年左右，黄河发过一場少有的大水，整整八年，沒露地皮。这一来，远近数十里，簡直絕了人烟。据說，水退后，还是現屬顏村鋪公社那边，有个叫黄迎贵的，带着 9 个兒子，跑来开熟荒，这才又出現了庄稼。难怪这一带一百多个村庄，不但找不着一座古老的建筑，甚至连一棵够上两人合抱的大树也几乎沒有。

八年洪水之后，修起了一条連綿几个县的临黄大堤。今日龙王庄公社的地区，便被分为堤东堤西两部分。堤东部分約占整个面积的五分之二。

堤成之后，應該可以安居下来，好好地种庄稼，过日子了吧！不，在封建反动統治下，这防洪的大堤，不但沒有真正防住洪水，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灾难。因为这条由劳动人民血汗筑成的长堤，却成了官僚恶霸剝削农民的工具。

从清朝到民国，有哪个修黄段不敲詐老百姓？就說仲肇礼吧，三十多年前，他在这兒当埝长（管这一段临黄堤），哪个村子都得向他送礼，礼不到，便故意加派你的活，处处刁难。比如驗收的时候，他們用小棍子用力地往堤面上插，插得进的都不合格。天知道哪兒会有插不进的泥土，这又不是洋灰地！那么就补礼吧，补送了礼，一砸不打也过去了，因为这时再驗收，也不用棍子插了，其实他們根本不希望把堤修好，修好了，不决口，又憑什么去发橫財呢？誰不知道仲肇礼上任不久，就置了一頃多地。大王庄的群众說得好：“修防段的鷄蛋壳，比俺的粪堆还高。”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那时三年五载，大淹小淹，根本没有断过。甚至一年连发两次水，远远近近，一片汪洋。各个村庄，虽然大都筑了四、五尺高的土堤，可是遇到水大势猛，一下就给冲毁了。只要站在高处一望，混浊的水面上，不断地漂过一堆堆、一团团的东西，撑只小船去捞吧，有的是破傢具，有的是死牲口，有的竟是人的尸体。是的，解放以前，这龙王庄的百多座村庄，哪庄哪村没有被黄水淹死过人？哪家哪户没有受过水灾的苦啊！而这些，主要还是堤西的情况。

至于堤东，也就是紧挨着黄河，又在大堤以外的那一片，4万多亩耕地，二、三十座村子，1万多人口，他们更是长年与水争命。每到汛期，常常是半夜惊醒，屋地见水，赶快爬上屋顶，却眼瞧着场上的麦秸堆被冲走了，屋里的傢什被水漂走了，而且涨水总是下雨天，雨越下越大，水越涨越高。有时砸梁（墙基）一塌，全家都被淹死。所以人们看着屋顶靠不住了，还得想法子上树，反正躲一段算一段，听天由命，渴了，喝一口黄水；饿了，吃几口霉坏了的干粮，什么油盐酱醋，啥都谈不到了。运气好，撑上这么几天，也就撑过去了；要是碰上黄河大溜（主流）冲过来，一个小时就能冲垮240汉（一汉等于五尺），几个浪头翻过去，连房带地一股脑儿掉到河里去。堤东一带，近30年间，被冲掉的便有于庄、叶庄、丘庄、盐场、关唐、林楼、魏屯、许大井、邢上窝、五十庄、林当窝和石奶奶庙等十多个村子。那些村上的人，多数已不知流落到何方去了。

比起水涝，这一带的旱情，还算轻一些。可是，从前既没有大渠水库，连井也很少，即使一个月不下雨，问题也会闹得很严重。

这处全年的降雨量，一般只有600毫米左右，而且多数集中在八、九月，可是主要农作物的播种季节呢，上半年是麦收之后的六、七月，下半年是秋收之后的十、十一月。恰巧都在雨季的两端，而连续三几十天不下雨，却是平常的事。所以在往年，就形成了十年

九旱的局面，不是小麦耩不下去，就是高粱下豆子出不了苗。

咋办呢？唯一的办法靠求雨。

从前，不远处有个黑龙潭，每逢大旱，人们便上那儿去取甘霖，求神雨。为了表示虔诚，都得光着头让太阳晒，赤着脚让地皮烫。而且每餐只能喝一碗汤。这样，所求的结果，往往不是一场大雨而是一场大病。

还有一种办法，叫做晒关公。据说是因为关公的名字叫关雨（书上写的是关羽），他在天上把雨都关起来了，怎么办？晒他。让他也感到受不了时，便会下雨。于是，只要多少有些旱象，家家户户，就把那泥塑木雕的大小关公，披上条红布，抬到大太阳底下去晒。

另外，还有一些办法，比如老妈妈到太阳底下去哭，据说也会感动上天，求到甘霖；甚至用扫帚去扫扫坑边，也能求雨……。

今天看来，这都令人觉得既荒唐又痛苦，可是，还有更荒唐可恨的是，在那么悠长的年月中，却从来没有那个做官做府的，从修渠打井搞水利方面去想想办法。而始终只会站在临黄大堤上，眼看着一面是滚滚大水向东流，一面却在晒关公求雨，暗底下呢，地主财东们，又乘机放高利贷，收买低价的土地。那时就有这么一句民谣：“老天旱一旱，地主拈一拈”（拈，是上升的意思）。

老年的农民说，天时不正，必有妖孽，所谓天时不正，是指的水旱连绵；所谓妖孽，主要是蝗虫。

黄河沿岸，蝗蝻滋生。三年五载总得闹一次。据县志，远在宋朝建隆二年，这儿就有过闹蝗虫的记载，可是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这一带的蝗虫，还是一大祸害。而堤东柯沙窝村那一线，更是蝗虫的渊藪。

起初是蝗蝻，越聚越多，越吃越兇，继而成虫，遮天蔽日。从前，碰到这种兇象，除了又是叩头求神之外，只好准备逃荒去。反正蝗虫一来，什么都完。1930年那一次闹的蝗灾，人们都还记得

起,大好的庄稼,都成了一片光秃秃的茬子。

还有一次,那也是比较近的年份,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晚上,忽然一阵轰轰之声,自远而近,有的以为是敌机来轰炸,有的以为是来了日本鬼子的汽车部队,连忙都跑到野外去,谁知却是和日伪一样狠毒的蝗虫。

值得提到的是,也是县志所载,四百多年前,明嘉靖八年(1529),这儿发生蝗虫,竟采取过“以粟易蝗”的治法,而且“不旬日,足千石”。可是,以后的封建反动派,不但没有继续下去,反而不闻不问。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工扑打,掘沟掩埋,才逐步消灭了这千年的祸害。

地主、恶霸、反动派

从前,在范县境内,就数龙王庄这一线所占的黄河最长,全县黄河40里,这儿占了一半多。可是,这“水祸”要是比起“人祸”来,那还是“人祸”作恶大。洪水来了,可以往高处跑;地主、恶霸、反动派,却象苍蝇、跳蚤似地,布满了整个的旧社会,使你无处躲藏。

先说地主。龙王庄的杨家大地主,全县第一。

杨家就在堤东南杨庄,全庄60多户,除了他们自己,户户都种他家的地。当然,种杨家地的,决不止那五六十户,而是遍及堤东堤西一带。每到秋收,往他家送租送粮的,就跟赶集一样,那么,究竟杨家有多少地呢?说来笑话,连他管帐的也闹不清。因为黄河滩上黑地多,淹了河西,露出河东,既不完粮,也不纳税,所以没个数,但据土地改革时调查登记的,一共有140多顷,一顷等于100亩,也就是14,000多亩。杨家兄弟3个,瘸子为大,分家以后,单杨瘸子一人就拥有土地50多顷。

杨瘸子置地的手段,毒辣又狠心,也可以说是一种黄河边上特有的地主的典型。黄河岸,不是常常要发大水吗?水一涌上来,庄稼房屋,顿时一片汪洋,人们都慌着逃难。这时候,杨瘸子带着个

管家的，坐着小船，敲着算盘，划到各村去，大家都在屋頂上喊救命呢，他这里却买地来啦，要錢有現錢，要糧有糧食，人到急时什么也顧不得了，于是隨他定个价，指水为界，按个手印，交易便完成了。楊瘸子就是这样乘人之危而发家的。

有了地只是具有了剝削的手段，具体进行剝削的方法，則是多种多样的。下面就是几种最普遍的地租形式，这是范县一带所通行的，还不是楊家所独有的。

第一种叫“大种地”。

佃戶自己有牲口和其他生产資料，地主啥都不管，只等庄稼晒干揚淨，他把算盘一爬，打一石，拿去五斗。

第二种，叫“三堆种地”。

生产資料連牲口在內都是地主的，但佃戶要替他养牲口，供飼料，收了庄稼，佃戶只得三分之一。

第三种，叫“秋三七、麦二八种地”。

生产資料包括喂养牲口，都由地主負責，收了糧食呢，秋季作物（豆、谷子、高粱、玉米）佃戶分三成，小麦却只能分二成。为什么？据說是因为麦子花工少，佃戶就該得少一点。

第四种，叫“干半拔种地”。

这种办法是做佃戶的平时只管种地，地主管吃，到麦收时，他只分一成，地主得九成，秋收时，他只分一成半，地主得八成半。

佃戶除了繳实物地租以外，还有劳役地租，每逢过年过节或者地主家有什么事，如死了人之类，就該去帮忙，当然是无偿劳役。那时候，常常鬧小偷和土匪，佃戶白天下了活，晚上还該去給地主扛着鎗，敲着鑼，看家护院。就拿楊家來說吧，他一家便有 20 多支大鎗得人去扛。

这还不算，还有額外的負擔，过年过节必須向地主送礼，形式上这虽然不在規定範圍之內，可是，只要你缺了一回，下年他就把地租給別人去了。

那时候，能有几家佃户不闹穷呢？特别是水旱灾害又多，每逢青黄不接，十家总有八、九家缺吃少穿的，于是地主就出来“接济”了。比如三、四月里借出一斗高粱，到五、六月就要还一斗半甚至两斗麦子。因此，交了租，还了债以后，有的佃户，简直是给地主白干活，连饭也吃不上。

能有这样的事吗？有。田柳寺村有个佃户叫王福堂，一家大小7口人，种了地主路绍唐家的地，一连五、六年，年年只看见他家的小孩在外边讨饭吃，可是仍旧年年还不清他路家的债，最后逼着退了佃，无可奈何，只好全家下关东。那时关东是日本鬼子的天下，4个儿子1个闺女连同王福堂他自己，都被抓去做苦工，后来3个给累死，3个被屠杀，剩下一个老妈妈。千辛万苦地总算回到了老家，幸亏这时已经解放了，路绍唐也被镇压了，她才过上了人过的日子。

路绍唐固然狠，他的侄子恶霸路至平比他还要利害三分。那时候，这儿的地主都有枪，够一顷地的就可以买一杆，地越多，势力也越大。明说是防土匪，实际是欺压佃户老百姓。

那个路至平，就有五杆长枪，两杆短枪。有一回他又买到一枝新的什么枪，走过麻口村，忽然想起都试一试，砰地一下，把个正在菜园里干活的老头打死了，官司打到县里去，只赔了一付棺材便完事。这个恶霸，土地改革时到底也被镇压了。

本来，地主和恶霸是很难分别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地主不恶，也没有一个恶霸没有大片的土地。可是，另外却还有一种更可恶的，那就是地主、恶霸，还兼反动派的“官”。比如李子良就是一个。

李子良原是个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后来勾结本区大恶霸丁醴泉，当上了伪乡长。伪乡长干什么呢？头一项就是摆赌摊，抽头钱。谁输了，他借，可是不但要拿地来抵押，而且利息高得特别，李庄有个李锦玉，就是这样被他搞垮的。这还不算，那时候，地主不要买枪吗，他就经手这个买卖，甚至还自己制造土枪，硬逼着几十亩的

人家,也要几户凑起来买他一杆,不买不行。还有,乡长不是管公粮吗,他一手遮天,多派少支,从中贪污。就这样,他当上乡长不多久,便弄到了一顷多地。

1944年,这个地主、恶霸、伪乡长,被抗日民主联合政府逮捕了,7月里,在龙王庄开了个公审大会,当场枪毙。这个会上所宣布的他罪恶可太多了,最令人痛恨的还有:

从前,我们这里,连年遭灾,逃荒要饭的,到处都有,这人面兽心的李子良,借着个伪乡长的名目,强姦受灾的妇女。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很封建,受了他的害都不敢说,谁知道又因此发生过多少惨事!

李子良在当乡长的时候,乡里小学有位王哲臣老师,是地下党员,既积极又能干,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李子良怀恨在心,有一次伪教育局派人来视察,他不知从那里弄来这么三个字:“锡茶壶”(不是锡茶壶,而要唸作杨涂困)要王老师认,年青的王哲臣被他突然难住了,他就说王老师连字也不认得,逼着辞职走了。

龙王庄的地方并不大,可是在那黑暗的旧社会,不但出了李子良这样的败类,而且还有比李子良更大的恶霸,那就是丁醴泉。

那时候,丁醴泉当伪区长。出门不是骑马就是坐轿,前后还有枪兵跟着,丁醴泉是蔡庄人,他在蔡庄有房有地,于是蔡庄就设了一个区公所的什么分局,派上十几杆枪,替他作警卫,显威风。

提起丁醴泉的威风,上了岁数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有一回,崔胡同的崔文道为了人家侵占他的地边子,到县里去告了一状,不料这侵占地边子的人,是丁醴泉的亲戚。可怜崔文道已经60多岁了,却被丁醴泉抓起来,吊打得半死。

还有一回,他在路上碰到一个杨庄来的老乡,不知怎么触犯了他,他一生气,抓回来就吊起拷打,还用烙铁去烫,硬要人家承认是土匪,结果这个老实的庄稼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送了命。这一类悲惨的事情怎么说得完呢。那时候,丁醴泉在龙王庄这一带,就是

土皇帝。

蔣匪帮十軍团盘据濮县的时候，丁醴泉跑到那边去，当过国民党的范县县党部書記长，后来又組織还乡团，在我們龙王庄附近一带，抓壮丁，搶粮食，謀害革命干部，只講被他活埋、丢河的就有好几十人。

这个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分子，终于在解放以后，被我們人民政府从山西逮捕回县，当众处决了。

从前的龙王庄，本是个苦地方，地主加富农，就有 448 戶，他們用尽一切办法，一点一滴地剝削农民，时时刻刻地欺压农民，这样就使龙王庄苦上加苦。前面所說的这些地主、恶霸、反动派的劣跡，只是个别的片断的，如果要詳細地記載下来，十本書也嫌少。

逃 荒

天灾人禍說不尽。在那苦难的年代，龙王庄上，滿目凄凉。

有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又有多少人家卖兒卖女卖田地？那都是很難計算的老帳了。1959 年馬路口生产队小麦大丰收，一亩地打上了七、八布袋的粮食（每袋約 100 斤），便使人很容易地联想起从前有一年，这兒大灾荒，只要有一布袋粮食，要牲口，可以換一头牛；要人呢，可以換一个媳妇。到今天那兒还有 3 家人家的媳妇，就是那么换来的。

家乡呆不住了，只好走。上山西，或者下关东。

据說 600 年前（明洪武初年，1368 年左右），这兒发生过特大洪水，連县城都被冲毀了。事后，山西省洪洞县有一批移民来此定居。所以这里的人上山西也就是回老家。

至于下关东，那更是山东一带劳动人民的傳統。沒有鉄路以前，漂过渤海，从旅大那边过去；修通鉄路以后，就更加方便了。

究竟从龙王庄下关东的人，一共有多少？这个答案很确切：在土地改革时分到地的人家，几乎没有沒下过关东的。

然而，这时下关东，可不象今天有組織地到北大荒去开垦，去建設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老人們都記得，从前，反动統治时期，天下烏鴉一样黑，关东也不是什么好地方，許多人，滿怀着希望而去，結果却是两手空空地回来了。甚至也还有来回几趟的。比如年近80岁的老社員卓起讓就前后在关东呆过40多年，却連个媳妇也沒娶上。因此，人們談起往事来，总不免感慨地說，那时候要是家里勉强还能过，誰又肯千里迢迢地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其实，黑龙江还不算远，远的，是欧洲。

1916年左右，消息傳來，有人要招募一批年輕的中国人到外国去做工。上哪兒呢？当时誰也鬧不清，总归是老远老远的地方，坐船坐車也得几个月，于是人們就叫它做“大鼻子国”。

那时，义和团事件还过去不久，大家記憶犹新。要不是实在沒法，怎捨得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到那渺渺茫茫的“大鼻子国”去，而且还不曉得今生能不能再回来？

据說那一次，龙王庄这一带去了好几十，山东全省共有好几万人，一路上死掉的就上千。到了那边，啥活都干，而且，就跟犯了罪一样，行动沒自由。干活，吃飯，都得排上队，前前后后由毛子兵押着。天天这样，年年如此。所以，象現在已60多岁的老社員郭昭現說，他在那兒干了3年，只知道是法国，旁的全沒鬧清。

还有一个老社員魏九洲，当时他也去了，后来回了国，回了家。可是，日子仍然过不下去。一狠心，又下了关东。

受尽了天災人禍，跑遍了天南地北，最后，現实的教訓和党的教育，終于使人們明白了一条真理：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組織起来，打垮封建反动的統治，才能获得徹底的解放。

第三章 在抗日戰爭和人民 解放戰爭時期

星星之火

远在七七事变以前，范县各区乡村鎮，已經不断出現紅色標語，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态度鮮明。有时还貼出了对某个土豪劣紳的警告，要他这样或者那样，如果他不听，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懲罰。

往后，大約在 1932—1937 年之間，地下黨員所領導的“吃大戶”(沒收地主糧食)，包圍鄉公所繳槍等事件，也跟着發生了。這些大快人心的舉動，機靈迅速，神出鬼沒，反動派被嚇得手忙腳亂，最後想出了一個對策，就是架電綫，通電話，加強城鄉連絡。他們以為只要消息一靈通，便能隨時調動武裝，挽回“局勢”。

當時，在龍王莊這一片所架起的電話綫，以六集為中心，一條通孟樓，長 17 里；一條通廖橋，長 18 里。當然這兩條綫又都可以和縣城聯上。

電話綫架起之後，“局勢”改變得怎樣呢？偽范縣縣政府的報告，是這樣說的：“數年來，多因事故，漸次不通，以致城內與各鄉鎮，有事不能通話。”

為什麼“有事不能通話”？因為電綫、電杆都被我們的地下黨員砍掉了。當時，破壞敵人的交通綫，是黨的一項中心任務，崔胡同、田壩堆、北張莊等幾個建立得最早的黨支部，不但堅持了這個鬥爭，而且還創造了許多巧妙的方法。

比如開頭割電綫時，要爬到電杆頂上去，危險性比較大，敵人

也容易修复。以后就干脆把电杆一锯倒就跑，可是那样也不好，因为敌人发现电杆还在原地，就肯定是政治性破坏，而不是偷木头，容易暴露自己，增加以后工作的困难。于是后来一砍倒电杆，立即埋掉，把敌人弄得捉摸不定，又很难及时修好。

那时，先后到这里来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同志是：刘庆三、于跃、任中生、范涛、金瑞、王继奎、田子建等。起初是直线领导，个别行动，到1937年才逐渐建立支部。

崔胡同支部是1937年3月建立的，书记范从廷，组织委员范广民，宣传委员范崇德。当时这个支部已有党员8人。土枪3支，随后上级又发给他们两支步枪，力量要算是最雄厚的了。

田垆堆支部是1938年2月正式建立的，书记田子建，组织委员宋道荣，宣传委员田士聪。这个支部虽然成立较晚，但是这个村子在1937年以前，就有了田子建、宋道荣、田永功、陈永贤等4个党员，而且有了活动。

北张庄的党组织是由王继奎发展的，1937年8月，建立了一个党小组，小组长王自乐。组员有陈青元、王继贵、王芳兰等4人。他们也都参加了割电线活动。

1938年左右，国民党反动军队大约有1,000多人，驻扎在油坊到六集一带，买东西不给钱；还时常抓人去帮他们挑水、运物件，稍不如意，举手就打；园里的果子、蔬菜，更是拿了就走，头也不回。群众恨透了，又不敢说。崔胡同支部接到上级指示，对敌人展开斗争。

半夜，在顽军队伍的驻地附近，忽响起了枪声。这时，四野里静悄悄地，枪声更显得清脆响亮。吓得那群反动官兵，慌忙爬起来，如临大敌一般地四处搜索，一直闹到天亮，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晚上，枪声又响了，敌人又吵吵闹闹地慌了一夜。

第三天晚上，敌人提高了警惕，加班戒备，索性连觉也不睡了。可是，一直到天明，却又毫无动静。

第四天晚上，敌人实在晒了，也以为不会再有事了。不料到了半夜，就在他们的院子后面，又响起枪来，窗上的玻璃也被打碎了。吓得他们只好搬到另外一个村子去。

可是搬家的第二天晚上，这神秘的枪声又跟着来了。群众知道了，暗暗高兴。

打枪的是谁？就是崔胡同支部的同志们，他们轮流出动，每晚或者隔一两晚，出去打一次枪，打完就回来睡大觉，第二天一早，照样下地干活。

这半夜枪声，使敌人恨之入骨，公开悬赏要抓他们，甚至说，抓到共产党，有的还可以放，抓到打枪的，一个也不能饶。

后来，工作又发展了一步，一边打枪，一面还贴标语。这样，敌人才知道这打枪的原来就是共产党。

这种疲劳战术，坚持了很长一段时期，一直到敌人撤走。在整个斗争中，我们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这以后，党的活动，逐渐开展；党的组织，不断扩大。有时还在高粱地里和其他支部的同志一起开小组会，讨论工作，学习上级发下来的文件。1940年左右，龙王庄东北一带，已先后建立起近10个党支部。那就是：后张庄（书记：张万惠），任楼（任宝斋），油坊（王繼美），陈庄（陈造林），曹楼（马少曾），马路口（马福龙），石菜园（石其）。

星星之火，在这黄河北岸的龙王庄上，开始燃烧起来了。

我们的田区长

从1939年年底到1940年3月的那段时间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范县、濮县、观城、朝城，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联合政府。

担任第一任范县人民政府县长的是刘裕如同志，县委书记丁汉三同志。当时，龙王庄公社这一片，分属两区。堤东以六集为中心的第三区，包括沿黄河一线的60多个自然村。那时，由于蒋匪

帮在河南花园口决了堤，黄河已改道南流，这遗下的故道，只是一条沙沟，盘据南岸的日寇伪军，经常偷过河来，抢粮食，抓民伕，天险早已不能作为屏障了，形势是很紧张的。

年青的田子建同志，接受了党的指示和群众的委托，勇敢地担任了第二区区长。

田区长是本区田堽堆村人，也是本区最早的党员之一；田堽堆、孙楼、祝桥那一带的党组织，都是由他发展起来的。他是范、濮、朝三县联立乡师毕业生，教过两年书，担任区长之前是本区鬲子墓乡动员委员会主任。

也就是在1940年3月，蒋匪帮十军团司令石友三带了4个师2万多人，进占濮县，并且在那儿建立了范、濮、观、朝四县的反动政权，公然勾结日伪，妄想侵犯我抗日民主根据地。濮县邻近二区，十军团也跟河南日寇伪军一样，不断地前来抢劫扰乱。记得有一次，那是1941年10月，十军团的一批土匪兵，蹑到刘楼抢东西，群众赶来报告，田区长刚要吃饭，放下筷子就走，他巧妙地布置了一个包围圈，要群众藏在四周呐喊助威，自己带着游击队，迎头截住去路。结果，匪军全部被俘。这一仗，打得真痛快。事隔近20年，人们还能清楚地回想起当时的战利品，共有：27袋子弹，6把刺刀，6枝步枪和一架轻机关枪。

田区长虽然是学生出身，可是在党的培养下，他变的胆大心细，很会打仗，白天他和他的战士常常帮老乡们一起在地里干活，晚上，就一村又一村地到处巡逻。有一回，那是1941年冬天，他这支小小的游击队，突然和十军团的大队伍碰上了，对方至少有一团人。怎么办？还击！这一带的地形他们太熟悉了，又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敌人根本摸不清这边的虚实，乒乒乓乓打了一个通宵，到早上匪军都退走了，我方毫无损失。如果当时不沉着应战，情况倒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次，那是1942年1月的一个晚上，下大雪，战士们正在

屋里烤火，田区长独自在外边放哨，忽然发现雪地上有一个黑影，幌来幌去。当时，这里正在进行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坏分子有时还造谣、捣乱，甚至想勾结敌人来破坏。所以他一看见那鬼鬼祟祟的黑影子，就觉得不对，也没惊动屋里的战士，悄悄地绕到那东西的背后，大喝一声，一脚踢倒，果然是个偷过河来刺探情况的汉奸。

那时，田区长所率领的游击队，连同区政府的干部、通讯员，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四、五十人，二十多支枪。他们在一起工作、打仗、学习和劳动。田区长常常给大家讲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故事，详细解释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时候，老乡们对自己的子弟兵，特别是帮他们赶走了伪军、国民党的时候，又高兴、又感激，总想要杀鸡敬酒，殷勤招待一番。可是田区长不但从来不接受，而且即使吃了几个馍，也一定要按制度给票。

1942年9月27日，不幸的日子来到了。

早上，接到报告，河对岸东南方向，有敌人活动。田区长立刻带队出发，准备抢先守住沿岸高地，打击敌人。不料才跑到半路上，发现敌人已大批大批地过来了，而且还有骑兵。这时，对方也发现了他们，战斗就开始了。

这就是令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寇九·二七铁壁合围大扫荡的开始。当时，田区长还不能完全判断，只知道情况来得很突然、很严重。他叫战士们立即散开、转移，自己却带着少数人作掩护，并向东北撤走。他们从丁沙窝转到崔楼，又从崔楼转到旧城，绕了一个大圈子，还没有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包围圈却越来越小了。区助理员吴奇峯同志，不幸在中途牺牲。黄昏，他们转移到张庄东北方时，四周的敌人，正张牙舞爪地向他们扑过来。

这时，田区长已经知道脱围是不可能了。他把上衣一脱，伏倒在两座坟头之间的洼地里，一个劲儿地向前射击。忽然，敌方高声喊着他的名字，要他放下武器，还说什么“缴枪不杀”。原来那边有

个姓孙的汉奸，是堤东的人，过去见过田区长（这姓孙的汉奸，后来被镇压了）。

听了敌人的喊话，田区长打得更猛了。敌人也越逼越近，眼看着就要拚刺刀了。这时一颗子弹飞来，恰恰打中了身边的区助理员曹文端同志，他猛一回头，又一颗子弹迎面射来，我们的田区长就是这样英勇地牺牲了。

那一年，他还只有30岁。

吳桥之战

1940年3月，蔣匪帮第十軍团两万多人，进占濮县，分駐王樓、白衣關一带。无恶不作的蔣匪軍，到处奸淫擄掠，并且公然勾結日伪汉奸，暗害革命干部，打击进步群众。白衣關恰恰和我们这一区交界。因此，我們所受禍害最深，和他們的斗争也最激烈。

那年8月初，匪軍一股約两千人，进犯我龙王庄西北的顏村鋪，激战一天一夜，大败而逃，可是他們不但沒有接受教訓，到3月底，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一次的人数比上次多，来勢也較猛。首先便拚死命地搶占了吳桥。

吳桥，在龙王庄的东北，是一座两百多戶的自然村，也是范、濮两县县城之間的中心点，連貫着一条寬闊的大路。沿着这条大路再往东北，可以直达阳谷县。当时，这股匪軍妄想吃掉我建立不久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便和侵占着阳谷的日本鬼子結成一气，从而威胁整个冀、魯、豫边区，破坏抗战。

吳桥无水也无桥。村庄四周，有一道6尺多高、3尺多寬的土堤，村东聳立着一座樓房，可以憑高瞭望。村外田間，为了防禦日本鬼子的汽車，挖下了許多战壕似的沟道。这些，在軍事上都有一定的价值。

当时，天气还很热，地里长满了高高地玉米和高粱，这村望不到那村。

我們記得很清楚，正是快天明的時候，西南方向，響起了密集的槍聲。起初還沒有怎麼注意，以後越來越緊，才覺得這不是普通的小接觸了。接着幹部就來通知大家，作好準備，說是“十軍團”這回一定要來送死，八路軍只好跟他再干一場。

那天晚上，槍聲始終沒有停過，清早，這股土匪隊伍，大約四、五千人。從龍王莊、胡洼那邊過來，隨即又往東，到了付金堤、閔子墓。這一綫七、八里地，五、六個村子，每一個村子都有了“十軍團”，最多的是吳橋，鬧哄哄地總有一兩千。一進來就把那座樓房占住了，門口還站了崗。以後才知道，那就是他們的師部，師長叫做米文和，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

本來，在吳橋這一綫上，是有我們八路軍部队的，雖然人數不多，力量可真不弱，但是這一回為了要誘敵深入，消滅他們的力量，所以，打了一陣，就往東北方向轉移，一直轉到縣城，匯合了主力，就從左右兩邊散開，再向吳橋的北、東、南三面挺進，把這股匪軍圍住了。這些情況，事先當然不知道。所以眼看着我們的部隊轉移時，大家都慌了，尤其是老媽媽們，有的還拖着戰士們的衣服直流淚，他們心里也很難受，一邊走、一邊說：“放心，放心，我們就會回來的，我們一定會回來的。”

那天，敵人一進村，就搶豬、殺雞、搜東西，一面挨家挨戶地抓人，隨即被押着去砍樹，拖大車，所有的大路小道都給堵死了。同時，又把每一座房子的內牆打通，外牆挖洞，屋頂上加磚，土堤上挖掩蔽體……。

說實話，看了蔣匪軍的這股兇勁，有些好心的老鄉，不免替八路軍擔心。那時候，我們的部隊，還只有一些土槍和自己製造的手榴彈，機關槍少得可憐，用子彈都要受限制。可是“十軍團”呢，只講機關槍，村前村後，村里村外，到處都架滿了。怪不得他們那麼囂張。有的在唱小調，有的在吹大氣，說什麼“土八路一個月拿不到一塊錢，咱們中央軍，不打仗一個月18塊，要是打仗，還有外快”。

晚上，被抓去的人，統統关在那座樓房下面的院里。到了半夜，忽然有人喊起来：“八路軍来了！”这时，剛巧那个姓米的师长，站在樓上的窗口前发楞，吓了一跳，馬上叫抓人。原来是个叫吳洪典的老实农民在說梦話，哥哥吳洪鈞也被关在一起，这时他急得把弟弟一把抱住。站崗的早已跑过来，举起枪托就打，打得他們头破血流。

天亮了，远处又响起了枪声，是八路軍反攻了，不一会，閔子慕、付金堤一带的敌人，都往吳桥这边退下来。这时，那姓米的气得直跳，本来还想亲自审問吳洪典，現在又顧不上了，只哼了一声：“抓去埋了！”旁边有个当兵的，看着实在不忍心就說：“他們都是老百姓……”話沒完，一个咀巴打过来：“媽的，你敢通匪，一起干掉！”三个可怜的人，就是这样被活埋了。

这时，我軍的包圍圈，开始逼近吳桥，远远地已經听见喊話的声音。几个村外的敌人据点，接二連三地都被炸掉，村子里面的頑軍，沒命地向外打枪，步枪、机关枪，真象下暴雨一样。

我們的部队都隱蔽在青紗帳里，放上几枪，又停一会。每当敌方的枪声，有点松勁的时候，却又紧打一陣。

就这样，一直打到天黑。

天黑时，有一小股敌人，打算冲击去，可是剛剛出村，就被我軍的火力压了回来。

大概是敌人已經发觉他們的子彈快打完了，不跑不行了，所以到半夜，又組織大股的突圍。因为村西有一道沟，4尺多深，6尺多寬，直通胡洼，从胡洼还有沟，可以轉向西南，逃回他們濮县的老巢去。

突圍时，可真恶。那个姓米的师长和另外一个什么參謀长，举着手枪，在后头压陣。后面还有好几挺机关枪打掩护。头一批冲上去时，随着就退下来好几个，當場便給打死了。这样才逼出一股勁，逃出了吳桥，竄进了沟道。当时如果沒有那条沟，肯定都会全

部消灭掉。

当敌人正往村西突圍的时候，咱们的部队，已经从北、东、南三面涌上来，那时，村子里还有好几起打掩护的。吴端南家的后牆跟下，就有几个家伙还躲在那兒打枪，不料牆头上，猛然跳下了八路军，这挺机关枪，馬上哑了。

天亮以后，我們的大队伍回来了。一进村就亲热地和大家打招呼：“老大爷，老大娘，受惊了！”妇女們赶快燒茶送水，青壯年都帮着战士們去拆除障碍物。大伙兒乐得没法提，有人还笑着說：“想不到土炸彈比机关枪还强！”

战斗并没有結束，部队还要跟踪追击，我們很快地組織起来，打扫战場。可巧就在西南角的坟地上，发现一具穿戴得象个大官样的死尸，一摸，有手鎗，还有大把的鈔票，仔細看看，原来就是那个压后陣的敌人的參謀长。

虽然这股匪軍，一直到1942年3月，才被撵走，但是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到我們吳桥这边来了。

指揮这一場战斗的，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志願軍司令員楊勇上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上将。

血海深仇“九·二七”

1942年9月27日，是我們永远忘不了的日子。

那一天，阴曆是8月18日。論季节正是割豆子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日本鬼子和伪軍，对我冀、魯、豫边区，主要是范、濮、朝3县地区，进行了空前疯狂的所謂“鐵壁合圍大扫蕩”。

本来，在1942年以前，日本鬼子也曾几次进犯范县，甚至还一度占据范县县城，可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农村，掀起了大規模反扫蕩斗争，绝对不与敌人妥协，即使有人想出来做汉奸，这汉奸的寿命也保不了几天。以致日伪政权无法在这里落脚。

九·二七“大扫蕩”之前，这里的情况是比較安穩的。蔣匪“十

軍團”早被赶走，减租减息之后又展开了大生产运动，連年都是丰收，生活逐渐好转。

9月27日的早上，远处突然传来了枪炮声，不久东北角上出现了一队队打着太阳旗的日本鬼子，随后，东南、西南、西北……枪声四起，嘩嘩地就象下雨一般。日本鬼子、伪軍汉奸、騎兵、坦克，黑压压地滾滾而来。这时，我們才知道敌人又来“扫蕩”了，可沒想到竟有这么严重。

当敌人的包围圈逐渐縮小到龙王庄这一片的时候，李樓的共产党员李文朗和农会会长魏小会，因为掩护群众逃避，自己来不及躲藏，都被敌人抓住。敌人逼着他們要粮食，要八路軍。起先是毒打，最后竟綁在床上用火燒。一直到被火燒死，他們始終坚定地沒有暴露任何情况。

在宋大庙的村口，敌人抓住了宋南古，南古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一个騎在馬上的日本鬼子，一开口就問他：“八路到那里去了？”他摇摇头；又問他：“粮食藏在那里？”他还是摇摇头，其实，他都知道，就是不講。敌人一气，抽出刀来把他杀死在路上。

在东孙庄，50多岁的孙才起，他剛剛把粮食埋藏好，敌人就进了村，看見他头髮上还有糠灰，就逼着他去找粮食。他不去，揍他，燙他，都沒有用，最后，竟被敌人打死。

还有，在北曹樓，18岁的青年积极分子曹达树，被敌人用刺刀刺死；在田壩堆，60多岁的老头田勇絮，被敌人砍了一刀又丢进泥坑……。他們都是宁死也不暴露八路軍的行踪，宁死也不讓敌人把粮食搶去。他們，永远活在我們的心里。

敌人的瘋狂破坏，遍及所有的村庄。大批的粮食、傢具、大車、农具，被集中起来放火烧毀。那时，万庄、胡樓、曹樓、吳桥燒得最慘。万庄的房屋全被燒光了，曹樓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关在一起，放火时，虽然跑了出来，但都遭到敌人的毒打。还有許多村子的妇女受到侮辱，甚至因而死亡。

牛、馬、羊、雞、鴨、鵝……成群地被宰掉。喪失了人性的敵寇，吃牛光吃腿，吃豬要剝皮。滿地是血迹，到处是粮食。更令人厭惡憤恨的是，禽兽不如的敵寇，在面缸里拉屎，在飯鍋里撒尿，在井里投一切髒东西，污烟瘴气，惡臭熏天。可是他們却在牆上写着什么“皇道乐土”，“大东亚和平”。

敌人退走以后，党立刻领导我們进行恢复工作，还总结这一事件的慘痛教訓，研究今后反扫蕩的办法。我們的心，跟党靠得更加紧密了。

一年后，也就是1943年10月12日。敌人又来了一次“扫蕩”。这一回，事先都作了些准备。比如把粮食埋在地里，上面还种上庄稼；井口鋪上泥土；大車卸掉轆轤。……虽然他們照样的瘋狂殘暴，可是我們的損失已大大減輕。

这以后，每到秋收，我們就提前准备，还布置了种种陷阱，給敌人挖下了坟墓。可是他們沒有来，而且是永远不敢再来了。

冀、魯、豫边区青年大会师

1944年。

那是抗日战争的第八年，整个解放区开始了局部反攻，仅我晋、冀、魯、豫边区，就攻克了敌人1,000多个据点，打进了石家庄和保定。可是在国民党反动統治区，却是一連串的潰退，从湖南北部一直退到了貴州，丢失大小城市100多个。

在国际战場上，这是苏联卫国战争获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不但把德寇完全逐出了苏联全境，而且解放了羅馬尼亚、保加利亚等8个东欧的国家，苏联紅軍的胜利，迫使英美不得不在法国北部海岸登陆，开辟第二战場。同时，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也鼓舞了东方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孤立了日寇，造成了中国人民反攻的有利条件。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冀、魯、豫边区党委，在龙王庄——也就是

今天我們公社社委會的所在地，召開了一次空前規模的青年運動大會。當時，這個村子的人口，還不到1,000，可是來參加這個會的却有五、六萬人，這就把附近三、五里地的村莊統統都住滿了。

會場設在莊北，遠遠地可以看見一幅巨大的毛主席象，那是利用兩座樓房的牆壁并起來畫的，足有4丈多高，3丈多寬，旁邊還寫了一行說明：看這幅畫象時，要站到20丈以外去，站近了，反而看不清。

圍着會場，搭起了幾十個高粱席子蓋的篷，里面有各種各樣的展覽品：從敵人那里繳獲的戰利品，軍區所屬各個部隊和邊區各個機關學校的農業產品，手工業產品，還有蘇聯紅軍打擊德國法西斯以及我八路軍、新四軍打擊日本鬼子的宣傳畫……內容極其豐富。要是瞧仔細一點，3天還瞧不完。

廣場中間，靠南的那邊，搭着一座司令台。

5月4日早上，各地各機關的代表團和群眾，敲鑼打鼓地都來了。各縣的代表團有：范縣、濮陽、上霍、昆吾、青丰、南樂、濮縣、觀城、朝城、莘縣、壽張、陽谷、鄆城、鄆城等，各學校的代表團有：抗日大學、第一中學、運西中學、財經學校、筑先師範等。還有邊區的許多機關，只講設在我們龍王莊這一片的，就有魯西銀行（梁莊）、魯西兵工廠（宋樓）、軍區醫院（田柳寺）、魯西日報（梁莊）和新华書店（趙莊）等，另外還有鄰近幾個縣的農會、青救會、婦救會、青抗先（青少年民兵）、模範班（民兵）……的代表。

大會在隆重的軍樂聲中開幕，司令台上站着的是：區黨委書記黃敬，行署正副主任段君毅、賈心齋，軍區司令員楊勇，軍分區司令員曾思予，軍區參謀長李覺，邊區抗日大學校長王震南……。

大會由楊勇司令員擔任主席，黃敬和段君毅同志作報告。他們興奮地向大家指出：“今年會打敗德國，明年要打敗日本！”

大會一共進行了3天，頭一天閱兵：參加檢閱的有7團、8團、9團、16團、20團、基干6團和各县縣大隊、區基干隊，將近1萬

人。正規部队不但装备整齐,而且还有了不少的六〇炮、擲彈筒和輕机枪。地方武装也都是一色的三八式,多么威风啊!真給大家壯胆。

第二天和第三天是各項运动比賽:有射击打靶、丢手榴彈、刺枪,还有籃球比賽,由李觉參謀长当裁判,軍区第八分区打得最好,得第一,最后是賽跑,分男女兩組。現在我們公社孙樓生产队的孙守文同志,还跑了个小組第一名。

大家的情緒越来越高,比賽的内容,也越来越精彩,3天無論如何完不了。可是大会指揮部根据多方面的情況决定,还是在5月6日閉幕。

記得那天晚上,軍区文工团还举行了歌舞晚会,大伙兒一直看到天亮,都捨不得离开。

在敌后,在那么艰巨的条件下,居然能够举行这样盛大規模的集会,不但充分地表現了解放区广大軍民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更强有力地証明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和偉大。大会以后,無論在战斗上、生产上、文化学习上,普遍地掀起了一个波瀾壯闊的高潮。7月,同在这个廣場上,党接受群众的坚决要求,召开了反霸和扩軍的万人大会,當場枪斃伪乡长李子良。在激昂兴奋的口号声中,使我們預感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已逼在眼前了。

大 参 軍

1945年,整整打了8年的抗日战争到底胜利了,就在这偉大胜利的基础上,党又领导我們展开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的斗争,徹底地打垮了地主、富农,分得了胜利果实。当时,龙王庄这一片,每人平均3亩地。接着,互助組又鬧开了,大生产运动更搞得热火朝天,幸福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可是,国民党蔣匪帮,却又发动了瘋狂的內战。提起国民党蔣匪帮,就使人立刻想起“十軍团”的土匪兵,那是沒有人不痛恨,也

沒有人不鄙視的。在“小米加步槍”的條件下，還能打得他落荒而逃，何況今天？

果然，捷報傳來，1946年10月底，我晉、冀、魯、豫人民解放軍，就在那河對岸的鄆城，打了一個大勝仗，把敵人整編68師的119旅，全部消滅光。當時，我們出動了大批的擔架隊，吳橋等好幾個村都設立了軍醫院。因為工作做得不壞，邊區黨委楊秀峰和賈心齋同志，到這里來慰問傷員的時候，還特別表揚了我們龍王莊這一片的幹部和群眾。

1947年3月，反動派狗急跳牆，竟敢侵犯我黨中央和毛主席所在的革命聖地延安。當時誰聽了都氣憤。上級及時地發動了這次大參軍。本來，從七七事變以後，我們這里已組織過幾次參軍，但都沒有這次的規模大。

這一次的大參軍，是在土地改革勝利的基礎上提出號召的，是為了保衛土改的果實，解放全中國的農民兄弟，所以情緒格外飽滿，勁頭也特別大。

記得當時全區分小區開大會。到處都是扭秧歌，踩高腳，鑼鼓喧天。龍王莊這一小區，在綠豆園開會。會上，胡洼的代表提出，要在擴軍工作上立擂台，並且說，誰有胆量誰來打。話還沒完，吳橋的代表上了台，首先是支書和村長，帶頭送兒子參軍，接着黨員和幹部一個個爭先恐後地送兒子，送侄子，這樣光幹部子弟就有14人，再加上群眾整整30人。吳橋一共只有200多戶，平均7戶多有一人參軍，這一下就把胡洼的擂台打了，後來，在全縣的擴軍總結大會上，吳橋受到縣委的表揚，還獎給了3個參軍模範區。

大參軍的高潮，激動着人心。父母送兒子，妻子送丈夫的模範行動，不斷地涌現出來。石菜園的貧農石金榜，親自把他的獨生子送去參軍；王樓的老大娘郭秀雲，一共有8個兒子，她在擴軍會上公開表示：只把前妻生的一个兒子留下來，其餘7個，一到年齡就參軍，不打垮蔣介石，不叫他們回！

更使人兴奋的是几个区在顏村鋪召开了联合扩軍大会，会上崔胡同民兵队长范崇廷，已經 40 多岁，他带着 12 个民兵，背着枪，一齐走上台去，申請集体参軍，當場得到批准，这 40 多岁的老民兵，后来也上了前綫，打了一仗。

这一类的故事是說不完的，在我們龙王庄的 112 个村子里，哪村哪庄的軍屬戶都要占总戶数的 20-30% 以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青年参軍呢？看一看我們的公社史就明白：从前这兒是一片多么荒涼的土地，天灾人禍，虎去狼来，活在这里，比地獄又有什么两样？自从来了共产党，帮助我們，教育我們，打垮了地主反动派，分得了土地，安下了家，过上了真正是人过的生活，現在，国民党蔣介石却又想回来了，又想把我們拖回那老路上去了，还能不跟他拼嗎？所以，大扩軍以后，許多年齡不合、条件不够的，又搶着要搞支前。那时还发生过这么一回事：北張庄派了一队民伕上前綫去搞运输，一連跑了 500 多里，早已超过了任务，可是不但沒有一人开小差，而且上級要他們回来时，他們不肯回。

还有孙庄，那只是个 100 多戶的小村子，1947 年在河南張凤集战斗中，一次就出动了 80 付担架，在鄆城和集宁战斗中，更出动了 90 付担架。更有意思的是，在那几次战斗中，解放軍的伤員很少，蔣匪軍的伤兵却特別多。比如張凤庄那次战斗，孙庄 80 付担架，就有 60 付抬的是蔣匪伤兵。抬担架的，一抬到蔣匪軍不免有些情緒。上級发现了这个情况，及时进行了教育，打通了思想。后来，孙庄的担架隊員們，不但很好的完成了任务，有人还在路上省下自己吃的燒餅，送給那負了伤的蔣軍士兵吃。他們就是这样听党的話的。

刘邓大軍渡黄河

抗战胜利不久，黄河回归故道，干涸了 8 年的大沙沟，这时又巨浪滔滔。

南岸的日本鬼子走了。可是，虎去狼来，接防的却是蔣匪新五軍，听说还带着什么还乡团，打算过河来捣乱。虽然那梦想始终没有让他们实现，但对岸却时常放冷枪，派特务，甚至还使飞机来扰乱。当时我们全县的民兵，都集中在黄河沿岸，日日夜夜地巡逻警戒着。

1947年6月初，正是割完麦子，忙着打场的时候，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上级发下了紧急指示，号召全体民兵进一步加强黄河河岸的防卫。

这时，军分区参谋长兼河防指挥部指挥长孙大绅，副指挥长陈华锋都来了。他们和我们一起动手修工事，把引河（河汉）加长加宽，把渡口加大加深，又整理交通沟，挖掘掩蔽体，还插柳枝在上面伪装起来。

上下游的大船，很快地集中到引河里来，河上也加盖着柳枝，这附近几条引河，一共有了三、四十只船，大的可坐四、五百人，小的也能坐二、三百人。水手们不是开会，就是忙这忙那，谁也不乱说话。

后来才知道，这是我们的刘邓大军，要在山西、河北、河南和山东，分成许多处，一齐抢渡黄河，我们这一线，以龙王庄地区为中心，东到与寿张交界的孙口，西到与濮县交界的廖桥，全长80多里。河防指挥部就设在这堤东的林楼。

6月底了。一天傍晚，雄赳赳的大队伍果然开到了。也不知有多少人，只见从东到西，连成了一条线，怎么也望不到头，战士们还戴着用树枝扎成的伪装。谁都不说话，走得很紧张，也很起劲。队伍里不时地出现机关枪、大炮……，有人还说，他亲眼看见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骑在高头大马上，跟路旁的老乡打招呼呢！

晚上，黄河两岸，一点声音也没有。

第一批渡河的是奋勇队。

奋勇队奋勇当先，他们个个都那么年轻力壮，肩上背着马枪，

腰上插着手枪，背上挂着大刀，另外，还带着手榴弹。尔 威风不威风！

奋勇队出发了，他们先去拔“钉子”（顽军的碉堡）。我们都沉着气，蹲着在沿岸的交通沟里，枪已上膛，瞄准着对岸。

不到半个小时，对岸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枪声，但很快又没有了。不久，空船回来接第二批，才晓得对岸的那些锈“钉子”，一拔就掉了。于是，第二批，第三批……大队伍纷纷地开过去了，一直到天亮，始终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连枪声也很稀少。但回来的船只上，却装着一群群又脏又瘦的俘虏。于是，我们又接受了押运俘虏的新任务。

在我们这儿所发生的这场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中，如果一定要问受过什么损失，那就是渡河时淹死了一只骡子，但当时就捞了起来，上级奖给大家吃了。

不到一星期，捷报传来，刘邓大军一过河，就把盘据在对岸郾城的蒋匪 55 师的整整两个旅，统统消灭了。为首那个叫理明亚的副旅长，被我军当场捉住。

第四章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轱辘到互助

往年，这黄河滩上，人少地多，耕作粗放，可是在一定的季节，却又非常紧张。比如夏收夏种，秋收秋种，正当黄河汛期和雨季的前后，收割、耕翻和播种，都得抢时间。但那时候牲口既少，农具也不足，所以碰到农忙，贫农或中农户，便自然而然地组织起来，大家把耕畜和大农具伙在一起，你帮我，我帮你，赶着耕种，一般地都不计工，也不算账。好在这种组合，多也不过三、四户，劳力和土地大致相当，吃亏占便宜，问题都不大。人们把这叫做“轱辘”，它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1938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龙王庄开办了一个范县农民训练班，班主任由当时范县县长周子明（地下党员）兼任，学员将近100人，后来担任范县县委书记的丁汉三同志，当时也在这里学习。

这个训练班只办了3个多月，就由于反动派的破坏而停办了，可是它对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际的介绍，特别是对江西老苏区的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和大生产运动的知识的介绍，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大家明确地认识到：劳苦大众，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坚决地和反动派进行斗争，才能得到彻底的翻身，也才能搞好生产，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虽然我们的抗日民主联合政府，一直到1940年才公开成立，可是在那以前，地下党的活动，如贴标语、散传单、开穷人会，甚至分粮吃大户（没收地主的粮食分散给贫苦农民），已经不断地由秘

密轉向公开了。

1940年我們建政以后，首先就公开地成立农会，組織民兵，宣傳革命的道理，并对个别作惡太大、民憤太深的地主惡霸进行斗争。到1942年，大規模地开展了减租减息，反貪污、反惡霸、查黑地等一系列的斗争。

关于减租的具体做法，就是原来为“大种地”二五分租的，减成倒三七，即佃戶得七成；原来为“三堆种地”、佃戶只得三分之一的，减成倒三堆，即佃戶得三分之二；原来是“秋三七、麦二八种地”的，减成秋二五（各半），麦四六，即佃戶得四成；原来是“干半披种地”的，减成三七，即佃戶得三成。^{*}

至于减息的具体做法：当时一般通行的利息，高达月利5分，减息后降到1—2分，并規定在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以前所借的債，如已付还的利息，超过了本錢，那么本利一律停付。

当然，在这种改革的推行中，旧有的惡势力，仍然要作垂死的抗拒和破坏，可是在党的领导下，群众已經发动起来，革命的力量，势不可当，很快地就打垮了。对楊瘸子、李子良、刘洪恩、路紹唐、吳洪海等等大小地主惡霸反动派进行了斗争，斗出了大批的黑粮、黑地。接着就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又实行了农业稅合理負担的政策（对地主富农則是累进加級征收农业稅）。这样，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同时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也随着高涨起来。

当时，抗日战争正在緊張阶段，我解放区广大群众，在党的号召下，展开了大生产运动，争取增产更多的粮食，支援前綫。在这样的形势下，“格骥”便普遍地发展起来，虽然規模也只有两三戶，几十亩地，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群众开始产生了一种組織起来的願望，因为單純的单干，已不能适合客觀的要求了。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3月，偉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展开了。紧接着1947年又进行了复查。在当时龙王庄地区的

^{*} 当地几种租佃制度的剝削情况，可參看本書第二章第三节。

範圍內，共划出地主、富農 448 戶，占總戶數 20% 還不到，但他們却曾占有土地 7 萬多畝，占總耕地 75% 以上。

土地改革剛開始時，是開展獻地運動。可是真正獻出好地來的，為數極少，有些不法地主，更趁機造謠破壞。於是黨領導群眾，向地主進行面對面的鬥爭，並隨着運動的深入，普遍召開了訴苦會、鬥爭會，許多苦主在會上痛哭失聲，揭發出大量的剝削階級的罪惡，使廣大群眾都明確地認識到：“天下烏鴉一般黑，地主沒有一個好東西。”從而把這個長期以來壓在人民頭上的反動階級，徹底摧毀。

土地改革的勝利完成，帶來了一個新的熱烈的气象。當時全區每人平均分得土地 3 畝，以及其他生產生活資料。為了保衛這些勝利的果實，並進一步解放全中國的勞動人民，在黨的號召下，掀起了大規模的參軍支前的高潮。

這時候，人民解放戰爭又進入了緊張階段，以我們龍王莊地區來說，除了入伍參軍的以外，短期性出動抬担架和運輸的，經常在男整勞力 70% 以上。比如胡洼村，120 戶，共有男整勞力 80 人，出動 60 人。這樣，田間生產勢必受到影響。可是，土地剛剛回老家，難道就眼看着它荒掉嗎？群眾就主動地要求黨支部想辦法。

各村的黨支部，經過研究，接受了大家的請求，負責把全村的男女整半勞動力和牲口農具，一齊組織起來，統一調配，輪流給各家犁地、播種和收割。這種大規模生產勞動的組織，形式上雖然還和務農差不多，不計工，也不算帳，但是，已經有意識地在工作量的安排上，進行了合理的搭配，不讓某家吃虧太多，也不讓某家過分沾光。因而這種組織形式實質上已經是計工算帳的臨時互助組了。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農業生產領導進一步加強。互助組大量地發展起來，到 1950 年，在全區範圍內，參加互助組的戶數，已占總戶數 80% 左右，也就是說，除了地富，基本上都已組織起

来。而且其中长期性的互助组约占一半以上，每个组的规模，也逐渐扩大到七、八户，甚至十户左右，个别办得较好的组，已经采用了工票制，已经具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的雏形。

人多力量大

自从1946年黄河回归故道以后，虽然没有再决堤成灾，但是堤东的地，经常被淹，堤西靠近大堤那一带，涝灾的威胁也很大，因此在合作化以前，我们这龙王庄地区，长期都是生产救灾的重点，建国之初的几年内，国家贷放的救灾款，共达45万元之多。所以怎样抗灾保收，自力更生，就成为当时突出的中心问题之一。

当时互助组已经普遍地组织起来，但是毕竟规模小，力量不够。因此有的组就酝酿着要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了。田堙堆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田堙堆这座村子不大，才105户，420人，但有着1,660亩地，土改的时候，每人平均分得了4亩。在我们这里，特别是在堤西，田堙堆要算是土地最多的村子了。可是，他们的生活却过得并不怎么好。为啥呢？因为这个田堙堆，紧挨着临黄堤，地势特别低，一场大雨就能成涝。每年到了夏秋两季，看庄稼，长得还不坏，但一连几天阴雨，豆子、谷子、棒子，不是淹死，就是减产，所以产量一直提不高，平均每亩很难超过100斤，有时还需要国家的帮助。

1952年5月，县里召开防汛会议，县委书记在大会报告中，提到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的问题，认为合作社可以集中使用劳动力和生产工具，无论在防治水涝和发展生产上，都比互助组的力量大，他还介绍了好几个成功的典型例子。不过最后的结论，只是主张有条件的地方，不妨试办。

田堙堆支部书记田世娥，听了这个报告，越想越有道理，一回来就在党内进行讨论，大家也觉得很对。因为当时的防汛任务很重，可是一家的劳力有限，顾得了上堤，就放松了下地。同时，防汛

固然能解决大問題，却不能把本村的涝害也一起消灭，要征服涝灾，还得集中劳力，打埂开沟，可是要这样就得放下家里的生产，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现在有了，那就是成立合作社，把劳力組織起来，土地、牲口、农具也集中起来，統一調配，統一使用，困难不就解决了吗！虽然这还是一个初步醞釀，大家却好象社已办成了似地，就紛紛談起怎样分工，在哪里修地埂……这些具体問題来了。而且还有人当场就提出保証，一定吃苦在前，发挥共产党员应起的带头作用。

一散会，大家就連夜进行串連，不久，便成立了两个社，一个由支部組織委員田年一领导，共9戶，其中有党员4人；一个由村长田世芝领导，也是9戶，其中有党员6人，耕地面积都是130多亩，都有5头牲口，2輛大車。

合作社一成立，首先就抓紧了开排水沟和修地埂，只要是社里的地，地埂都打得結結实实的。有些零星小塊，也都設法并成了大塊，过去一下大雨，高处的水就往下冲，遍地橫流冲坏了庄稼，也流失了肥料，现在可不怕了。

大伙兒的情緒都很高。比如田朝一，土改时分到20亩地，但是劳力少，又沒牲口，碰到出工修堤，田里更是沒法照顧，虽然也参加了互助組，但到底要自己作主。种子、肥料样样都得自己动手弄，所以庄稼一直种的粗糙，日子当然沒法过好。这次入社，他从心里表示乐意，但最初还是有些顧慮，因为他地多，投資也攤得多，后来社里知道他有困难，就讓他緩一緩再說。这样，他才放下了包袱，干起活来，又踏实又勤快，早到晚走，一晌也沒缺过，到秋后，不但扣銷了他的投資，还分到了足够的粮食和零化錢。

田朝一家还能这样，別的戶就不必說了，合作社才办了不到一年，两个社的平均亩产量，都达到250斤，比社外群众，高出了两三成。这样一来，許多人都爭着要求参加，所以1958年的春天，田

年一社发展到 24 戶，田世芝社也发展到 19 戶。

可是，这一年黄河漫滩，水势严重，他們有三分之一的地在堤外，这一回全給淹了，同时堤内也浸了水，低处的庄稼全泡在水里，高处的庄稼却长的格外好。这时，大家都日夜排水搶救，可也还有象田永泉那样的人，开始另作打算了。

田永泉是新中农，全家 5 口人，入社前 18 亩地，一头牛，还和人夥用一輛大車，生活过得不錯。入社以后，本来还有些不放心，但头一年的收入很好，这才开始踏实。可是，誰知現在又遇到漲大水，这还不算，湊巧的是他自己的地，这回不但沒有受淹，而且由于社里管理得好，多上了肥，現在庄稼长的特別旺，他想如果跟大伙兒弄下去，說不定到年底会餓飯，要是退社，这 10 多亩地好庄稼的收成，还不全是他一个人的！

于是，就在人們苦干大干的时候，他却拉住社长喊退社，这一喊，甚至还带动了田代一、田世泉等几戶新中农和田宾一那戶貧农也跟着不干了。

支部耐心地向他們解釋教育，可是，除了田宾一，其余的人，一过秋都退了社。

这时，支部召开了紧急會議，会上詳細討論了当时这两个社的困难情况，然后决定集中力量，从三方面下手解决：抽調主要劳力 24 人，参加复堤工程，抽調会技术的 4 人，成立木料加工組，其余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只要能劳动的，尽量爭取参加冬季田間生产和积攢肥料，保証要把小麦搞好。

回想起来，1953 年的那个冬天，干得真猛，在堤上打碓的，不时傳來好消息：田永学，一个人指揮 5 盪碓，質量都很好；田訓一，領導打碓队，一連得到好几面紅旗，工程完結一算帳，帶回現金 2,000 多元。家里呢，男女老幼都出动，澆麦子，积肥料，誰也不閑。还有木工組，不但保証每戶社員天天有燒的，最后都收入了 500 多元錢。

就这样，胜利地度过了难关。

1954年春天，麦子长得特别好，麦收时，那个去年才退了社的田永泉，一连好几次来找田年一，说什么也要回来，社员们想起过去的事，都不大同意，田永泉就当众表示态度：“这次回了社，死也死在社里了！”

这时，两个社又扩大了：田世芝社发展到53户，田年一社发展到37户。

收完麦子不久，又发大水，不过水势比去年要轻，堤里的低洼地，经过几年来的培修，也能撑过去了，损失不大。

接着，豆子又闹虫害，在从前，碰上闹豆虫，最多用手捉一下，现在却有条件使用上喷雾器喷六六六，单干户看了都暗暗奇怪。可是秋后一收割，社里的豆子亩产在100斤以上，而单干户几乎是颗粒无收。所以这一年虽然连续发生两次灾害，但是两个社的收入，仍然比上年增加了。

1955年，来了个大丰收。两个社的亩产量平均都有300斤，比建社以前提高80%，每个社员平均分粮500多斤，另外，不但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社里还积存余粮1万多斤。

就在这巩固的基础上，这一年，敲锣打鼓地都并入了红崖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合作化前后

对于我们老根据地的群众来说，毛主席的教导是接受得比较早的。远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就开过会，听过报告，学习过毛主席的有名的著作：“组织起来”。1946年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就开始建立互助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基本上都加入互助组了。因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比较迅速、也比较稳。

不过，各地有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我们这黄河滩上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自然也有它一定的特点，前面介绍的

田壩堆初級社，是代表性比較強的一個典型，可是它並不是最早建立的一個社。

我們龍王莊地區的第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是1951年在吳橋建立的。那時整個范縣，一共還只有兩個社。

吳橋的互助組，本來就辦得很好，1950年以前，全村已全部組織起來，有的組還採用了工票。現在是在吳方山和吳方文兩個組的基礎上建社的。

農業社一出現，就引起了黨的重視。為了創造經驗，樹立榜樣，一方面國家在生產資料上給他們一些幫助；同時，吳橋的村支部書記，還把他自己的那個互助組，也一起參加進來，這樣就成為一個23戶、88人、350畝地的當時的大社了。那時他們最引人注意的一個行動，就是打破了重地輕勞的老規矩，而按照勞六地四的標準分紅。

1952年初，田壩堆、田柳寺村和曹樓也建立起農業社。到年底全區已發展到18個社，入社農戶占總農戶數的10%以上。社員的收入，一般每個勞動日分糧6—10斤，還有好幾個社，能分到11—15斤，比互助組和單干戶都高得多。

許多新社，一開始就辦得有聲有色。比如南曹樓的青年社，共99戶，黨員7人，團員18人。黨支部在研究工作時，重點抓住了發動婦女這一環節。因為全社的女整半勞力106人，幾乎與男整半勞力相等，如果能把她們的力量都使出來，生產上一定會搞得更好。可是過去這裡的婦女都不大下地，尤其是青年婦女。為此，幹部首先深入到群眾中去，一方面根據同工同酬的政策，鼓舞婦女的生產積極性，一方面根據實際需要，說服男社員不要輕視婦女，和怕婦女搶奪了工分的錯誤思想。接着就找出4個老媽媽成立了農忙托兒所。

婦女開始大批下地之前，社里還特地召開了一個會，由男社員在會上發言，表示歡迎，並保證幫助她們學習技術。

实际上妇女是很能干的，不但在积肥、捉虫、玉米人工授粉这些工作上表现很好，就是在田间重活上，有的妇女，如石运芝、王俊芝等也达到了与男劳力同等的水平。这一年青年社的社员，无论男女，收入大大提高，连吕水生、马王氏等身体弱的妇女，也做了相当于一个中等劳力的工分。

1953年新社大大增加了，共建立起85个社，1,525户。原有的老社共62个，925户，这一年扩大到1,463户。在劳力与土地分红比例上，一般老社多是劳七地三，新社则多是劳六地四。

这时，吴桥的那个社，已扩大到61户，定名叫先进社，领导力量也加强了，共有党员37人。可是新人社的社员，大多数是贫农，牲口弱，各种生产资料都不够。怎么办？这时社外的群众都在注意着他们，有的是希望他们作出成绩来，好向他们学习；有的却是些保守派，顽固分子，想看他们的笑话。

这一年夏天，普遍发生豆虫，先进社的社员们，男女老幼一齐动员，突击治虫。连60岁的吴刘氏、65岁的吴朱氏，雨天也打着伞来参加。结果扑灭了虫害，完成了计划，亩产150斤。而单干户呢，如同村的吴洪明家，20多亩豆子，每亩只收得30斤。收秋、种麦中，合作社总是象旗帜似的，跑在群众的前面，做得最快也最好。

同时，他们大力提倡养猪积肥。本来我们这里过去是不大养猪的，在党的号召下，农业社首先带头示范，几年来，养猪数量逐渐增加，这时先进社已达到每户一头猪，猪多了肥料也跟着增多，社里各户所积的肥料，按质论价，公平合理，大家都很卖劲。如吴段玉天天起早摸黑，一年就拾了50多车粪，加上其他收入，一家6口人，不但粮食够吃够用，而且还分得150元现金。这一年先进社平均亩产粮食260斤，不但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任务，全社户户都有余粮。比建社以前，产量提高了一半；比一般单干户，产量提高了1倍。这样，合作社的基础就更加巩固了。

虽然运动的发展很快，整个工作的进行也比较顺利，可是这并

不是說我們這兒就一切都沒有問題了。不，特別是在兩條道路的鬥爭中，問題還是存在的。

比如群房村的老中農石德全，看見大家都辦社，怕將來和貧雇農弄在一起吃虧，就找上幾個門當戶對的老中農，形式上把牲口合了槽，就揚言他們也辦了社，實際卻還單干，甚至打算做買賣。

另外，還有些所謂底子厚的中農戶，雖然進了社，總覺得他的地多、地好，人家沾了他的光。比如先進社，年年增產，可是這個社的老中農吳端仲，拉上個懶漢吳榮昌，硬說什麼不合算、不自由、太辛苦，吵着要退社。人家幫助他，他還說：“出社自由是社章規定的”。但是一旦當真同意他出社，把帳一算，發現他早已超支，還得向社里還錢時，他卻又要等等再說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後雙廟的韓福增社，原來的基礎就不好，領導骨幹也不夠，1954年3月一成立，就受到一些落后分子的影響，發生不團結的現象，到6月，這個社就只好散掉了。

對於以上這些問題，由於領導發現得早，一一進行了適當的處理，雖然在群眾中也曾造成了不好的印象，但整個運動的步伐，還是健康的。

1954年，這裡普遍獲得豐收。以吳橋鄉20個初級社為例，各社平均畝產糧食248斤，每個社員平均合691斤，與入社以前比，95%以上的社員都增加了收入。而同在這個鄉的單干戶，畝產卻只有180斤，收入顯然低於農業社。

在農業社普遍增產增收的影響下，到1955年春天，要求入社的農戶，越來越多；有些互助組，更是迫切地希望轉社。同時，好些初級社，因為要發展小型水利，改良土壤，而現有的形式，社小力薄，干不起來，所以又產生了想辦聯社，也就是改成高級社的願望。

誰知這時忽然吹來一股歪風，說是合作化太“冒”了，不要說有的互助組不許轉社，甚至有的已經建立起的初級社，還打算要它轉成互助組呢。於是個別村，只好偷偷地辦起土地不分紅的“黑社”

来。

这一年7月底 毛主席的偉大著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发表了。他极力地支持农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要求，并且明确地指出：合作化是五亿农民的方向。

消息傳來，大家都从心里感到高兴，都说毛主席到底能了解我們庄稼人的心。接着，各村支部就組織大家細心地学习，深入地研究討論党的政策。明白了党的政策以后，群众的觉悟更高了。在党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指导下，我們这里，也和全国广大农村一样，掀起了一个波瀾壯闊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高潮。

当时，首先被批准建立高級社的，就是吳桥的先进社，共有800多戶。不久，也就是在1955年年底以前，我們堤西堤东，一共建成了34个高級社，入社农戶占总农戶95%以上，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任务，至此已胜利完成。

1956年春天，阴雨連綿，对小麦的生长，影响很大。但这时我們的条件不同了，我們成立了高級社了，大家冒着雨，开沟排水，增施肥料，終于保證了小麦的丰收。全区全年产量仍然达到每亩179.8斤。更值得提出的是，为了适应高級合作化以后的新的生产条件的要求，上級为我們引进了大量优良作物品种，包括碧蚂1号和4号小麦，胜利百号甘薯，这些良种以前誰也沒有种过，要是在过去，决不可能一下子就成千上万亩地推广开来，但是在今天，30万斤甘薯还嫌少呢！同时新式农具也推广开了，各社各生产队，都爭先添置新农具，如双輪双铧犁，平均每队都达到4—5張。为了增施肥料，又打破了旧有的专施农家肥料的老习惯，开始購用化学肥料。

合作化的完成，尤其为鳏寡孤独的五保戶，带来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如以吳桥社为例，这里的五保戶都得到了口粮和現款的补助。合作社还为他們添購了一些日用必需用品，供給了足够的柴草。这样不但使孤苦无依的五保戶，笑逐顏开，也使广大群

众,都感到党的政策的温暖和偉大。

以上的情况,比較全面而概括。至于具体到某一个生产队,那么,高級社的优越性的体现又怎样呢?后面所介绍的田柳寺村,就是当时一个代表性較强的典型。

冰天雪地战沙荒

我們这黄河边上的土地,也有它的特点,比如两个村子,虽然相隔不到几里地,可是土質的肥瘠,却可能相差很远,因为这一带从前經常受水淹,水漲水退时,有的地方很急,有的地方較緩,一般說来,急流之处多沙地,緩流之处多淤地,沙地瘠薄,淤地肥沃,同样种庄稼,收成就大有差异。而这里所要講的田柳寺村,恰好就在那瘠薄的沙地上。

田柳寺村小得很,七十多戶,三百多人,男女整、半劳动力加在一起才一百五十多个,耕地一千二百多亩,可是三分之一以上都是飞沙地。

沙地又叫飞沙地,只要有风,飞沙即起,顿时迷漫天空,关着大門吃飯,还向碗里落沙。干活时睁不开眼,种下的麦子,被刮的露出根来,当然长不好,一亩地还打不上50斤。

其实,飞沙地并不是治不了的“死症”,挖地三、四尺就有淤土,只要来一个“翻淤压沙法”,把淤土翻上来,盖个七、八寸,沙土就可变良田,获得高产。

这法并不希罕,人們大都知道,而且也还有实践的經驗,比如凡是挖过路沟又填平了的地,都能长出好庄稼,甚至1954年剛剛改建初級社的时候,家西翻了20亩地种谷子,每亩合550斤,比不翻的多产了1倍以上。

那么为什么不繼續翻下去呢?

主要的原因是初級社,土地还要分紅,有的人說退社就退社,地边子也不好平掉。再說,这八、九百亩沙地,可不是一下子都翻

得了的，必須一塊一塊地按輕重緩急來辦，可是又先翻誰的後翻誰的呢？何況還有一些互助組甚至單干戶的插花地夾在中間。要是土地不分紅，都按勞力計酬，再把地塊好好調整一下，那就好辦了。所以當1955年秋收以後，這一片8个村醞釀辦高級社的時候，我們田柳寺村表現得最積極，差不多全體一致首先贊成。不知道這種情況的人還以為是我們村子窮，想沾人家富村的光呢！

我們的高級社是那年11月成立的，是全區最大的兩個社之一，有八百多戶，村支書田學之被選為副社長，田柳寺村劃為一個大隊，6個小隊，全村13個黨員，都分配到各個小隊，領導力量比初級社更強了。

記得上級正式批准我們建社的那一天，正下雪，屋子裡還有人烤火呢，支書一宣布這個消息，大家就表示要立刻拿行動來報答黨的關懷。什麼行動呢？深翻地，現在不是有了條件嗎？田學之是個說干就干的人，這時他扛起鋤來，喊一聲走，大伙兒就跟着出去，當隊長的立刻把隊員們都集合起來了。

可是，十個指頭也不會個個一樣長，有的人雖然來了，但却在嘀咕：“窮擺壞，哪有個寒冬臘月去翻地的。”有的說：“凍的噓噓響，還要深翻，這不是胡鬧嗎！”

怪話還沒完，路學才、石學德這幾個棒小伙子沖了上去說：“上級說要變冬閑為冬忙，你不知道嗎？家西1954年深翻的那塊谷子地，以後比沒深翻的多收了一倍糧食，你不知道嗎？”這時黨員宋傳才連忙出來解釋：“咱村這些飛沙地，要不改良，能行嗎？現在周圍8个村都是一個社了，咱這窮村不加勁能趕得上去嗎？從前想深翻沒條件，如今有了條件還不加油干？”

經過這麼一說，大家的看法逐漸一致，於是，就在地裡商量的包工定額的辦法，動起手來。

冬天日子短，風又大，人們都躲進屋子裡了，可是田柳寺村的人們卻鼓起了勁，在大搞深翻。區委書記徐德謙同馬主任等好幾

个干部都从三里外的龙王庄赶到現場来鼓励他們。

第三天,我們正在繼續深翻地的时候,徐書記又来了,还带来了大批的人,仔細一看,原来是許多外社的社长、支書,有的还說是从几十里以外特地赶来的。他們是来參觀的。

这以后,參觀的人越来越多,都說要跟我們学习,劳动的光榮,大大鼓舞了大家的热情,60多岁的老黃忠段万舉,三个孩子的媽媽孙玉彩,过去素来懶得干活的路学周,这一次都跑到群众的前面来了,雪天也不停工。这还不算,过去新娶的媳妇,不要說下地,連大門也不迈的,可是現在也投入了战斗。

支部发现了这个情况,觉得太緊張了,不大好,就决定正月初六放一天假,可是那一天只等群众一出村,石学之、宋傳才、王学彥等几个黨員干部,又背着鉄銚下地,不料被宋傳貞等人看見了,大家都跟着赶来,人家問,他們就說:“干部黨員不看戏,咱为啥要去看?”

第一批 287 亩地深翻任务,就是这样胜利地在冰天雪地中完成了。

从深翻地起,田柳寺村生产队隊員們的勁头越来越足,干啥都是兴高采烈的,比如上級号召养猪积肥,他們戶戶齐动手,很快就达到了每戶一头半猪,連續获得地委和县委的奖状。

是的,正由于他們听党的話,踏踏實實地搞好了生产,特別是在高級社的新条件下,大大地發揮了高級社的优越性,所以这个“穷沙窩”,很快地就变成了“粮食窩”,不信,就看他們轉高級社后的头一年的成績吧:

全队平均亩产粮食 320 斤;

全年工值每个劳动日 1.26 元;

平均每人分得口粮 570 斤,棉花 10 斤,油 5 斤;

另外,还有各人数目不等的現錢。

大辯論、大跃进

我們在 1955 年實現了合作化，1956 年又在主要作物——小麦受災的情況下，仍然獲得了丰收，比上年增產 14.7%。廣大社員群眾，特別是貧農和下中農的生產積極性，越來越高。可是，這也並不是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就此結束了。事實上：農村的地、富、反、壞分子，不少還在幻想着回到舊社會的老路上去。他們有的好吃懶做，有的造謠言、講怪話，硬說什麼“合作化搞糟了”，“糧食統購統銷搞糟了”，“城市是天堂，農村是地獄”，“共產黨的領導不好”等等，和資產階級右派，同時發動了向黨的猖狂進攻。

當然，絕大多數久經革命考驗的群眾，是不會受騙的。可是也有個別落後分子，受到那些怪話的影響，甚至發生退社的事件。比如油坊村，同時有 7 戶社員不干了；劉樓村，一個 30 戶的社，剛剛辦起，就被這股歪風吹散。總計在 1957 年春天的那段日子裡，思想動搖，立場不穩，想退社或者表示消極的，約有 110 戶左右，相當於入社總戶數的 1.5%。

針對着這一嚴重的情況，區鄉黨委根據黨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和“在農村中開展一次大規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的精神，在上級黨的領導下，發動廣大群眾，及時地開展了大鳴大放、大辯論。

大辯論一開始，大家集中力量，首先駁斥了“合作化搞糟了”的胡說。大家以親身的經歷，列舉大量的事實來質問：如果不是在黨的領導下，實現了合作化，我們這裡的產量，能一年年地上升嗎？如果還按照資本主義的辦法辦事，那麼一個大地主楊癩子，就能斷絕幾百個單戶的生路，貧苦農民還想翻身嗎？再說，按照我們的規劃，以後要大搞水利建設，實現農業機械化，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可是，要達到那個目的，單干能管用嗎？

对于粮食统购统销的问题，有好些人一边辩论，一边就哭了。因为他们想起过去灾荒年，为了一口袋高粱，以至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女卖掉的情景。那时候，青黄不接时，粮价上涨，只等粮食一收获，粮价就猛跌下来。囤积粮食的地主奸商，掌握着生产粮食的农民的命运。现在呢，粮价始终很稳定，而且就在合作化以前，我们这里还是生产救灾的重点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发生过逃荒饿饭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问：到底是誰要反对这样好的政策？难道他还想大斗进小斗出，买卖黑粮来陷害我们吗？

还有城乡关系的问题，我们虽然很少过过城市生活，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到城市去过。大家只知道在党的领导下，处处都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从来没有感到什么不公平。这几年来，城市给我们的支援很大，化学肥料、双轮双铧犁、解放式水车，以及各种各样的花布、毛巾、热水瓶、脚踏车……不都是城市供应我们的吗？比起旧社会，不要说化学肥料、脚踏车，就是花布、毛巾，我们这里也不容易买到啊！农村把农产品支援城市，城市把工业品支援农村，这不是很好的工农联盟吗？为什么有人在这上面也想来捣乱呢！至于说天堂地狱，我们只知道旧社会是地狱，新社会是天堂，我们的生活，有良心的人，谁说不是越过越好呢！

在辩论到党的领导好不好的问题时，群众情绪更加激昂了。全体一致地表示：如果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我们大家。且不說党领导我们翻身闹革命，打垮了日本鬼子和蒋匪帮，也不說党领导我们打垮了地主、富农、奸商对我们的剥削和压迫，从而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我们这生长在黄河滩上的人，就只要想想这些年来，治黄河、抗洪水的情况，要是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还能够在本乡本土安居乐业吗？恐怕只能是年年逃荒，处处要饭，甚至死在外头吧！

经过这场大鸣大放大辩论，彻底地驳倒了地、富、反、坏分子的反动言论，部分资本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富裕中农，大多被说得心服

口服，貧农和下中农在这一場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不但打垮了对方，也提高了自己。

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又深入地进行了整党整团整社的全民整风运动。絕大多数干部，都表現得很好，能虛心接受意見，也能很快地改正自己的缺点。个别問題較多的，如吳桥村支部書記吳洪州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資本主义和右傾思想，則受到了徹底的批判。另外还有个別不称职的干部，調整了工作。

在整风中，对广大社員也同时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批判了干活不积极，不爱护公共财产，不互相帮助甚至貪小便宜，乱拿社里的东西等等不良作风，这样从上到下地全面檢查整頓之后，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普遍提高。大家都决心拿出实际行动来，表示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拥护。

这时，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具体到我們这里，在总路綫的指导下，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

上級首先帮助我們学习了党中央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綱要(草案)”。按照规划，我們这兒属于亩产500斤地区，1957年虽然又比1956年增产了13.6%，达到亩产粮食205斤，可是距离500斤，还相差一倍半左右。那么能不能来一个大跃进，提前超額完成呢？于是又开展了一场先进者和保守者之間的大辯論。

有人認為時間还长，不必性急。因为我們这一带土地瘠薄，气候条件也不行，每亩能增产三、五十斤，就很不容易了，再多是办不到的。在談到增产技术的时候，他們反对密植、反对深耕、反对新式农具……，总而言之，他們对一切新事物都抱怀疑态度，对农业增产大跃进沒有信心。

可是，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經過社会主义教育，解放了思想，发挥了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看問題，搞生产，就完全两样。他們学习了外地的成功經驗，也調查研究了本地曾經出現过的个别

丰产纪录,大胆地向党提出了要大干一番,争取在1958年就完成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指标的要求。

党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征求了群众的意见,最后决定支持这个正当的要求,并决定立即动手。首先党委书记徐德谦亲自挂帅,和社员同吃同住同搞试验田。于是党团员和干部,都跟着大干起来,他们提出了“四前”和“三后”的行动口号:起床在前、吃苦在前、劳动在前、学习在前;上床在后、休息在后、享受在后。干部这样带头,群众情绪更高,干劲更足。整个龙王庄地区都沸腾了,个个赶先进,人人争上游。他们提出的行动口号,尤其生动:

以淮海战役的规模,万里长征的意志,
解放台湾的决心,上甘岭战斗的勇气,
夺取华山的智慧,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不得到大丰收,决不罢休!

秋收前,各社各队的庄稼,长得实在好,由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的试验田,更是密茂苗壮,空前未有。如北张庄的大豆,后来亩产达1,250斤,胡洼的谷子,更高达1,300斤。

在总路线的指导下,在大跃进的鼓舞下,我们龙王庄人民公社,及时地诞生了。这一年真是喜气洋洋,一个胜利紧接一个胜利,年终总结,全社每亩粮食作物平均亩产550斤,提前9年,超额一成,完成了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历史任务。

人民公社的诞生

1958年的春天,在全民整风和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胜利的基础上,掀起了空前未有的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庄稼都比往年管理得好,生长得壮。同时,许多村支部,还不断接到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决心书或者口头申请,要求大干一场,彻底改变我们这贫穷地区的落后面貌,继续发扬革命根据地的光荣传统。有的建议要修一条20多里长的大渠,把春景湖那边的水引过来灌溉农田;有的主

張自己办工厂,改良农具,生产化学肥料……。

那时候,我們堤东堤西,还分成六集和龙王庄两个乡,两乡共有34个高級社,每个社平均不过五、六百个劳动力,只說开一条大渠吧,首先就得渠道两边二十多个社大家都动员起来干才行。但事实上,下游各社对供水問題,事先总是不大放心的,何况要集中几千个劳力,無論組織上和分配上都不是一件小事,所以暂时还是把計劃擱下了。

至于办肥料工厂,自己生产土化肥,从生产需要上看,那是迫不及待的。过去这兒經常漲大水,水退后,留下一層淤泥,勉强代替了肥料,所以长期以来,就这么养成了不注意施肥的习惯。解放以后,十年来黄河大堤安然无恙,保障了我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但是如果再不抓紧施肥,地力就会逐渐衰退。可是肥源在那里呢?主要的固然是发展畜牧业,大量积肥,但假若自己能办个肥料厂,豈不更解决問題?自从合作化以来,我們都施用了化学肥料,懂得了它的好处,可惜数量太少,不能充分供应。然而自己办厂,靠一个几百戶的农业社来办工厂,資金、技术、原料等一系列的問題,又怎么解决?

这时候大家就开始在捉摸:能不能办一个比高級社的組織規模更大、活动范围更广的大社呢?

麦收以后,黄河泛濫,洪峯曾一再超过保証水位,許多首长都亲自上堤,和数十万民工一同搶險,經過日夜不停地奋战,終于保住了临黄大堤,战胜了特大洪水。

事前,在搶險的緊張阶段,为了預防万一,在上級的統一安排和帮助下,堤西群众,騰房讓屋,把堤东三千多戶都接了过来,一一安了家。堤东的群众,想到过去世世代代一遭水灾就要逃荒,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妻离子散,而今天碰上了这样严重的洪水,还能在本乡本土,照样劳动和生活,对比之下,从心里感到党的偉大,感謝乡亲们們的帮助。于是大家就想如果堤东堤西办成一个大社,豈不

更好？何况堤西本来缺乏劳力，要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村小工厂，将更感劳力不够，而堤东却经常是秋季涨水，不能长年干活呢？

这时我们听到河南新乡七里营办大社的消息，好象他们办的那个社，正和我们想的差不多。新乡离这儿很近，大家要求党委派人到那边去参观。参观人回来传达以后，真使我们高兴得跳起来。那正是我们想象中的大社呀！不过我们还没有想到要把它叫做人民公社。

1958年8月9日，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到了山东，他指示说：“还是人民公社好”。这消息传到龙王庄的当天晚上，各社各队都自动地开起会来，会上，人人都表示了要求办人民公社的愿望和一定能够把人民公社办好的决心。第二天一早起，就有八千多户送上了申请书。大伙儿干劲冲天，都要拿出最好的成绩来迎接公社的成立。如华丰二社一百多个社员，一个晚上就突击送粪63万斤。

这时候，虽然早已立秋，天气却还很热，那些天，我们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却留心着打听办社的事，因为在我們全县，这还是头一次办公社，上级会不会同意呢？

好消息到底来了，我们的申请书被批准了，而且决定在8月26日开成立大会。

本来，村干部早就告诉我们，因为天热人多，大会要到晚上才开。可是那一天，天不亮就睡不着了，天一亮，四方八面的大人和小孩都到龙王庄来。胡洼生产队130户，便有一百多户的門上上了鎖。80多岁的张锦义，扶着个手杖，笑裂了嘴，还说这是他一辈子头一回出远門开大会。

会场可真热闹，红红绿绿的标语棚，从南到北，说少点，也有两里地长。老远就听到了鑼鼓声，走近一看，嘿，那是胡楼的腰鼓队，一个个打得满头大汗；那是万庄的学生在打洋琴；高庄的喇叭吹得直上云霄；綠豆园的鉄炮看样子就不同凡响……。

主席台在家北呢，但怎么也挤不过去。本来我們公社男女老小，統統算在一起也不过3万多人，可是，今天起碼也来了六、七万人，可不是么？龙王庄那么些井的水都喝光了，还要到祝庄、万庄去挑。原来全县各机关、各农业社都派了代表来参加这一次盛会。

天快黑了，电灯、提灯、煤气灯、沼气灯……一个个象小月亮似地放出光来，打记事起，那見過这么好看的場面啊！爱穿花衣服的姑娘們，象蝴蝶似地飞来飞去，小孩子拍着手一个勁兒地在笑。

这时，三声炮响，开会了。

一开始就是社党委第一書記徐德謙作报告，他的声音，大家最熟悉，他向大家宣布：从現在起，龙王庄人民公社正式成立了！接着群众中响起了一阵暴雨般的掌声。

然后，县委第一書記謝惠玉作报告，他清楚有力地告訴大家：“这个大会是庆祝龙王庄人民公社成立的大会，也是全县办人民公社的动員大会”。

是的，这一天不但是热烈地庆祝我們这一个公社的成立，也是在欢欣鼓舞地迎接我們全范县的人民公社化高潮的到来。瞧吧，那些远来的客人們，紅光满面，喜气洋洋，跟我們一样地高兴，他們还带来了許多出色的礼物：吕村乡建国社的是一株結了二百多个果的花生，大張家乡李楼社的是一个一尺多长的大玉米，羊二庄乡青年社的是一个两斤多重的高粱穗。

繼續作报告的还有許多首长：县长李普光，省委檢查团代表程蔚堂，地委檢查团代表張科常等，都是那么亲切地关怀我們，鼓励我們，指示我們：“这是全县的头一个公社，大家一定不能驕傲，不能自滿，一定要繼續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把公社办好”。

大会一直开到半夜，文艺节目有大会演、戏剧、說唱、花鼓、音乐和电影。

天亮了，可是誰也不關。

在欢乐的鞭炮声中，我們打着紅旗，敲着鑼鼓开始遊行，遊行队伍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呼声。是的，我們的公社成立了，从此我們都是人民公社的光榮的社員。

我們的人民公社，一共有 112 个自然村；8,841 戶；37,312 人，其中男的有 17,915 人，女的有 19,397 人，男整勞力 5,779 人，女整勞力 6,770 人；男半勞力 1,469 人，女半勞力 1,570 人，男女整半勞動力共 15,588 人；分別組織 10 个生产大队(管理区)，43 个生产队，225 个生产小队；耕地面积 97,000 亩，其中堤东 40,000 亩，堤西 57,000 亩。

社党委第一書記是徐德謙，第二書記是姜玉林，第三書記是安修杰；社长和副社长是安修杰、姜玉增、黄广順(1959 年社党委由县委組織部长秦凤翔兼任第一書記，徐德謙任第二書記；社长改由容珂英和梁毅民担任)。

第五章 人民公社第一年

胜利的开端

到1959年8月26日，我們龙王庄人民公社已經历了光輝燦爛的第一年。

晚上，正在我們热烈地庆祝公社成立一周年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出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決議。每一个社員都及时收听了党中央的偉大指示和号召。決議的每一个詞句，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們的心。是的，“在总路綫的指导下，我国人民不但在去年实现了大跃进，而且今年在繼續跃进，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不但巩固地站稳了脚根，而且日益显著地发挥它的优越性”。

具体到我們龙王庄公社來說，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就体现在我們眼前的許多事实上和一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績上。

今年5月到8月，我們这里一百二十多天的降雨量，还不到200毫米，比往年同时期减少了一半以上，尤其是关键性的6月份，几乎全月无雨，而且天气奇热，最高曾达47°C。要是在旧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早就搞起“晒关公”、“哭皇天”等等来了；要不就是放下鋤头，嘆口气，带着老小逃荒。

今天，我們建立了人民公社，我們不但有魄力，而且也有条件战胜旱灾，爭取丰收。

过去这龙王庄一带，用在农田灌溉上的井，一共才一百多眼。1958年大跃进以来，猛然增加到994眼，其中有十分之一以上，还是机井，另外还修起了37个水庫，挖掘了39条渠道。

本来，这已有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設，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对

付过去的。可是遇到今年这样40年来未有的大干旱，显然还感到不够。于是，我們要求上級，再开一条大渠，把黄河的水也引过来。

感謝上級的好領導，很快就批准了我們的建議。救旱如救火，分秒必爭。8月15日才動工，8月17日就完成了。全長21里，干渠口寬3丈，底寬6尺，另外還有斗渠5條，共挖了15萬公方土，動員了4,983人，突擊了三天兩晚。省水利廳又連夜派了機械大隊來支援，渠一修成，700匹馬力的抽水機，立即開動，黃河的水通過虹吸管，嘩嘩地直流過來，澆遍了從楊集公社到我們公社這一片4萬多亩田地。

這還不夠，為了徹底作到“有旱抗到底，無雨保丰收”，並打下長期的鞏固基礎，上級又批准了在鄰社于付莊修築一座引黃灌溉渠閘的建議。這座大渠，預計能輸送20—30個流量的水。從此，千年旱魃，將一去不復返了。

60個小時，挖起一條21里的渠道，在從前那是不可想象的事；然而今天，在我們人民公社建立一年來的大協作中，這一類的例子還多着呢！

1958年秋分前後，不到10天，就把堤東32,000畝小麥，全部突擊種上了。

8月初，黃河漲大水，堤東都被淹掉，以後水退了，淤泥好幾尺深，腳一插下去就拔不上來，怎麼耩麥子呢？而要種麥的面積又那麼大。等土干一點再動手吧，可是眼看著寒露都過去了，不播種不行了。於是在社黨委的統一指揮下，全社男女整半勞力15,000多人，全體總動員，突擊10天，勝利地完成了任務。

這個經驗很成功，接着就在堤西也推廣開來。我們這15,000多人的大兵團，分別組成犁地、整地、播種、積肥和施肥、收割、管理、灌溉7個專業隊。真象作戰一樣，大軍所到之處，一切田間耕作，一鼓作氣地立即完成。

在1958年秋天到1959年春天的那段日子裡，龍王莊這一片，

簡直不是农村,而成了一個大規模的农业工厂。到处是帳篷,到处是人。口号声,欢呼声,鑼鼓声,响徹云霄。

在那一段時間里,除了打井、修渠、种麦、收割庄稼以外,我們还深翻土地 32,000 亩,深度至少是 7 寸;又薰肥近 1 万亩,每亩 20—30 万斤。

我們的土爐还炼出了大量的純鋼。

这还不算,我們又先后派出精銳队伍,支援外地。前往平阴县帮助突击种麦一次就有 1,500 人;前往参加修建黄河位山水利工程的,一干就是 83 天,并以每人每天平均挖 27.2 立方米的记录,夺得全县在这个工程中的帅旗。

接着,我們又掀起了争取小麦丰收的高潮,搶种甘薯的高潮。总而言之,我們的工作是一环扣一环,一个勁兒地向前迈进。

在抓季节性的突击任务的同时,我們經常的工作,不但照旧进行,而且也是加速度地全面跃进。在我們龙王庄的历史上,無論是农林牧副漁,也無論是工农商学兵,就沒有一年发展得这么快,建設得这么多!

自从公社成立以来,我們这兒的人数和戶数,并沒有什么增減;耕地面积,也还是那么多,为什么能获得这样飞速的进展呢?

这是因为党的正确领导,是因为人民公社发挥了它的优越性。

首先,因为人民公社的組織規模,大大超过了原有的高級社。以前的高級社,平均每社只有两、三百戶,三、四百劳力,两、三千亩地,現在的人民公社有八千八百多戶,一万五千多个劳力,九万七千多亩地。人多力量大,因此就能够克服过去所不能克服的困难,办过去所难办到的事。

其次,人民公社的活动范围,大大地超过了原有的高級社。以前高級社的活动范围,主要只有农业生产这一項,林牧副漁各业尚难一一照顾,更何况工商学兵!現在不同了,工农商学兵齐头并进,其中尤其是工业生产,更是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

第三,在整个公社的范围内,生产和分配可以统一筹划。比如上面提到的堤东突击种麦的例子,如果不是成立了人民公社,就无法办到。在麦收时,没有麦地的堤西后双庙、北张庄等生产队,在统一筹划下,都参加了堤东的麦收工作,结果保证了小麦的及时收割,大家同样分配到了小麦。

第四,在公社的合理安排下,能够充分动员农村的劳动力,并使全部劳动力得到有效的利用。比如上面所说的在1959年抗旱修渠时,头天晚上下通知,第二天一早就出动5,000人,这在高级社的时候,是怎么样也办不到的。

在人民公社的条件下,不但可以充分动员和合理安排劳力,而且一切过去难于举办的事,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好处,都能很快地或者大量地兴办起来。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另外,在生产资料的添置上,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如1959年1—8月份,我们公社在生产资料上的投资,达30万元以上,比1958年同一时期增加了两倍。其中化学肥料一项就有32万多斤,而上年同一时期却只有11万多斤。

另外,由于公社办起了公共食堂等公共福利事业,使广大妇女能够参加生产劳动,也是我们获得生产和建设飞跃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前,我们这儿的妇女是很少下地劳动的,解放以后,虽然情况有所改变,但是除非农活特别忙,平常还是不大出来。有人片面地责怪她们落后,其实他不知道烧水、煮饭、洗衣、看小孩、侍候老人……要占掉她们多少时间,何况除这以外,她们还要“搯辫子”、搞副业,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就是想下地干活也谈何容易呀!

自从建立了人民公社,办起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婴儿室、敬老院,全公社的妇女劳力,便突然增多了。以前人们到地里去看看,妇女只是三三两两,1958年大跃进以来,单说有组织的女民兵,就有四千多人,她们和男劳力一样,在地头扎营,白天黑夜连轴转。如

祝庄的祝仰雨，身体很好，又能干活，可是她有六个小孩，过去出一次工，得先作一番准备，隔夜就把饭菜弄好，到了地里心里还不踏实。现在呢，她一个月挣的工分，比从前一年还多，而且还得过奖品。象这样的例子可太多了。

男女劳动力的出勤率这么高，会不会影响到一般的农家副业生产呢？我们可以看看龙王庄供销社的统计数字：1958年全年收购的草帽辫，一共才196包，价值三万零三百多元，1959年仅1—6月份，就达到350包，价值7万元以上。其他农副业土特产的收购量，1959年1—8月份，共值238,824元，比去年同一时期增加了192.6%。

干劲鼓足了，生产提高了，生活自然而然也就得到了改善。建立公社以后，全部收入较建社前增加40%左右。以供销社门市销售情况来看，1959年1—8月份，生活资料的零售总额共计496,212元，比上年同一时期增长了125.6%。在社员的全部收入中，供给制部分占30%。

在回顾一年来我们公社全面发展情况的时候，还应该着重提出下面这一点：我们广大社员都迫切地盼望实现农业机械化。

1959年麦收时，上级特意从临清拖拉机站调来一部拖拉机和一部机器脱粒机，先后耕地5,400亩，脱粒20万斤。虽然时间短，工作量也不大，可是，大伙儿已亲眼看到了机械化的惊人的威力。现在，只要有拖拉机，我们这里是有实行机耕的条件的，我们也有力量购置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因此，我们完全相信，只要努力干下去，在优越的人民公社的条件下，农业机械化的日子一定会很快地到来。

工业生产大跃进

我们公社的工业生产也有飞速的发展。在人民公社建立的一年中，工业方面获得了特大的跃进，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解放以前，龙王庄这一带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业，顶多有几个会做做粗活的木匠和泥水匠，或者是几家磨磨豆腐、做做豆粉的作坊。抗日战争时期，这里虽然有过军械修配厂、军服厂、印刷厂，但都不是地方工业，而且随着军事胜利的进展，早已搬离这儿了。

直到1956年以前，我们这里还没有较大规模的地方工业。

1956年这儿实现了合作化，成立了几个手工业联合小组：红爐组两个，木业组一个，脚踏车修理组三个，但规模都不大，一共才十多个工人。到1957年全年产值还只有15,000元。

1958年人民公社诞生了，一个全党全民大办工业的高潮，随着出现。没有原材料，自己找，没有机器，自己造，没有经验到外地去学，没有技术大家来钻研，就这样，一边建厂，一边生产，我们公社的工业生产，就在这黄河滩上，从无到有，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到1958年年底，全社已经建立了机械厂、木业厂、砖瓦厂、缝纫厂、编织厂、土化肥厂、面粉加工厂、榨油厂、副食品加工厂、酿酒厂、造纸厂、水泥厂、皮麻厂等农村小工厂16处，工人1,140人。新旧厂房几十座，特别是1959年夏天落成的砖瓦厂的厂房，一个大烟囱就有16丈高，真是顶天立地，直上云霄。这一个厂部分开工，日可产砖瓦7万多块，全部开工，还可增加产量一倍以上。

1958年全年工业生产总产值19万元，比1957年增加了十多倍；1959年计划产值45万元，第一、二季度已经完成了全年计划的51.1%。

我们的工业生产，紧紧地围绕着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的需要。大搞深翻地时，就大造深翻犁；实行小麦密植时，就推广密植耩；大搞水利化时，就大批制造打井机和各式提水工具；甘薯丰收了，就大造甘薯切片机，建立酿酒厂；为了迎接1959年小麦大丰收，就制造了小麦收割机和各种大小麦收农具8,400余件。一年以来，我们的工业生产，以工具改革为中心，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

第一个机械厂

1956年时，我們不是有三个脚踏車修理組嗎？1958年下半年，我們就把这三个小組作了調整，第一个机械厂就搞起来了。

說来真是奇跡，我們边建厂，边生产，一年来已經制成了打井机、碾米机、压力机、深耕犁、牵引犁、輕快双铧犁、长齿耙、甲板車等30多种产品，大小2万多件，不仅装备了本社自己的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还支援了楊集、張庄、观城等兄弟公社。

最初，我們的生产資金只有2,500元，全体职工，包括厂长、炊事員在內才17个人。技术高的工人也只会做些鉄匠活，錘錘打打；还有一些人，会修个洋車，烂的补补，弯的砸砸。生产设备，只有三盘紅爐和一些錘子、鉗子之类的小工具。所以当时就連我們自己也毫无信心。說真的，連机器也沒摸过的人，怎么敢設想能自己制造出机器来呢！

社党委及时地教育了我們，帮助我們定計劃，想办法，解决困难。那时候，我們的赵厂长，一人身兼厂长、會計和司务长，三个月沒有脫过袜子，睡过好觉，一有空就和工人一起干活，有一次两个脚都被鉄水燙伤了，他纏纏綳帶，繼續又干。紅爐車間的主任盧占魁打造鍛鉄的模型时，有人笑話他說：“了不起能干个粗鉄活，居然想造什么模子，真是螞蟻啃起骨头来了！”第一次他果真失敗了，急得兩頓飯沒吃，想哭，可是他毕竟頑強地繼續干下去，二次、三次，最后到底搞成了。从此，打圓的有圓模子，打平的有平模子，打螺絲，有螺絲模子。过去打撈杠，一天只能打3根，有了模子，一天能打14根。工人們都說：領導同志都这样認真，我們还有什么說的。

可是，沒有設備怎么办？上級的指示是：“不靠省，不靠县，自己的工厂自己建。”一年前，只有三盘紅爐，几把鉗子、錘子的小攤子，現在，已經建成了厂房84間，4个車間：翻砂間、紅爐間、鉗工間、

机床車間,还有3个洋車部。主要生产設備有牛头刨床1座,規格車床1部,簡易車床8台,动力鍋駝机2部,鼓风机1部,立鑽3台,套絲机3部,压輪机1部,压力机3部,紅爐20盘。对一个农村机械厂來說,这样可算是初具規模了。这些东西哪里来的呢?除牛头刨床和規格車床外,其余統統是我們自己制造的。

不懂技术又怎么办?上級的指示是:“沒有經驗外地学,沒有技术苦鑽研。”为了制造立鑽和水泵,我們先后到高唐、临清和寿張去参观学习,带了图紙回来召开技术会,大家一起研究,不懂,再去学。就这样,我們把产品一件件制了出来,技术上也一步步提高起来。

开始时,我們这个厂連个螺絲帽也不会做,現在,一般的机器,只要有图紙,我們就能照着做出来。过去只能“补补砸砸”的洋車部,現在,40多种洋車零件都能自己制造了。徐华玉原来只是一个学徒工,竟学会了制造鍋駝机的一些技术,成为三等九級工了。职工人数已經由17人增加到147人。

資金也要靠我們自力更生,自己积累。我們实行了包工包产的办法,开展了增产節約运动,努力革新技术,降低成本,积累資金,扩大再生产。例如制造糶鏢时,供銷社和我們訂的合同每个重12两,开始时却費了一斤半鉄,經過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只用11两鉄就制成了,而且質量很好,式样美观。原来鋤鏢制成后重二斤半,却要用三斤十二两鉄,經過改进,只要三斤二两鉄就够了。这样仅在1959年6月份一个月中就節約了鉄料1,125斤。在建厂时,我們的資金只有3,200元,現在已經达到35,000元,扩大了十多倍。

一年来,我們的机械厂由小到大的事实,使我們体会到在农村里办工业沒有什么神秘,只要好好地听党的話,依靠群众,螞蟻就可以啃骨头。

工具改革的基地

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到来的时候,也正是秋收秋种最紧张繁忙的季节。大量割下来的庄稼要从地里运回场里;成千上万车的肥料要从村里运往地里;几万亩耕地需要很快地深翻一遍;上千眼的井打好了,要把水提上来,送出去。还有,小麦要实行密植,播种量得比过去提高一、两倍;丰产田要大规模地熏肥……。凡此种种,迫切地要求有更多的劳力。

那时我们已经建立了人民公社,开办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男女劳动力不但充分地动员起来,而且劳动效率也普遍提高了,但还是忙不过来,白天黑夜连轴转。

为了解决劳力的紧张局面,一个大搞工具改革的群众运动及时开展起来了。

我们是采用群众运动和专业队伍相结合的办法来搞工具改革的。一方面我们发动人人献计,个个创造;另一方面,又从各村调来了68个懂得一些技术的社员,成立了一个木业厂,作为工具改革的基地。

我们一面建厂,一面生产,把工具改革和生产实际需要密切结合起来,需要什么,就制造什么;边改边造,边推广边使用,边普及边提高。从建厂到年底不过3个月的时间里,就制造和推广了各项农具15种5,000多部,如制造深耕犁300部,可耕一尺六寸,一晌可耕地7亩;跃进车2,100辆,一个人驾着可运肥二、三百斤;密植耩288部,比用原来“二八耩”、套耩播种可省工一半,而且行距宽窄均匀;甘薯切片机300部,每部每天可切片4万斤;玉米脱粒机25部,一小时可脱粒2,000斤;木制水车600部,不但节约铁料,而且轻便好使。

1959年1月到6月,为了迎接夏季大丰收,我们制造推广了麦田灌溉和麦收等农具7,341件,其中风力水车450部,脚踏、手

搖及龙骨水車 430 部；試制了小麦收割机 60 部，每部每天可收割 20 亩；馬拉收割机一部，每部成本仅 60 余元，每天可收麦 80 亩。此外，我們还大量制造了桌、椅、櫈、床等社員家庭生活用具。

我們能取得这些成績，是經歷了一段艰苦过程的。开始时，我們仅仅从銀行貸款 2,000 元，置办了一些必要的生产工具之后，流动資金就沒有了。那时，我們还不进行商品生产，只对各队送来的原料进行加工。如果沒有人送原料来，生产就只得停下来。加工时又只收成本，不取利潤，以致有时連工資也发不出来，职工的口粮还要各自从村里带来。68 个职工中，只有三个人具有高小文化程度，虽有 16 个技术工人，但对一些新式农具的設計、制造和安装，都沒有摸过。一般工人，只能做打墨綫、拉鋸、放材料等零活。生产设备更是因陋就簡，殘缺不全。

可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鼓舞下，大家苦鑽苦学，苦干巧干，千方百计地克服了困难。結果仅仅試制成功的生产工具，就有 60 多种。如刘培均、張士荣、李有才三个青年工人，无时无刻不在动脑筋，他們扎了五、六十种新工具模型，三天三夜不睡觉，制成輪带刨，一下可以刨到头，推得平又可提得高，比一般手推刨效率提高了 10 倍。技术工人李秀和下决心要造一种輪带鋸，經過了三次失敗，有人笑他：“过去只不过做些桌、椅、板櫈，現在就能做輪带鋸？做不成不是白白費工搭料嗎？”但党和行政全力支持他，厂长田世全亲自下手帮助他，他終于造成了。从前两人拉鋸一天只能鋸木 50 立方米，現在用輪带鋸只要一人扶板，一天可鋸 1,200 立方米，提高了工作效率 28 倍。

生产成本也是不断降低的。最初我們制造一張床要用 18 方板子，四个半工；到后来，只需要 14 方板子就够了。

在开始建厂的时候，只有 68 个职工，25 間厂房，到 1958 年年底，职工增加到 158 人；1959 年 1 月，建立起新厂房 50 間。工厂的生产已由加工发展到商品生产。工厂和供銷合作社訂立了供銷

合同。这样一来工厂已有条件按期发放工资。生产管理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实行了包工包产的制度,并民主评定了职工的工资等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不断高涨,常常打过两遍铃,还不見人下班,技工王清林夏天不午睡,每月起码能多做七、八个工。现在大家都满怀信心,准备迎接农业生产继续跃进的高潮,决心为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力量。

“白手起家”的土化肥厂

1958年秋天,县委在我们土化肥厂开了一个现场会议,号召全县各乡、社、队“学龙王庄,赶龙王庄,超龙王庄,大搞土化肥!”

那时,我们建厂还只有一个来月,工厂的日产量已由500斤增加到1万斤。

我们的厂是“白手起家”搞起来的。开始时,我们没有厂房,没有资金,没有工人,没有工具,也没有技术。为了尽快地投入生产,我们采取了边规划,边施工,边收购原料,边学习技术,边生产,边供应的办法。从供销社调来了6个工人,也就在供销社的大院里,盖起席篷,收购原料。在露天里,我们铺着地,顶着天,6天6夜就制成土化肥3,000斤。

在这同时,我们又派人到阳谷化肥厂去观摩学习,他们回来后,立刻盖厂房,修炉灶,争取在“七一”节正式投入生产,向党献礼。

那时,正是夏收夏种农忙季节,上级从供销社抽了六、七十名业务人员到胡洼队去帮助割麦,把胡洼队50多个懂得建筑的社员换来盖厂房。

没有资金怎么办呢?党委发动干部投资1,850元,教师投资325元,预售货款1,185元,供销社又拿出节余的福利费5,875元。在建厂时,尽量利用旧砖旧料。结果一共只化了6,300元就把厂房建成了,比原定计划要少6,000元。

工人，是由供銷社飲食店的服务員和生产队的青年社員中調来的，在“七一”正式开始生产时，已有 24 人，10 月間，增加到 68 人。

厂房建起来了，工人有了，可是沒有工具，沒有牲口作动力。当时，甚至连汲水、担水的用具也沒有，全靠大家利用个人社会关系，向周圍去借。

在技术方面，我們学习了吉林省农安县制造“混合化肥”的方法。这个方法，見之于全国积肥造肥工作現場促进會議編的“土制化肥技术資料”。根据我們这里的具体情况，用硝盐、骨粉、草木灰和烟薰土等作为制作土化肥的原料。硝盐含有氮，骨粉含磷，草木灰含鉀；烟薰土是吸收和填充剂，它本身也有肥份。这样就制出了三要素齐全的完全肥料。

可是，誰也沒有亲自干过。甚至，当产品生产出来以后，还不知道是不是管用。一天晚上，我們偷偷地給一塊谷地撒上了，又怕它沒效，多撒了些，过了两天去看，谷子长得又干又黄。怎么办呢？我們又偷偷地到这块谷子地上去澆水松土。过了几天，嘿，谷子长的特別好，这才放了心。經这次試驗以后，我們就敢大量生产了。我們就是这样硬把技术掌握过来的。

使我們非常感动的是：公社党委負責的同志們，經常對我們进行教育，告訴我們努力增产肥料对促进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意义，帮助我們解决資金、收購原料和推銷产品等方面的具体困难，这就进一步激发了我們的积极性。在炎热的日光下，大家赤着膀子拉石滾，麻繩勒着黑油油的臂膀，勒起了很深的痕；在高热的滷水鍋前，灰水鍋前，蒸骨鍋前，汗流滿面，可是沒有一个人說累。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更多的土化肥，大家不仅干劲冲天，而且鑽勁也冲天。特别是我們的技术員刘昌玉，他日夜在捉摸着怎样改革工具，提高效率。有一天深夜，工人們都睡熟了，他还在床上想，想想又坐了起来，添上油灯，用手指在地上来回比划他所設計

工具的图样。鷄叫了，他也沒有听到。这时厂长孙兴正同志一步跨了进来說：“怎么天亮了，还点着个灯？”他才知道已經到了第二天。刘昌玉苦心鑽研的精神，立刻成了全厂的榜样，大家都更进一步地鼓起了干劲和鑽劲。原来每天向灰池里添水60多担，4个人扣还觉得吃力，现在改用竹筒引水，一个人干还很轻松。过去砸烟薰土，6个人一天砸2,000斤，还震得手痛，现在改为一人一畜用石滚軋，一天能軋15,000—20,000斤；过去用平篩篩土2人一天只能篩2,000斤，现在改为立篩，2人一天可篩1万斤；过去蒸骨头，軋骨粉，每天只产40斤，现在和湖南长沙、陕西大荔等6个省、8个县的先进厂写信交流了經驗，采用了每100斤骨头兑5斤石灰煮的办法，每天能出骨粉200多斤。

由于我們解放了思想，大胆鑽研創造，虛心学习外地經驗，日产量由1万斤、10万斤、20万斤，最高达到50万斤。产品的价格則由每斤1角、9分，降低到6分。从1958年“七一”正式生产到1959年1月仅仅半年的时间里，这一个厂共生产土化肥2,500万斤，使全社每亩麦田平均施用土化肥达3,500斤。同时还生产了石灰硫磺合剂等土农药254,000多斤，另外还开办了两次訓練班，培养了土化肥技术人员450名。

更令人兴奋的是，我们的技术人员刘昌玉同志，光荣地参加了1958年底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大会，亲眼见到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

农业生产大丰收

扩大播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就农业生产來說，我們公社的自然环境并不是很好的。

先看土壤。过去堤东常常鬧大水，土質不时变更，急流之处长成“飞沙土”，不但地力瘠薄，而且容易漏水；緩流之处长成“胶泥淤土”，地力虽然比較肥沃，但又太粘了，不好耕作。老辈子都是这样

形容它：早晨濃，中午硬，过了三天治不动。

在堤西，共有土地 57,000 亩，比堤东几乎多了一半。主要的土壤是“胶泥淤土”、“鬼臉子”淤地、青沙土（沙壤）和两合土（壤土）。所謂“鬼臉子”淤地，和胶泥淤土的質地差不多，但淤層較淺，下面是沙土，既不好耕作，又漏水漏肥。

青沙土和两合土都比較好，可是过去由于不注意施肥，地力已逐漸减退，所以“一季不上粪，当季少办事”（办事就是收成的意思），人們都它叫“买卖地”。

土壤如此，雨水又怎样呢？雨水也不很調勻。平均每年降雨量 600 毫米左右，虽不多也不算太少了，可是偏偏都集中在七、八月份，以致早春晚秋，总是遇到干旱，影响春作与小麦的适期播种。至于农田水利建設，过去就更談不到了。

再說肥料。从前我們这一带，由于經常漲大水，养猪很少，牲口也不多，这样当然肥源不够。再加上天灾人禍，連年不断，終年辛苦，还不得一飽，誰还有力量到土地上去加工投資？以致造成了犁无三寸土，缺水又缺肥，白茬下籽，硬茬播种等等現象。耕作粗放，产量还能不低嗎！

因此，过去在人們的印象里，龙王庄是一个既偏僻又落后的地方。这里生产水平低得很，每亩地平均只能收粮食一百来斤。

解放以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完成了土地改革，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执行了一系列的增产措施，从而促使生产力逐步得到了提高。1958 年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农业生产更是有了飞速的跃进。

在农业生产方面头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就是人民治黄的胜利。黄河归故，已經 14 年了。14 年来，黄河虽然不断泛濫，甚至它的洪峯，曾一再超过了保証水位，但临黄大堤，始終屹立不动。

这是历史性的奇迹，也是翻身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創造的奇迹。誰都知道，經過八年抗战，由于不断挖掘交通沟、“抗日洞”，临

黃堤，堤身早已殘破不堪。黃河歸故以後，逐年培修，14年中，大堤已加高3米，加寬50米。現在堤頂寬8—11米，臨河高4米，背河高6—7米，內外坡度為1:3，因此它比以前提高了抵抗洪峯的力量3倍以上。

同時，每到汛期，縣委書記總是親自掛帥，率領數十萬防汛大軍，日日夜夜，守護着每一寸堤防，在風里、雨里、泥里、水里，堅持鬥爭。如1950年，邢廟大搶險時，省級治黃模範胡鴻民等同志，都毫不遲疑地跳入驚濤駭浪，用自己的身體，堵住決口。而全縣群眾，在防汛的緊張階段，也全部動員起來，1955年搶險時，大雨傾盆，雷電交加，但從各村各鄉連夜征集趕送到堤上去的防汛物資，僅柳條一項就有200多萬斤。

就這樣，我們保證了堤西廣大平原區居民能夠安居樂業，保證了農業“八字憲法”能夠在這一塊土地上逐步得到貫徹。

水利：我們已先後打磚井909眼，機井94眼，開渠道44條，修水庫37個，下泉346眼。

肥料：我們開展了養豬積肥，堤西地區基本達到一戶一口豬；1958年大躍進中，我們又建立了土化肥廠，日產70,000斤；另外還大搞薰肥，每畝耕地施肥量比解放前增加幾倍到幾十倍。

土壤：合作化以後，我們開始在小片地上實行深翻。1958年大躍進中，大搞深翻地，改良土壤32,000畝。主要做法是淤地“大翻身”，把下層土沙翻上七、八寸，變成保水保肥，耕作方便的“蒙金地”；對沙土，採用生熟混合法，把下層淤土翻上來，與沙土摻合，變沙土為良田；對兩合土及青沙土，實行套犁深耕，進一步改良土壤物理性。

良種：我們逐年推廣了各種優良品種。小麥“碧螞1號、4號”，谷子“華農4號”，玉米“大馬牙”、“二馬牙”、“金皇后”，甘薯“勝利百號”，大豆“天蛾蛋”、“牛毛黃”、“羊頂黃”，以及“岱字棉”等等良種的栽培面積，都達到了這些作物播種面積的80%以上。

密植:在我們这里,各种作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密植。特别是經過 1958 年大跃进中的大鳴大放辯論和 1959 年小麦的丰收,合理密植已經深入人心。小麦每亩平均播种量,已达 30 斤左右(过去是 10 斤左右);甘薯每亩 3,000—4,000 株;谷子每亩留苗 7—8 万株,都比过去增加了一、两倍乃至三、四倍。

植保: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們在植物保护上就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工捕蝗,現在蝗虫已經基本消灭。近年来,我們連續購置噴霧噴粉器 142 部,以及“666”等大量农药,并建立了虫情預測預報制度。1959 年防治豆虫的工作,获得了突出的效果。过去 8 年,我們这里年年都有豆虫为害,經常要减产 30—50%, 1959 年在公社领导下,展开了大规模的防治工作,基本上制止了这一方面的虫害。

工具:在 1958 年大跃进中,我們建立了机械厂和木业厂,生产各种中小型的改良农具并开始試制馬拉农具。近年来先后已推广新式水車 1,150 部,双輪双铧犁 258 部。公社建立后,又添置了抽水机 6 部,共 76 匹馬力。

管理:这里的田間管理工作,已普遍加强,自公社至各生产大队,都有技术委员会,另外还有专职的技术指导站。县、专、省各級农业科学研究机关,都派有一定的技术干部,长期地或临时地在我們公社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工作。

由于我們执行了这一系列的增产措施,带来了农业生产上的显著的变化。这个变化,概括地說就是播种面积扩大了,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

先从播种面积来看,已由少种逐渐变成多种。我們这里按照温度和无霜期这两个条件說,一年可以种两季,但从前却没有这样做。比如堤东,虽然年年都是割了麦子耩豆子,可是一到七、八月,总是豆子还没成熟,大水就淹上来了,十年难收一、两季,因此,基本上是一季麦、“一季水”。

在堤西，从前的耕作制度是两年三熟，在冬季休閑地上，种一季早秋作物，早秋收了种麦子，麦子割了种晚秋，晚秋收了，就是冬季休閑了。这样一般早秋面积約占耕地面积的40%至50%，小麦及晚秋各占耕地面积的50—60%。那时堤东堤西合計起来，复种指数不过120%左右。

以后情况渐渐有所改变，播种面积逐年增加。堤西的冬閑地，已不断的被利用，于是早秋作物的面积，随之縮小；小麦和晚秋作物的面积，便陆續扩大。目前早秋作物面积只占耕地的30%左右，而小麦和晚秋作物面积，已发展到占耕地的70%左右，也就是說，已經由原来的两年三熟变成了三年五熟。1959年全社耕地的复种指数，已达170%以上。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經濟作物的播种面积，也有了适当的扩大。过去經濟作物仅占总播种面积的5%左右，1959年已扩展到9%以上，其中主要是棉花，其次是花生和芝麻，另外还大有麻、甜菜、葯材以及蔬菜和瓜类等。

从单位面积产量来看，这里已由“低产”逐渐变为“高产”。过去，由于水肥不足，旱澇頻仍，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都沒法种。为了适应自然条件，只好大量种植那些能够避灾保收、或者耐旱耐澇、而且栽培管理又比較省工的作物，如高粱、大豆和小麦。过去这3种作物的播种面积，要占总面积的80%以上。在早秋作物中，高粱要占一半以上。只有当早春遇旱，要等下雨再种高粱又嫌太晚的时候，才种上一些谷子。至于春玉米和春甘薯，那时候根本就沒有。

在晚秋作物中，絕大部分都是大豆，也只有麦收后不下雨，过了大暑还没有耩上豆子的时候，才种上一些“火棒子”（玉米），这种玉米生长期只有60来天，但产量很低。

1956年实现了合作化，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为作物的栽培带来了新的有利条件。本来“金皇后”和“二馬牙”等玉米良种，早就引

进来了,但是直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大量推广。只有三、四年的功夫,玉米的种植面积,就扩大到约占耕地面积的10%,高粱却缩小到只有春播面积的17%左右。谷子的播种面积扶摇直上,已发展到占春播面积的30%;甘薯更是后来居上,从前它还占不到耕地面积的10%,并且都是麦茬薯,1958年大跃进以来,已经扩大到占耕地面积的30%以上,其中春甘薯占10%。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不但玉米、甘薯、谷子等高产作物的播种面积扩大了,就是原来产量比较低的作物,如小麦和大豆,也开始由低产变为高产。本来从前这儿的小麦和大豆,每亩平均产量都只有几十斤,近年来已逐步提高到100斤以上。1959年小麦大丰收,全社57,000多亩小麦,平均亩产175斤,超过战前全年粮食作物亩产量的一半以上,超过1958年大麦亩产的66%。

最后我们从收获量方面来看。前面谈过,过去这里的每亩平均产量不过100来斤,1949年前后,已上升到130斤左右。在这以后随着各项条件的改进,单产不断提高,1955年已达到157斤;1956年又增长到179.8斤,比上年增长14.7%;1957年继续上升到205斤,又比上年增长13.6%;到1958年,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的那一年,更以特大跃进的速度,增加到550斤,比上年跃进168%,比同年全县平均亩产量高出37.5%,比战前单产量提高了4倍以上。

粮食增产的成效,具体地反映在粮食的供应上。过去虽然没有系统的统计,但从各项有关资料可以推断,堤东经常缺粮,是全县生产救灾的重点之一,堤西也不富裕。建国初期,国家在这里发放的生产救灾贷款曾达45万元。可是后来,堤东堤西都成为余粮区了,从1955年开始,历年的征购任务,年年都超额完成,个别生产搞得较好的队,如胡洼,1959年6月麦收以后,即上交公粮、出卖余粮21万多斤,一季超额完成了全年的征购任务。

前面曾提到,根据党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定,我们这里

属于500斤地区。事实上，1958年我们就提前并超额完成了这个任务。1959年，虽然遭受了40年未有的特大干旱，但是我们仍然有信心也有把握，在1958年的基础上，继续跃进，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跨过长江！

密植小麦丰收了

小麦是我社最主要的农作物。春天，站在临黄大堤上，举目四望，真是麦浪滚滚，就跟绿色的海洋一样。1959年堤东堤西一共种了57,000亩小麦，占全社耕地面积的58%以上。这是公社成立后在农业生产上的第一炮，这一炮果然打响了。

麦收时，中央农业部和省、专、县的工作组，重点验收了两个生产队的产量：一个是马路口生产队，全队910亩，亩产402.9斤，其中有40.5亩，亩产857.6斤；另一个是胡洼东队，全队264亩，亩产579斤，其中有84亩，亩产高达1,032斤。其他各个生产队，队队都比去年增产。全社单位面积平均产量达175斤，超过上年66%。

分析今年小麦丰收的原因时，虽然看法很多，但大家首先一致肯定的，是由于成立了人民公社，发挥了人的干劲和物的潜力。在技术措施方面，实行密植是取得丰收的重要因素。这里往年种麦，每亩一般只下种10斤左右。公社成立后，实行了全社大协作，又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这才大破常规地推行密植，每亩一般下种30多斤，个别试验田，每亩下种达到100多斤。

推行密植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到麦收之前，仍旧有人抓住个别试验田的局部倒伏现象，大叫密植搞糟了。他们不懂得，试验田的目的就是进行试验，创造经验。试验田的小麦虽然倒伏了，却换得了一条宝贵的经验：密植必须合理，而不是越密越好。如果种得太密，就会长成没有分蘖的单杆，穗小粒少，甚至发生倒伏。可是，分蘖过多了，不但穗子长不大，还会影响穗数的增多。所以，通过

試驗，使我們明確到，应当掌握這樣一種播種量：既要爭取總株數的增多，達到穗多；又要保證每一單株能長出一定健壯的分蘗，達到穗大粒飽。只有穗多、穗大、粒又飽，才能取得高產。那末，究竟每畝下種多少為宜呢？根據今年的經驗：足水、足肥的高產田，每畝30斤以上；大面積豐產田，每畝20—30斤；至於水肥不足的一般田，那就以15—20斤比較合適。

在1959年的密植小麥田中，出現了一些水肥較缺的三類田，稈子矮些，穗子小些。保守派以為有機可乘了，把它叫作“狗毛麥”，說是“連草也收不到多少”。但事實卻大出他們的意料之外：根據在馬路口生產隊對比調查的結果，在肥沃的淤土地上，密植後穗多、穗大、粒又飽，畝產508.2斤，比稀植增產84.5%；而在瘠薄的拋沙地上，密植後雖然稈矮、穗小，但由於穗數大大增多，畝產149.9斤，仍比稀植增產72.7%。瘠薄地密植以後，固然也增了產，但長得稈矮、穗小，畢竟不大好。不過也由此取得了一條經驗：密植必須與其他條件結合，不是越密越好。

深翻是密植的基礎。密植後單株營養面積縮小了，必須實行深耕，促使麥根向縱深發展，擴大吸水、吸肥的範圍，才能確保單株生長健壯，達到穗大、粒多。往年，我們的麥田一般只耕深六、七寸，這一回，辦了公社，有了力量，大部分地深翻1—3尺，有些試驗田翻的更深。深翻使麥根能夠扎得更深，因而株高穗大。但是也並不是說越深越好。如根據在胡洼隊的調查，翻7寸的地，麥根最深是3尺，而翻1.2丈的地，最深也只有7尺，同時，根的絕大部分都分布在1.5尺的土層內。可見翻得深些固然有好处，但從基本滿足麥根發育來說，一般翻過1.5尺也就可以了。

水、肥是密植的前提。密植後株數增多了，也就是說它的肚子變大了，於是水和肥料必須緊緊地跟上去，讓它吃飽、喝足，才能高產。今年出現的那些所謂“狗毛麥”，主要是因為密植後缺水缺肥的緣故。如胡樓隊有一塊麥田，每畝密植達60多萬穗，可是既沒

有施肥,又没有澆水,結果就长成了“狗毛麦”,亩产只 106 斤,而同在一起的另一塊麦田,因为施了 3 万斤肥,就株高、穗大,亩产 835 斤。由此可見,肥料是确保密植增产的首要环节。那末,密植麦田,每亩究竟施用多少肥料才好呢?根据我們今年的試驗:亩产小麦 800 斤以上的,平均施用草粪 3 万斤左右,亩产 500 斤的,施用草粪 12,000 斤;亩产 200—300 斤的,施用草粪五、六千斤。

良种是密植的保証。为了确保密植高产,必須选用穗大、粒壮和稈硬的品种。我們这里原来种的都是“小紅芒”、“大白芒”等地方品种,1953年引进推广了“蚰子麦”、“平原 20 麦”,1957 年又引进了碧蚂 1 号和 4 号,今年高产田种的大部分就是后面这两个品种。根据馬路口生产队的調查,在同样地力和种植密度下,“小白芒”每穗平均只有 15.7 粒,千粒重 26.4 克;“蚰子麦”每穗平均 23.6 粒,千粒重 29.7 克;而碧蚂 4 号平均每穗有 25.3 粒,千粒重达 35.5 克,并且莖稈健壮,不易倒伏。

工具改革是密植的手段。密植不是简单地在地里多下一些种子,而是要通过改革播种工具,改进播种方法,来达到增加播种量的目的。我們采用的是套耩的办法,縮小行距,增加种植行数。这样,一方面播种量随着行数的增加而增多了,但另一方面,在每一麦行內,麦苗并不显得密和挤,仍然可以长得很好。今后,我們还准备改制窄行耩和推广条播机,使得播种更加均匀,从而扩大密植的效果。

密植后,还要加强田間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总之,我們主要是运用水肥条件,掌握小麦生长发育規律,使小麦过好分蘖、越冬、返青、拔节、灌浆这五道关口,达到增株、增穗、增粒和增加粒重的目的;同时作好防冻、防霜、防病、防虫和防倒伏,达到保苗、保株、保穗、保粒、保丰收。

我們相信,今后只要繼續鼓足干劲,进一步改善水、肥、土、种条件,并加强管理,一定可以更好地發揮密植增产的潜力,取得小

麥的更大丰收。

谷子——生產上的一面紅旗

谷子是我們范縣農業生產上的一面紅旗，這一面紅旗曾光榮地插在 1958 年全國農業展覽會上。

我社胡洼生產隊的谷子，還曾在全縣的谷子豐產榜上名列第一。

胡洼群眾種谷子，向來有經驗。1958 年農業生產大躍進高潮中，全面地改進了技術，全村 288 畝谷子，平均畝產 550 斤，並有一塊一畝三分的試驗田，畝產高達 1,300 斤。

胡洼谷子的豐收，也就是農業生產“八字憲法”的豐收。因為他們在爭取谷子豐收的鬥爭中，根據當地具體條件貫徹了“八字憲法”，字字都取得了不少可貴的經驗。

首先是“土”。這個村的谷地大部是兩合土，據我縣土壤普查辦公室來這裡實測的結果，這種土壤上層 7 寸來厚是含淤較多的壤土，中層 0.7—1.4 尺左右是飛沙土，下層 1.4—3.4 尺左右是淤土。因為上層土的淤性大，耕作困難，不好保墒，如果犁耙得不適時，就會起坷垃。加之多年淺耕，形成板結發硬的一層犁底，庄稼不容易扎根。去年的谷地，大部在前年冬天經過深翻改良，把犁底翻松，一般深 1 尺左右，最深的達 3 尺多，並採用“生熟混合”法，把表層淤土和中層沙土摻用，變成不沙不粘、耕作方便的沙質壤土。據我們對比試驗結果，經過這樣改良的土壤，每畝施肥 6,000 斤，畝產谷子 500 多斤，未經改良的土壤，施用同樣肥料，只收谷子 400 多斤。改良土壤後每畝多收了谷子 100 多斤。從根部的發育來看，深翻 3.8 尺的地裡的谷子比耕深 7 寸的地裡的谷子，其主要根群伸長 1.7 倍，須根總數增加 82%，而且根系粗大。

冬季深翻後，到來年開春解凍時，又淺耕一遍，反復耙細，打好畦田。

二是“肥”。据胡洼队的經驗，谷子亩产 500 斤以上，需要施用底肥草粪三、四車(每車 1,500—2,000 斤)，追施大粪千一、两千斤。亩产 1,000 斤以上，則需底肥草粪七、八車，追施大粪千三、五千斤。

基肥一般分两次施用。四分之三在年前結合深翻全層勻施，四分之一在春耕时施在表層。

追肥要抓住攻苗、攻棵、攻穗三个环节，要特別注意攻棵、攻穗这两个环节。

攻苗肥在苗高 5 寸左右时施用，促使幼苗生长健壮。攻棵肥在苗高 1 尺时施用，促使株壮穗多。苗高 3 尺左右将近秀穗时施攻穗肥，促使谷穗抽的整齐壮大，粒多粒飽。

三是“水”。据胡洼队的經驗，谷子要取得高产，必須看天、看地、看庄稼，結合施肥，澆好底墒、保苗、拔节、抽穗、灌浆五次水。

在播种前 10—15 天，澆好底墒水，使深翻后的土壤塌实，并使土壤有充足水分，保証播种的谷子出苗整齐，幼苗生长健壮，这次水要澆透，每亩用水約需 100 公方。

苗高 5—6 寸时，澆保苗水，帮助幼苗生长，每亩約需水 20 公方。

苗高 1.2 尺左右，澆拔节水，这次水要大，每亩約需 50 公方左右，促使株高穗大。

到抽穗前澆抽穗水，这时株高叶茂，气温高，蒸发大，又是谷子需水需肥盛期，每亩需要澆水 50—55 公方。

到灌浆时，再澆一次透水，每亩約 50 公方，促使谷粒飽滿。澆水时，要掌握：阴天括风不澆，以防倒伏。

四是“种”和“密”。胡洼队所种的谷子品种“华农 4 号”，是一个稈硬不易倒伏、耐肥、耐水、品質好、产量高的优良品种。在谷雨前后播种，单株留苗，一般每亩留苗七、八万棵，高产田留苗每亩达 12 万棵。

在抓住水肥土种密的基础上，还要作好“管”和“保”等方面的工作。据胡洼队的经验，除了追肥、浇水外，中耕除草和消灭虫害是管和保的中心环节。在每次追肥、浇水后，都要适时进行中耕除草，并采用两头浅、中间深的中耕办法。在苗高3尺左右时，还要结合中耕，进行培土，防止倒伏。

为了消灭虫害，在播种时要用药力散拌种，并撒六六六毒谷，到苗高1—2寸时，撒六六六毒饵二次，消灭地下害虫，确保苗全苗齐。在苗高1尺多时，每隔六、七天喷0.5%的六六六药粉一次，共喷三次，消灭谷子钻心虫。

摘掉了大豆的低产帽子

大豆是我们这里除小麦以外种植最广的作物。在堤东，历来都是一季小麦一季豆，几乎有几亩耕地，就有几亩豆子。在堤西，从前大豆的面积也曾达到耕地面积的一半左右，这几年虽然缩小了些，但目前全公社的大豆种植面积，仍旧要占耕地面积的20%左右。

大豆虽然种得这样多，但过去耕作粗放，不犁、不浇、不施肥，耩上就算了。解放前，大豆亩产总在百斤上下打翻腾。那时，缺肥又缺水，不旱便是涝，一家一户，单枪匹马，种啥庄稼也都细致不了。幸亏豆子有根瘤菌可以自己造些肥料，耐涝耐旱力也较强，根又比较粗壮，地板粘实一点还不太碍事，哪怕不翻地，不施肥，不浇水，也可以得到一定收成，所以它的种植面积很大，不过每亩产量却只有一百来斤。

很不公平的是：大豆长时期来“忍饥受渴”为人们服务，反而造成了一个错觉，认为它是一种“懒吃懒喝”的庄稼，用不着精细管理。人们譬喻一件事情办得不算太坏时，总爱用这样一句歇后语：“割了麦子耩豆子不犁”（“不犁”与“不离”的音接近，是差不多的意思），似乎种豆子不犁、不浇、不施肥是理所当然的事，把它看成“低

产作物”。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才”毕竟埋没不了。1958年社党委领导我们在北张庄生产大队搞了一块大豆试验田，面积1.45亩，平均亩产1,250斤。大豆的低产帽子被摘掉了。

这个高产纪录是怎么得来的呢？

我们首先从“种豆不让耨”这句俗话里得到了启发。大家捉摸这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豆子要种得早，再一个是要种得匀。过去，种豆一般都是硬茬下种，往往因为土干地硬耨不下，只好等天下雨再种，这就耽误了季节。而且因为地皮没有犁松，下了雨很快就干掉，苗出不好，同时耨耨也难以均匀，往往密的地方一丛好几棵，稀的地方隔一、二尺还见不到一棵苗。

1958年，麦收后我们就把地耙了二遍，浇了一次透水，然后深翻了1.5尺，翻后碾了一遍，来回耙了六遍，做到了土碎墒饱，上虚下实，麦收后4天就耨上了豆子，同时还适当加大了播种量，并用靠耨的办法播种，改变了不间苗的习惯，在苗高2寸时采用三角形留法，按照一定的距离定了苗，达到了苗齐、苗匀、苗壮。

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打破陈规，适时施肥浇水，让每一棵豆苗都吃饱喝足。

不是说豆子有根瘤菌可以自造肥料吗，为什么又要施肥呢？我们是这样想的：大豆虽然有根瘤菌，可以固定大豆生长所需要的一部分氮素肥料。但大豆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它的生长需要多量的氮素肥料，所以施肥还是必需的。

我们想到在幼苗时期，根系还不发达，根瘤菌的固氮能力还不强，所以结合深翻，每亩施用了基肥草粪18,000斤；在苗高4寸左右时，施用了大粪干1,000斤；不久又施硫酸铵30斤，及时供应豆苗速效性氮肥，可以使它多发杈。到苗高6寸以上时，施用草粪400斤左右，使它多长花芽，又施用了草木灰400多斤，使它茎秆健壮；到开花时，又浇了粪稀400多斤，使它多结荚。同时每追一

次肥，都澆一次水，并先后进行了6次中耕除草。此外，还噴农药10次，防治豆虫。

这块試驗田爭取丰收的过程，也就是先进和落后两种思想斗争的过程。开始有不少人認為豆子不适合澆水和密植，怕地翻深了，肥施多了，光长稭秆不結莢。如社員張永生說：“稠豆坑死人，多下了种子，脫不了叫政委、队长在地里吃豆芽子”！張繼兴說：“割了麦子耩豆不犁，深翻还不是光燒豆耩。”針對这些思想，党支部在社党委帮助下，組織了几次鳴放辯論，統一了認識。社党委徐德謙書記和队支部張全貴書記亲自挂帅，經常和社員一起下地干活，終于取得大豆的丰收。

推廣“胜利百号”甘薯的故事

甘薯又叫紅芋，这里，人們叫它地瓜。現在是我們这里很普通的东西了，可就在几年以前，还种得很少。那时候所种的本地甘薯，蔓拖得特別长，少說也有1丈多，勁都花在长蔓上，每棵結薯不过一、二斤。又不能密植，一亩一般只种800—1,000棵，太密就光长蔓不結薯，因此亩产仅1,000多斤，去掉水分，还不如种别的粮食。加之甘薯成熟期晚，影响种麦。所以那时人們都管本地甘薯叫“輩輩穷”，不爱种，种了反而倒霉。

1954年县里有人到济南去参加全省农业劳动模范代表會議，听到胶东劳模介紹“胜利百号”甘薯的高产經驗，說这种甘薯蔓子拖得短，每亩可以种三、四千棵，每棵可以結薯2斤以上，每亩少說也能收6,000多斤。他們回来汇报后，領導上就設法从胶东找来了一些薯秧，在濮城、观城、苏村和顏村鋪四个点試种，結果很好，第二年，就普遍得到了推广。

我們龙王庄，是1956年开始种“胜利百号”甘薯的。最初在龙王庄、吳桥、崔胡同、北張庄、曹樓、胡樓几个村先做了試驗。

初种的时候，因为种“輩輩穷”甘薯稀植惯了，对这种新品种也

不敢一下种上几千棵，所以产量不很高，同时还不知道将甘薯晒干磨面，只知道吃鲜的，又嫌这种新品种甘薯有药味，因此直到1957年，还有人种“鞏鞏劣”。1958年，我们总结了“胜利百号”的高产特性，又有了甘薯切片机，切了片可以晒干磨面，这才大量地推广开来，成了我们的重要粮食之一。话虽这么说，但这中间还是经过了一番斗争。

记得1956年实现高级合作化后，上级号备多种高产作物，并从胶东调来30万斤薯种。

过去我们种“鞏鞏劣”甘薯，都是麦茬薯，夏天栽。现在种“胜利百号”却要春天栽。早春天气冷，必须先育苗，可是谁也不会。党委就特地从德州请来一位劳动模范教我们搞火坑育苗，整整教了两天。他走后，我们就自己动手。先把苗床温度加到老师所说的 $28-29^{\circ}\text{C}$ ，谁知竟有一大半薯块烂掉了。原来是火烧得太猛，二十分钟内就升高到 $28-29^{\circ}\text{C}$ ，结果吃了亏。后来大家仔细研究改用碎草烧，让温度慢慢上升，两个钟头才升到 $28-29^{\circ}\text{C}$ ，这才成功了。以后，我们这里生产的薯苗，不仅能满足自己生产上的需要，还支援了外地。如1959年胡洼队让出的薯苗，就有1,000多万株，收入1万多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为了栽好甘薯，党委还组织我们到濮城去参观学习。参观后，我们学会了3种新的栽种法：船底式种法、卧式种法和斜种法。经过对比证明，斜种法最好，种的深度是4—5寸，比原来直种二、三寸的每亩要多收1,000多斤。

过去我们种甘薯都是平栽漫撒肥。那时肥料不多，每亩只施2,000斤左右，种“胜利百号”以后，技术指导站教我们改为壟作，壟宽2尺，高6寸，在壟上集中施肥，并在曹楼搞了18亩对比试验田，由于采取壟作并集中施肥，提高了肥效，薯块发育很好，产量显著增加。

过去，我们种甘薯要翻6次蔓，翻一次，锄一次。技术指导站

又在龙王庄搞了翻蔓和不翻蔓的試驗田 17 亩，結果壟栽不翻蔓的，比平栽翻蔓的每亩多收一、两千斤。

至于密植，那就更有意思了。1956年春天，刘楼村、刘洪洲生产队的队员們，照着技术站的指导栽甘薯，每亩栽 3,000 棵，当时有两个70多岁的老头刘明成和潘振海，很不以为然，却又拗不过大伙兒，只好勉强照着种，可是看到密密麻麻的小土坑，心里还是不服气。这时刘明成悄悄地对潘振海說：“老潘，我有个法子，咱就栽上几趟更稠的，到秋后再作道理。”原来他想这样来“将密植的軍”。

于是他們偷偷地在每一横趟里多种了三分之一，合每亩 4,000 棵左右，一共栽了 4 趟，鋤地时，社員們看到这几趟稠了些，也沒在意，只是多給下了些肥料。秋收了，两个老头兴冲冲地想来看笑话。他們带了一杆秤，亲自刨，亲自称，結果这一小片地不但沒少收，折合起来每亩还多产 2,000 斤以上。事实教育了保守派自己。这个故事傳开了，甘薯密植的經驗也推开了。

1958年“胜利百号”甘薯大丰收，每亩折粮 1,500 斤。

老朋友的弟弟——多穗高粱

高粱曾經是这里的主要粮食。

过去，我們这兒春庄稼的面积要占耕地面积的 40—50%，其中高粱占一半还不止，而現在，春地面积只占耕地的 30%；高粱，更降到春地的 17% 了。

玉米、谷子、甘薯等高产作物种植的增加，使高粱的种植面积一年比一年縮小。

然而，我們总不能忘記高粱曾长时期和我們同甘共苦的那段年月。

那时，三年两头淹，不旱便是涝。玉米、谷子、甘薯等都很难长好，只有高粱耐旱又耐涝，陪着我們过苦日子。据吳桥老社員范繼元的回忆，解放前 30 多年，玉米只丰收了两回，亩产到过 300 多

斤,至于一般年景,就把套种的豆子加上,也只能收 100 多斤。可是高粱却总能收上 200 多斤。

而且高粱秆高叶茂,在对敌斗争的年代,曾掩护过我们无数抗日的好儿女,到现在,盖房子,烧锅,都还离不了它。

因此,眼看着这位老朋友——高粱的面积一天天缩小,真有点捨不得。正因为这种,我们对于 1959 年新来的这位老朋友的弟弟——多穗高粱,的确非常欢迎。

据说,多穗高粱原产非洲,去年才在河北、辽宁、河南、江苏、甘肃等省大面积试种,结果,比一般高粱增产一半到几倍,千斤亩相当普遍。因此,中央农业部就从河北、辽宁两省调拨了 900 多万斤种子,分配在全国 18 个省市试种。春天,农业部的下放干部来到这里,也给我们带来一部分种子。我们非常珍爱这些自北京来的良种,认真学习了去年各地试种成功的经验,公社党委也全力支持我们,要什么,给什么,下了决心要把它种好。

开始,由胡洼东队选择了一亩经过深翻 2 尺的地,浇了一次透水,施了质量较好的圈粪 1 万斤,又浅翻一次,打成畦田。在畦内施用硫酸铵 120 斤,六六六 5 斤,反复把匀耙细。

因为种子来的晚了些,我们那块多穗高粱到 5 月 2 日才下种,照道理,应该在 4 月 20 日左右下种才对。根据去年各地试种经验,多穗高粱的芽又短又嫩,保证出苗齐壮,是种好的第一个关。因此,我们掌握盖土深度在 1 寸左右,只有一般高粱播种深度的一半不到。播种后不久,下了一场小雨,我们怕地面板结了,芽子顶不出土,又用镢把地面轻轻括起了 2 分多,这样盖土只有七、八分厚,结果出苗很齐很壮。为了试验,我们留了几个没有括去一層土的畦,这些畦里就有很多缺苗,有些苗虽然出了土,但很细弱,虽然后来特别追施了几次肥料,浇了几次水,始终没有能赶上去,这就证明种多穗高粱必须适当浅播。

幼苗长出了片叶子的时候,开始间苗,到五、六片叶子的时候

定苗，行距 1.5 尺，株距 6 寸多，每亩留苗 6,000 棵左右。

根据我們今年試种的經驗，多穗高粱的增产特点是分蘖力强，結穗多，必須足水足肥，达到稈多穗多，才能高产。我們这块地在定苗以后，就追施了硫酸銨 30 斤，促使它多分蘖；当长出三、四个分蘖的时候，又追施硫酸銨 30 斤，促使它稈壮穗多；拔节以后，又追施硫酸銨 30 斤，促使它穗大粒多。除每次追肥后随即澆水外，一看到地干了赶快又澆。由于 1959 年夏天雨水特別少，我們一共澆了 7 次水，到灌漿后才停止澆水。封壟前，每澆一水，就鋤一次，在拔节期同时进行培土。由于抓住了关节进行追肥和澆水，虽然播种晚了些，但每株仍有四、五个分蘖。

多穗高粱莖叶含的糖分多，容易遭虫害，抓好治虫是种好多穗高粱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我們这块多穗高粱地，在苗期，就出現了蚜虫，經二次撒 0.5% 的六六六药粉，虫害就被扑灭了。拔节后，又发现鑽心虫和严重的蚜虫，經過灌心叶和連續三次噴射 400 倍的 6% 可濕性六六六，終于把虫害压了下去，确保了丰产。

八月底，这块多穗高粱开始收获了，据初步估算，亩产可达 950—1,050 斤。

堤东之柳

堤东，是我們公社风光最秀丽的地方。

那里，条条大路，柳蔭夹道；个个村庄，綠柳成林。柳蔭下，放牧着成群的白羊。

更美的还在临黄堤上，那是一条漫长的大堤，堤面已修成寬闊的公路，两旁都是成林的楊柳，一望无际，真象是綠色的长城。

回想解放以前，这一带的树木很少，縱有一些，也被砍掉燒了。每年秋天，黄河水漲，波濤无阻攔地冲击着村庄和堤岸，临黄堤不知决过多少决口，毀掉过多少田地和人家。黄河改道南流以后，暂时安穩了几年。1946 年，它又回来了，我們又瀕临了洪水的威胁。

幸亏这时早已解放了，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就有了对付一切灾害的办法。

1948年起，上级有计划地组织我们造林，在临黄堤的两边，各栽一行柳树，株距3米。在我们公社的范围内，一共栽了7,666株。1949年又加一行，株距5米，共4,600株。

1954年，在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下，堤东200多个青年团员和民兵，由团支书韩月祥领导，到黄河边上，搭起帐篷，吃在那里，住在那里，苦干半月，造起了一道防沙林带。

1956年合作化高潮带来了绿化高潮。临黄堤上，又加植了两行柳树，共6,900株；堤根还“筑上了”一道柳堤，共4,800株。同时还在各村普遍造林，11个村共造林35,000多株。

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大搞植树造林，堤东各村和临黄堤上，很快地又增植了高大的柳树35,000多株。

我们一面造林，一面护林。公社成立了护堤委员会，各个管理区都成立了护堤小组，临黄堤上每隔1里，就有一个护堤人员，负责护堤和护林工作。

自从党领导我们造了林，并加强了护堤工程以后，十多年来，临黄大堤再也没有决过口，保证了堤西人民年年安居乐业。堤东，虽然隔几年还免不了上一次水，但是处处有林，洪水再不能横冲直撞，大大减轻了损失。如白庄白傅根和白傅堂的房子，1949年发大水时，全被冲倒，1958年的水也不小，但村子四周的林木高大了，杀了水势，房屋安然无恙。

造林还有效地固定了风沙。在堤东，紧靠着黄河边上是大片沙滩，括起风来，飞沙象房子那么高，常常把良田埋掉，变成沙丘。如白庄全村110户，442人，过去2,200亩耕地，能种庄稼的只有800来亩，公粮全部减免，还有70%以上的户要吃国家的救济粮。自从造林固定了风沙以后，不但不再要国家救济，1959年夏季就出售

了7万多斤余粮。陆集生产队过去种植面积只有2,700多亩，自从造林固定风沙后，种植面积扩大了1倍多。

造林还带来了巨大经济收益，每年可以打下柳枝做燃料，每斤价值1.5分；还可以打柳条编筐，每斤柳条价值3分，每10斤可编一个筐，每个筐价值1.7元。成材的柳木价钱更高。在临黄堤上，每一里长的林木，每年可打柳条2,500斤，打柳枝1万斤，临黄堤在我社境内共长17里，可产柳条42,500斤，柳枝17万斤。各个村的生产数量更大。1959年上半年，供销社从堤东各村收购的柳条，作编筐用的达38,410斤，外销作燃料用的达30多万斤。1959年7月份的收购量就值835.38元。

柳林的经济价值还不止这些。柳林里，落叶多，柳叶养羊，羊长得又快又好。1958年仅白庄一个村，就在柳树植成的防沙林带里，养了1,200多只羊。

柳林，它不但美化了我们的田园，巩固了我们的堤防，保障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而且还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集体饲养业的先进生产队

牛肥马壮

1958年我们公社一成立，就集中全社的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开展了一个空前的全面大协作，突击深翻地和种麦子，那时全社共有2,300多头牲口，犁地拉车，都是黑压压的一大群，可热闹了。后来任务告一段落，论功评奖，数曹楼的牲口最出色，又壮实又有力气。曹楼队的饲养员，得了一面大红旗，闪亮的红绸底子上，贴着4个大字：“牛肥马壮”。

曹楼的饲养员是谁呢？走到他们那儿去问一问，小孩都会这么告诉你：张孝忠，真能干，喂牛全县是模范。

早在1953年初级社刚成立的时候，老张就当饲养员。1958年建立了人民公社，饲养队的规模更大了，大家还是一致赞成由他负

責。七年如一日，老張把隊里的牲口，照看得象對自己的親人一樣。

平時，他天不亮就起床，除喂牲口外，還掃院子、担水、漚糞，直到天黑，總不歇腳，麥秋忙季，連睡覺也不放心脫衣服，只在炕上躺躺。冬寒季節，他總怕牲口受凍受餓，飯都拿到牛屋裏來吃。

他喂牲口，有七個字的要訣：“草膘，料力，水精神”。他還隨時想辦法，不讓牛老吃一種草。本來地裏種什麼，牲口吃什麼，這是老規矩。但老張却有另外一套調濟的辦法。冬天把黃豆葉、綠豆葉、甘薯秧、處生秧、麥稈等摻着給牲口吃；夏天就把玉米稈、高粱葉、黃豆葉，谷稈摻青草喂。夏天摻麥糠喂青草時，還要用水淘兩三遍才上槽，為的是怕不干淨，傷了牛的腸胃。

不論干草青草，老張總是鋤得很碎，喂時既篩，又揀，弄的一干二淨，才一把一把地往槽裏添，多喂少添，看着牲口吃，一直到全部吃飽了，才停下來歇一會。他說料要拌得勻，牲口才能吃得淨，這樣既節省，牲口吃了又上膘有勁。他把他養的牲口，按體質分成幾類，大的多吃，小的少喂，做到定草定料，定時定量。一類牛一天喂 25 斤，四類牛只有 15 斤。他喂的牲口，從來沒生過病，也沒落過膘。

夏備冬藏，晴天照顧陰天，這是老張掌握的一條規矩。夏天青草多，割的勤，吃不了，就晒起來，留作冬草，草垛兒總是堆得高高的。一間空屋子，也堆滿了碎草；干土更是一堆又一堆，專用作墊圈，兩季也墊不完，春雨秋雨下長了，一連好幾天，牛房卻還是干干的。

為了給牲口喝足水，無論刮風下雨，或冰天雪地，他會看活兒輕重、天氣冷暖，掌握時間和分量；熱天用涼水，冷天用溫水；看到牲口喝足喝飽了，才把它牽回槽。

此外，老張喂牲口還有件出色的事兒：那就是配種的技術。他所喂的牛，有 4 頭是母牛，他掌握了“試、看、問”的判情方法，不讓

母牛先發情不配種，他又用“隔日配，連日配，連續配”的方法，注意保胎保畜。4頭母牛7年之內生了11頭犢牛，頭頭長得一樣壯。

張孝忠就是這樣辛勤仔細地照料着牲口，所以，只要是他負責喂養的，拉車、拉犁都有勁，這對生產的幫助當然很大。由於他的工作出色，因而一再受到上級的表揚。1957年得到范縣模範飼養員的光榮稱號與獎勵；1958年冬和1959年春，又連續得到生產大隊和公社的獎勵，以及報紙的表揚。可是他從來不自滿，並且虛心的表示，一定永遠聽黨的話，和社員們共同努力，把牲口養得象公社獎給他的紅旗上所寫的那樣：“牛肥馬壯”。

青貯飼料喂肥豬

解放以前，我們這裡養豬積肥的人家很少，因為一則怕漲水搬家受損失，二則淤地根本就不大上糞。

建國以後，特別是在1955年合作化以後，養豬的才逐漸多起來。可是，1957年那一年，又因為從外地買進小豬，帶來了疫病，受了一些挫折。1958年秋天，成立了公社，全面大躍進，每個生產大隊都建起養豬場，大搞養豬積肥。全公社豬數達5,000頭以上，主要集中在堤西，堤西各隊平均已達一戶一豬。

在全社所有的生產大隊中，集體養豬搞得比較好的，油坊隊要算第一個。油坊隊的豬場一共養了510頭豬，平均每戶達到2頭。1958年底，賣給國家的肥豬便有180頭（每頭150—300斤），自己殺了吃的就有30頭。

如果要問到我們的經驗，那就是利用青貯，解決了飼料問題。

本來，在廣闊的田野中，到處都是青綠飼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關鍵在於會不會充分利用。而最好的利用法，除現切現喂外，我們認為是搞發酵和青貯。

所謂發酵，俗話叫漚菜，把青葉、野菜、樹葉等弄淨（一定不能

有泥)切碎,裝在向陽的沙缸或池子里,一邊裝,一邊踩,然後再將石頭或重物件壓在上面,再添上水,要使面上的水深超過2—3寸(假如缸里缺水,草露出水面,接觸了空氣,就會霉爛),漚四、五天(多的十幾天),就可以用了。如果是在冷天,就把缸埋深些,並在缸外上半截埋些熱草木灰(鍋底灰),一樣可漚的很好。

有時我們還把野菜混上米糠和谷糠秕子一齊漚,但要分層裝缸,一般100斤草菜混上20斤米糠,方法一樣,味道卻更好。

發酵得好的菜,發香發酸粘糊糊的,有些還有甜味和酒香,豬非常歡喜吃,又易于消化,對孕豬還可以催乳,喂養小豬可以臃肥,少的一天喂7—8斤,多的可到15斤左右,隨豬定量。

再說青貯。1958年我們發動老人、婦女、小孩,還有小學校學生,大搞青貯,一共做了大大小小20幾個坑,12萬多斤,吃到第二年夏天。至於短期的青貯,夏天也可做,20天就成功了。不過霉了的不能用,水分太大的,也得晒干以後再用。

做青貯一定要仔細,首先要選地下水位低、土質堅硬、地勢高的地挖圓坑,大的口徑6尺,深8—9尺,小的口徑4尺,深6尺,平底最好。大的可貯1萬斤,小的五、六百斤,最要緊的是隨割、隨運、隨鋤(1—2寸長短)、隨入窖、隨踏實、隨對水、隨封口,這樣才可以保證質量。

青貯飼料里含有豐富的維生素,開窖以後,有濃厚的酒精香氣,顏色碧綠,不但豬愛吃,大牲口也愛吃。不過,牲口也不會一開始就喜歡,而要慢慢地讓它養成習慣,比如先混些谷秕子、青草或其他鮮菜,吃慣了,它就愛吃了。起先一般40—50斤重的豬,喂3—5斤,後來加到全喂青貯飼料,一頓吃到7—8斤,肥豬一頓吃到10—15斤。我們的那些肥豬都是這樣喂肥的。

“炕雞”和養雞場

我們這裡,過去就有養雞的習慣。解放後,自己當家過日子,

粮食增产,生活提高,上级又提倡发展农村副业,养鸡的比以前更多了,村村鸡鸭成群,户户鸡蛋满筐,为和平的生活,增添了不少幸福的景象。同时,一户喂三、五只鸡,每天得三、五个蛋,一个月就能赚好几块钱,除“掐辫子”以外,要算卖鸡蛋的收入最多了,胡楼有个养鸡能手李兆金,她养了18只母鸡,每天能拣12个蛋,挣的钱比她的工分还多。

收购鲜蛋和孵小鸡,是供销合作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1958年,上级给我们公社的收购任务是6万斤鲜蛋,结果半年就完成了。这里还有出名的“山东炕鸡”,全县共有34个孵小鸡的暖房,我们公社的暖房设在李楼,3天一炕,一次上蛋多的达15,000枚,少的也有8,000;1958年由清明节开始孵,到芒种麦收时完成,一季孵出17万只小鸡,受精率80%,高的达到93.5%;出鸡率70—80%。小鸡的卖价一角钱一只。群众养的鸡,绝大部分是这里供给的,很受欢迎。但是,群众养鸡,习惯用放飼的方式,把群鸡放到村头地边,自由找虫觅食,常常啄坏庄稼,也容易染上疾病,招来鸡瘟。因此,在人口比较多的农业区域或小镇,最好改用棚飼方式,搞集体养鸡场。可是,在人民公社化以前,集体养鸡,是很困难的。

1958年秋天,公社成立了,我们的集体养鸡场也开始出现了。办得最早的是前祝庄、许胡同、曹楼,还有梁庄等几个生产队,比较起来还是前祝庄的办得最好。

前祝庄正街西头,白杨夹道的高墙大院里,有一个养鸡场,4排洁白耀眼的鸡舍,筑在一块七、八分大小的坡地上,小巧玲珑。后坡和地角的4棵榆树和洋槐,绿荫葱茏,象伞似的遮护着它们;在北边高地上,还有两棵小桃树,做了鸡在休息时的栖架;桃树下边是料槽。还有三、五个红瓦盆,里面盛着清水,是鸡的饮料。两位敬老院的老人——祝玉祥老大娘和郝福田老大爷,是它们的嫜姆。鸡场的南、北、西三边是墙,东边用高矮合适的秫秸做成一溜圈篱,凭篱往里一望,一群百十来只母鸡,两、三只红冠大公鸡,活潑

而悠閑地在爭食或漫步，咯咯之聲，不絕于耳。場地光坦坦的，沒有一點難聞的氣味。由於老人們照料得好，雖然在冷天，小雞還是羽毛豐滿，只只健壯。敬老院的老人們，在他們幸福的晚年生活中，又添上一份樂趣，來參觀的人們，為這動人的景象所吸引，好些人都說：“咱們回去也這麼干！”

前祝莊生產隊是我們公社的一面紅旗，它的公共食堂，尤其辦得好。支部書記祝心平，敢想又敢作，他總是千方百計地想辦法，要讓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能夠更大地發揮出來。這養雞場、敬老院和公共食堂的巧妙結合，就是他和這個隊的社員們已經取得的成績之一。

雞舍是我們的巧工匠杜銀君蓋的，就地取材，美觀適用，一晝夜就弄好了，而且很合乎科學道理。一共三排，每排兩大間，3尺深，8尺長，4.5尺高，全部用舊磚砌成，能用很多年。三層“樓房”，非常好看：底層是積糞的，1尺多高；中層是雞房，用2寸多寬的木條隔層，一根根地排列着，當作栖架，夜晚，雞就棲息在這上面。雞糞都從木條夾縫里漏下去，既清潔又積了肥。這層的磚垛，3尺來高，還留着兩指寬漏縫的花牆，使圈內空氣流通、乾燥。冬天北邊有北風，就掛個草帘子擋一擋。雞舍的頂層，也是2尺來高，那是專供母雞下蛋的蛋房，下鋪木板，上墊麥秸碎草，雞在里面能夠安靜地下蛋。頂篷採用麻稈兒壓泥，再加上一層石灰，下雨不漏，又經久耐用。底層有兩個門，便于掏糞。雞房僅留單門出入，下蛋房開了兩個門，雞有進有出，毫無沖突，積肥員按時出糞清圈，撒沙土，換墊草，經常保持干干淨淨。雞舍向南，間間陽光充足，十幾只雞占一間，地方也很寬闊，圍牆擋着冬天的冷風，場內總是保持暖洋洋的。

小雞在這舒服的大家庭里，吃的也不錯。雞場是1958年8月辦起來的，這時青草已經不多，但糧食丰收，有的是糧食加工副產品：穀子、糠皮，還有高粱“身子”（碾成面粉後，篩出來的糠皮）和谷

稗子等等。老大爷老大娘用敬老院伙房的泔水拌料喂，一天三次；冷天則用热水調得温和些，鷄兒更爱吃。总的說起来，这里养的鷄沒生过病，一只也沒毀，都喂得肥壮壮的，冬天也一样下蛋。

就在那一冬一春，这群鷄生了1,000多个蛋，生产队的61戶人家都吃到了。光吃还不算，1959年春天，供销社用以蛋換鷄的办法来推广小鷄时，这里又用鷄場的蛋，換进了100多只小鷄。现在这个集体养鷄場，越办越好了。

“拈辮子”

所謂拈辮子，就是編織草帽辮，是我們这里一种最重要的家庭副业。

“拈辮子”既不需要什么工具，有不費什么力气，別說一般妇女，連六、七十岁的老人，八、九岁的小孩也都能拈。更妙的是，只要你两只手有空，無論白天晚上，有灯沒灯，坐着走着，甚至眼睛在看戏，手里还可以“拈辮子”。它的原料是麦稈，我們叫“麦挺子”。一般长得細一点的麦子，都可以拿它的“挺子”来“拈辮子”，特别是“稠麦”和“小白芒”，长得又細又軟，是好“挺子”。但稠麦只能收挺子，不打粮食。小白芒却挺子好又能收粮食，这个品种在我們这里种得很普遍，所以“拈辮子”的原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我們这里几乎每天都有收購站的同志到各村各队来收購拈好了的草帽辮。

“拈辮子”的收入很好，一个生产能手，如果拈得細，一天可拈26圈（每圈約1.3尺），收入7角多錢。1959年上半年我社供销社收購的草帽辮共有350包，值7万多元，按全社农户平均，每户收入8元左右。扩大到全县來說，草帽辮的收購金額，每年都达到土特产收購总額的30%左右。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計劃开始的1953年，全县收購的草帽辮共計1,732包，值331,500元，1956年实现高級合作化后，增加到4,756包，值1,100,000元；1958年实现了

公社化，工农业全面大跃进，草帽辫的收购数量更猛升到6,493包，值1,672,061元。我们这里编织的草帽辫，一部分出口，一部分销全国各地。1959年草帽辫的编织业继续跃进，上半年全县就收购了8,500包，比1958年全年收购的还多。

草帽辫，今天已经成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一项资源；但在旧社会里，它却是投机商人剥削我们的手段。

据说130年前，莱州府掖县的商人，到范县来做买卖，看到我们这一带的麦秆很细很软，“掐辫子”，有利可图，就派人来传授技术；接着又在距我县不远的现属河南省清丰县的仙庄开办了辫庄。于是这一带的草帽辫都被那里十几家辫庄所垄断。他们看到货多了，就赶快贱价收买；价涨了，就故意压价停收，迫得我们不得不贱价卖给他们。他们低价收，高价卖，纯利润至少达20—30%，高的超过了50%。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忘不了莱州商人的残酷剥削，直到现在，范县的草帽辫在外地市场上还被称作“莱州花园草”，因为范县草帽辫百十年来都贴着莱州商人的商标，以至人们还不知道它的真正出处。

解放后，范县的人民翻了身，范县的草帽辫也翻了身。

1949年，草帽辫开始由国家收购，划分等级，按级论价，凡辫子编得细的、每包仅重40斤的算第一级，重量每增加10斤低一级，一共17级。为了发展生产，国家曾不断提高收购价格。如第一级草帽辫，1953年每包收价为420元，1956年为550元，1957年提高到804.20元。第17级草帽辫，1953年每包收价100元，1956年115元，1957年提高到170元，国营企业的利润只有4%，比以前私商的利润降低了十几倍。同时，为了便利农民交售，到处都设了收购站，我们龙王庄收购站，就有7个收购员，天天骑着车子沿村转，价格合理，交售方便，大大鼓舞了我们生产的积极性，产品的数量不断增长。1954年在我們公社范围内，国家收购的草帽辫仅16包，1955—1957年就增加到100—150包，1958年跃

进到 196 包, 1959 年仅 1—6 月份, 繼續跃进, 达到 350 包, 收購总值 1955 年仅为 8,391 元, 1958 年增加到 30,380 元, 1959 年 1—6 月份, 猛增到 7 万元以上。

在党的关怀下, 在国家的支援下, 自从建立人民公社以来, 我社农林牧副漁五业并举, 不仅草帽辫的生产迅速增长, 而且挖药材、編条筐、織葦席等各种副业也都普遍地开展起来了, 1958 年全年国家在我社收購的土特产共达 528,431 元, 而 1957 年还只有 119,574 元, 一年之中增长了 345.7%, 按全社 8,841 戶平均, 每戶副业收入达 60 元左右, 养鷄、养鴨、养猪、养羊等畜产品以及磨豆腐等当地自銷自用的收入还未計算在內。副业生产的迅速增长, 不仅增加了社員的經濟收益, 而且积累了生产資金,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跃进。

从黄河捕捞到水庫养魚

“靠山的吃山, 靠水的吃水”。我們生长在黄河边上的人, 都懂得点水性, 也多半会捕鱼捉虾。

黄河里的鯉魚, 多少年来就聞名全国。可是在黄河里捕鱼, 也并不容易。它比不得小河小港, 风平浪靜, 爱什么时候捕, 就可以什么时候捕; 爱在什么地方下网, 就可以在什么地方下网, 可以經年累月地作为一个固定的职业来干, 人多也行, 人少也行。在黄河里打魚是要看季节的, 季节不同, 打魚的方法, 打魚的工具, 都不一样。春天夏天, 只能在慢流水的二滩当中, 用“薄滩网”圍着打, 七、八个人能掌握住一只船, 搞得不好, 一天一只船能打上二、三百斤; 搞得不好, 一天只能打 10 来斤。秋天, 水流湍急, 船就不敢下去了, 只能在岸上看准了魚窩用“撒网”捕, 碰得好, 一人一天能捕上 10 来斤, 不好, 一斤也捕不到。冬天, 水浅了, 水流緩了, 才是捕魚的旺季, 在快結冰的时候用“袖网”打, 两只船, 2,000 个袖网, 4 个人, 一天能捕五、六十斤。可是好景不长, 过不些时候就結冰了, 下不了

水，魚也就捕不成了。

过去，我們置不起下黄河捕魚的大船，也置不起各种各样的网，更无法組織一批人来專門捕魚，因为捕了魚就会耽誤庄稼活，顧了庄稼活，就不能捕魚。因此，只有在农闲季节，偶然打上几条自己吃，或是作为临时副业，几乎没有把捕魚当作职业的人。

人民公社建立后，漁业生产和其他各項生产事业一样，也发展起来了，首先組成了3个捕魚小組，其中一个长年在河上，一面捕魚，一面摆渡(使过往行人过河)；两个作为生产队的副业，忙时小干，闲时大干，从1958年9月到1959年7月，这三个小組已經捕获大魚12,000斤，魚苗102万尾，有刀条魚，有豆渣魚，有鮎魚，还有大鯉魚。

我們不但在黄河里捕魚，而且也开始搞人工养魚。在大兴水利的时候，全公社修成了37座水庫，給人工养魚創造了条件。我們捕获的黄河魚苗102万尾，已經养在这些水庫里了。

人工养魚最初是从公社供銷部的一个示范养魚池开始的。

过去，我們这兒誰也沒有养过魚，大家都沒有經驗。供銷部的职工們在困难中摸索前进，为大量开展人工养魚积累了不少經驗。

供銷部的养魚池在龙王庄街南化肥厂的后面，水面面积1亩，水深7尺，四方形，有一条小支渠和渠道相通，引渠水养魚。

这个魚池是供銷社职工利用业余时间挖起来的。挖魚池的时候，正是腊月三九天，天寒地冻，可是他們鼓足了干劲，五天就完成了挖池工程。

魚池修成了，在池内放进了4尺深的水。可是这个池的底層是沙土，不能存水，第二天水都漏光了。党支部号召大家想办法。有人建議在池底抹上一層水泥，一算帳需要水泥15,000斤，不但价錢貴，而且买不到現貨。有人提出了自己造水泥的意見，可是誰也不会！党支部派人到制造水泥有經驗的滑县“取經”，回来后不久，

水泥就造出来了。

我們用自造水泥抹池底的办法是：先在池底池边糊上一層草泥，厚約 1.5 寸，在将干未干的时候，就在上面抹水泥，約一指厚，抹好后打磨五、六遍，隔五、六天再放水，可以做到不裂不漏。

春天，就在池內放进了捕魚組从黄河里捕来的魚苗 5,000 尾。有小魚，还有二、三寸长的魚，每天清早和每天晚上都喂一次，喂的主要是水漂子草、泔水和瓜皮等。

1959 年秋天，魚苗慢慢长大了，大的有一斤多。不要小看了这个养魚的小水庫，它是我們这里的新鮮事物，它使我們有信心根据人民公社农林牧副漁五业全面发展的方針，把全公社各生产大队的漁业生产都发展起来。

商业工作大发展

从县志上看，龙王庄和六集（从前叫陆家集）在几百年以前，就是农产品的集散市場，一般每逢二、五、八或三、四、七就赶集一次。

后来，大概是在 50 年前，这两个集上，开始出现了固定性营业的商店。那时六集有張吉泰、潘月祥、吳春新等几家杂货店、粮食行和小飯鋪。龙王庄也有一家叫孫喜根的鋪子，卖香烟、白酒、針綫、粗紙和腊烛，規模当然很小。

过去，这此商店除了做小买卖以外，还兼营高利貨，用大 3 分的利錢剝削貧苦农民。

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时期，这里已开始有了供銷合作社，主要供应生活資料。比如当时吳桥办的那个合作社，有資金 3 万元（魯西銀行的边币），除了門市，还有油坊、粉坊等副业加工厂。

象現在这么門面大、貨品齐的供銷社，直到 1953 年才开始办起来。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供銷社的营业，越来越大。供銷社的零售点，也就是小商店，从 1958 年大跃进以来

已遍布全社各个生产小队；另外还有流动性的货郎担。同时，龙王庄和六集的集市，也还照样存在。

商业的发展，反映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今昔对比，很能够说明问题。虽然过去这里的商业情况没有什么记载，可是年纪比较大的人，还能记取一些有关的故事。

大约在30年以前，反动派派了一批军队到这里来，明说是抓土匪，其实是想敲竹杠。他们眼里的土匪的标志是：凡是穿洋袜子的，都有嫌疑。

本来，30年前，穿洋袜子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可是在我们这里，却连地主富农，穿的也还很少。当时六集和龙王庄还不容易买到洋袜子来，所以反动军队想出了这个坏主意，却扑了一个空。

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就说洋袜子吧。1954年单只龙王庄供销社就卖出袜子10,486双，到1958年已增加到27,144双。

现在这里的商业的总情况是：首先，生产资料（主要包括化学肥料、农药、水车、双轮双铧犁及旧式农具等）的销售额大大增加了。1956年合作化以前，每年各种生产资料的销售总值不过几万元；合作化以后的1957年增加到152,147元；1958年大跃进，突增到286,898元；1959年1—8月份，又激增到319,057元，比上年同一时期增加190%。其中增加得最快的是化学肥料。大跃进以来，1958年较1957年增加了1倍；1959年1—8月份比上年同一时期猛增2倍以上。以全社耕地面积平均计算，每亩仅化学肥料的施用量，就超过了30斤。

其次，生活资料（主要包括棉布、袜子、毛巾、火柴、食糖、捲烟、酒、肥皂、煤油等）的销售额大大地增长了。1956年合作化以前，每年销售额不过60万元左右；合作化以后的1957年增加到712,119元；1958年大跃进，随着生产的上升而带来了生活提高的新局面，这一年的生活资料销售额突增到1,159,761元；1959年1—8月份是496,212元，比上年同一时期的395,020元，增加了25.6%。

社会主义的商业工作的优越性,主要在于它是为生产服务的,为群众服务的。几年来我们的供销社在公社党委和社支部的领导下,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因而一再受到了上级的奖励和群众的表扬。

1958年麦收的时候,堤东的王楼村,由于上年曾遭受洪水,眼看着就要开镰了,可是农具既不够,牲口也缺草、缺料。供销社的干部了解到这个情况,先到群众中去摸底,发现各户都多多少少存留了一些废品,而这些废品,又正是国家所需要的东西。于是,供销社及时地办了一个物资交流会,一边收购废品,一边供应农具。在交流会上,头一天收购的废品总值就有2,250元,平均每户20元。社员们拿到这笔资金,不但买到了够用的饲料,还添置了大批麦收的农具:80把扫帚,100支杈,350张镰,30块磨刀石。

这次举办物资交流会的效果非常好,别村的群众知道了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于是堤东16个小村,一个个先后都开了物资交流会,不到一个月,供销社就收购了价值32,000多元的废品,供应了大批的生产资料,其中仅水车就有170架。

1959年4月,正是小麦返青拔节的时候,六集那边,突然发现红蜘蛛为害,面积大约有7,000亩。一株小苗上,最多的有30—50个虫,眼看着嫩绿的麦苗,开始发黄了。

上级听取了这个情况的汇报,立即指示供销社去支援。供销社120个职工,马上紧急出动,连夜把10,200斤农药,70架喷雾器运到现场,并和群众一起进行喷射,苦战三天,终于全部扑灭。

他们胜利归来以后,社党委奖给他们一面锦旗,群众反映:这真是社会主义的商业工作。

文教工作成绩辉煌

学校教育

从前,在反动统治时期,龙王庄这一片,一共就只有两班初小,

一班高小，学生还不到 100 人，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地富子弟。教書的混飯吃，讀書的混資格，結果，就象林庄的孙兆祥和張永年那樣，上了六、七年學，連封信也不會寫。更可笑的是，有些當年的“洋學生”，解放後却還是掃盲對象。

1940年抗日民主政權剛剛建立的時候，在那樣艱巨的條件下，黨還是以最大的力量，支持文教事業的發展，當時全區開辦了13班初小，兩班高小，學生700多人。每個村子還辦了冬學。

那時候，教學環境很不安定，日本鬼子曾多次侵襲，可是教師和學生的情緒始終很高，經常在大樹下或坎頭上上課，一發現敵情，馬上出動。他們不但擔任了站崗放哨工作，而且還參加了對地主惡霸的鬥爭。

抗日戰爭時期，這兒還有兩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一件是邊區抗日大學，當時就辦在此地；另一件是1944年下半年，在邊區文聯的主持下，就在我們龍王庄召開過以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中心的邊區文教工作座談會，到會的有冀、魯、豫邊區文教工作者500多人。在會上，討論並明確了文教工作為政治服務，以及學校教育應“教學做合一”的方針。那一次會，開了好幾天，影響很大。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不久，在黨的領導下，全體動員，一方面進行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一方面大規模的參軍支前，徹底打垮國民黨反動派。到1947年形勢逐漸穩定，學校教育也開始走向正規。有課本、有教室，教師也有了初步的備課筆記。這時凡200戶以上的自然村，都辦了小學，高小也增加到4班。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此，教育事業更進一步地發展起來了。初小班和高小班在教學質量上不斷提高，學生人數逐年增加。如1950年共有初小31班，學生1,085人，高小2班，學生83人，到1954年，初小就增加到57班，2,185人，高小增加到8班，365人。

1958年全区全面大跃进,接着又成立了人民公社,从而掀起了教育工作的高潮,到1959年,初小86班,2,966人;高小17班,850人。而且在大跃进中建立了第一所中学,1959年已有6班,360人。1959年下半年,又成立了农业中学1处,50人。现在我们整个公社的在校中、小学生已达4,000人以上。

这些学生在学习中的成绩,是值得我們自豪的:1959年6月,县人委教育局举行全县小学成绩大检查,1—6年级每班抽出10人,集中考试,结果,我們公社的万庄小学,以全部平均分数98,获得全县红旗。

当然,万庄是我們公社办得最好的一个小学,别的学校,在大跃进以来,同样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这种成绩的取得主要是由于社党委的重视,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由于教师和学生們发挥了主动性和积极性。

設想我們到万庄小学去参观一下吧。

可是:不要以为这里的教室只是一些教室,其实它們也都是些小工厂:化肥厂、墨水厂、木工厂、編織厂、装订厂、农药厂、制鞋厂,此外还有理发館、飼养場和小农場。

不要以为这里的学生都是些小孩,他們真能干,全校900多人,每3个星期理一次发,都是由这些小理发师完成的;全校师生所用的备课本、笔记本,一年3,000多册,也都是他們自己那个小小装订厂的出品;他們的化肥厂,已經出产了30多万斤土化肥;制鞋厂已經做出了210双新鞋;木工厂已經修理好30套校具,还做成了两个大書櫃。不要以为这些产品,只是一些小玩意,他們編的柳条筐,拿到集上去,要卖一元多錢一个;他們做的書櫃,每个能卖30元。

要是碰到遊行集会或者开晚会,同学們打鼓吹号,腰鼓、口琴齐奏,实在熱鬧。这許多乐器都是出售他們自己的劳动产品所得的收入买来的。

劳动农民的子弟,当然都会种庄稼。学校的小农场,虽只有8亩地,但是四季常青,蔬菜可以自给。

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以后,这儿就实行了全校食宿集体化,这是一个新的工作。高年级的同学们,充分发扬了互助友爱的精神,帮助老师照顾低年级同学,有的在寒冷的冬天,抱着小同学睡觉,有的替小同学穿衣、扎腰带、盛饭、洗碗、补衣、做鞋。教师们尤其辛苦,比如李洪太老师,一个冬天就很少脱下衣服睡过觉。

因为全校师生,在公社党委和学校支部的领导下,认真苦干,他们连续获得上级奖励的六面红旗,十三面光荣镜;支部书记刘树生,两次被派到北京去观摩学习;教师王守忠和学生万兆喜,也曾以模范少先队代表的资格,出席了济南的全省会谈。

农民业余教育

据1951年的调查,我们公社一共有青壮年文盲10,789人,八年来农民经过在业余学校的学习,先后达到高小文化程度的有3,789人,初小文化程度的2,750人,但还有4,250人没有完全摘掉文盲帽子,也就是说,我们全社的青壮年男女,已有25%以上达到了高小毕业的水平,35%以上达到了初小毕业的水平。

一提到我们公社的农民业余教育,立刻就使人想起堤东的刘楼来。

刘楼有200多户,1953年才开始建立民校,当时只办了男女两个班,每班50人;到1955年,要求学习的人数,越来越多,就增加到4个班,190个学生。他们利用夜晚、歇晌,或者田间休息的时间,利用课堂、田头,或其他地方每天学习三个半小时。常年不断。由于这样地辛勤努力,现在全村已基本扫清了文盲。人人能看报,个个都会记笔记。

刘楼扫盲工作能够做得那么出色,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支部书记和村干部都能带头学,认真学,比如刘永德本来也不认

字,当时是武装队长,后来勤学苦练,被选为全省扫盲模范,并担任了祝庄管理区的主任。

有了干部带头,群众的学习劲头更大。现在刘楼的青壮年男女有的当上了大队会计,有的当上了幼儿园的保育员,这些具有高小或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是在农民业余学校训练出来的。

1959年起,刘楼又开办了新文学训练班,现在的学员中,妇女越来越多。因为自从建立了公社,开办了食堂,她们也有时间学文化了。许多中年妇女,都会用拉丁字母拼音。他们(她们)的学习经验,将在整个公社普遍地推广开来。

截至1959年7月止,全公社扫盲毕业人员的情况是:升业余中学的8人,担任县级以上干部的13人,担任公社(区)级干部的27人,担任大队(管理区)级干部的91人,担任生产队(村)级干部的363人。由于他们学习了文化,他们的工作能力已大大提高。

俱 乐 部

我们这里的农村文艺活动,从抗日战争时期起,就开始活跃。那时候“青抗先”、“模范班”、“姐妹团”、“儿童团”都爱唱歌,也都会唱歌,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宣传队,也都教我们唱歌,有时还教我们演戏。1942年开展民主斗争时,一开会大家就唱抗战歌曲,有时还唱根据本地事实编成的歌曲,如“打倒李子良(恶霸)”、“打倒刘洪恩(地主)”,就是这样的歌曲。

记得有一次,是在查黑地、倒粮的斗争时期,堤东的农会干部刘永德,根据真人真事编了一出叫“李子良贪污记”的戏,十分生动,演了好几次。当时刘楼正在斗争地主刘洪恩,有个佃户刘云怀,最初有顾虑,打不开情面,看了这个戏,触动了他过去的伤心事,第二天他就改变了态度,揭发了刘洪恩许多的罪恶,使他不得不倒出了黑粮,其中光豆子就有13布袋(每袋约100斤)。

这以后,各村的俱乐部活动,在党支部的重视和关怀下,普遍

地发展起来。其中历史最久、成績最好的，要算堤东祝庄管理区，这个俱乐部，是1954年建立的，最初有基本成員16人，里面分音乐(主要是洋琴)、墜子和相声3个組。以后逐年扩大，1958年公社成立后，陣容更加强了，全部人数发展到一百多人，其中文艺股有78人，包括話剧、相声、快板、鬪子、洋琴、墜子、歌詠等，宣傳股有47人，包括黑板报、广播筒、讀报組等，体育股35人，有运动場、籃球、单杠、双杠，还有編写股、图书室(藏書1,800册)。另外还有一个舞蹈队，一个幻灯放映組。

他們的活動很多，規模較大的演出，每月一次，小型說唱，七天一回，有时在村子里，有时就在地头田間。演唱的內容，主要是結合中心任务，进行宣傳鼓动。比如有一次，在刘堂村他們自編自演了宣傳節約粮食的戏“三碗剩飯”。观众中有个叫刘建武的，當場就感动地表示，他一家6口人，以后每天坚决節約粮食18两。又有一次，在丁沙窩村，宣傳早婚的害处，事后一个叫石怀义的16岁的青年，本来已經决定要結婚的，因而推迟了婚期。

卫生工作

从前，这里水旱連年，疾病特別多，患病人数經常在90%以上。解放以来，特别是大張旗鼓地除四害以后，环境卫生有了显著的改进，从1952年到1958年这一期間，患病人数逐年减少。公社成立后，大規模地进行了除四害运动，患病人数进一步降低了。

下面就是我們这里从1958年开展除四害运动以来所取得的成績的累計：

消灭麻雀	124,896	只
消灭老鼠	98,768	只
消灭蒼蠅	846	斤
消灭蚊子	156	斤
堵鼠洞	246,872	个
泥雀窩	848,216	个

另外，結合着积肥运动，我們建立了 1,224 个公共廁所，还修建了許多澡塘和井亭子。

現在，請到我們这里来參觀吧，大部分社員家里都做到了“五洁四无”，出現了夏天沒蚊子的新現象。个别村，如祝庄，光榮地被評为全县卫生模范村。

劳武結合全民皆兵

范县的民兵有着光榮的革命傳統。

早在 1933 年左右，我們这里的劳苦大众，就在党的领导下，組織了地下武装，并定名为“黄河支队”，曾直接和反动派作战，后来并根据上級的指示，远征山西。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黄河支队一度回来，隨即又开赴抗日战争的前綫，那时已正式編入八路军了。

由于黄河支队的影響，抗日战争一发生，在党的领导下，我們的民兵組織，很快就建立起来，特别是 1939 年 3 月冀魯豫軍区成立后，领导加强了，民兵組織的发展也更加迅速了。

初期的民間武装組織，还不叫“民兵”，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各有各的名称：

第一种是 18—25 岁的青年組織的，叫做青年抗日先鋒队，简称“青抗先”。

第二种是 25—35 岁的青壮年組織的，叫做“模范班”。

对参加这两个組織的成員，要求都比較严格，必須成分好，思想好，而且又是自覺自願加入的。他們的責任也比較重，不但要負責保卫地方治安，監視地、富、反、坏分子的活动，防备敌寇汉奸的破坏扰乱，而且还要經常配合部队作战，如护送伤员，押解俘虏，帶領担架队等等。他們都装备有步枪和手榴彈，班长以上的干部还有短枪。这些武器，上級发下的很少，絕大部分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

如 1947 年 7 月、8 月、11 月，石王野村的“青抗先”和“模範班”，前后三次和黄河对岸鄆城偷过来的汉奸、伪軍作战，每一次都把敌人打得大败而逃，以后再也不敢进犯，因而获得上級的物質奖励：計有步槍 6 支，制服 26 套。

1943 年秋后，刘樓的“青抗先”和“模範班”配合我軍主力部队，先后参加了鄆城和阳谷的战争，他們勇敢地向火綫上运送彈葯，并控制了几个城乡之間的据点，預防敌人的增援和紅槍会的暴动。

刘樓的“青抗先”和“模範班”，在民主斗争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从 1942 年减租减息开始，他們就无情地揭发和检举了混入我軍政机关的不法地主刘洪典、刘明尊、刘明哲 3 人，虽然对方用尽各种阴谋手段，甚至企图暗杀村干部，但最后终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把那些地主一一镇压了。他們的战斗精神和成績，曾一再受到上級的奖励和表扬，邻近各村对他們也非常佩服，如丁沙窩、李庄等村，在土地改革斗争中，都曾請他們去支援、助威。

除了“青抗先”和“模範班”外，还有一种組織，就是“自卫队”，大凡沒有或不能参加“青抗先”和“模範班”的 18—45 岁的男子，都参加了自卫队，自卫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抬担架，运输彈葯物資，挖掘战壕等，至于 18 岁以下的少年兒童，絕大多数都参加了兒童团，当时每个村庄和大道上，白天由兒童团站崗放哨，晚上由自卫队打更巡夜，并由“青抗先”和“模範班”放流动哨。所有这些組織，都屬村武装委员会的統一指揮。青年妇女，也組織了姐妹团，同样参加对地主富农的斗争，不过最初沒有武装，屬妇女救国会的领导。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勇敢的民兵同志們，繼承着光榮的革命傳統，繼續向一切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了斗争。

比如 1954 年春天，六集民兵干部張学道，在集上发现一个形跡可疑的人，正向黄河方向溜走，他立刻帶領 6 个民兵，跟踪追赶，一直赶了 18 里，到了河边，对方又逃到水里去了，于是他們 6 个人

下水,两个划船,在水里又追了4里路,终于把这个人捉住。原来这是一个盗窃犯。

又如1957年,越狱犯曹纪叶,潜藏在胡楼胡金兰家,从不露面,第二年到底被他的邻居马略善发觉。马略善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民兵,当时并不声张,到了半夜,民兵突然破门而入,将这个逃犯逮捕归案。

1958年,我们的人民公社成立了,全社男女青壮年,在毛主席的“劳武结合,全民皆兵”的号召下,在社党委的具体领导下,迅速的組織起来,阵容更加强大,参加民兵組織的人数,达11,398人,占总人口的32.4%,其中女民兵4,443名,并集中了一部分优秀的男女青年成立了野战民兵营,一边練武,一边劳动。

野战民兵营是1958年8月25日,也就是我们公社成立的前一天建立起来的,下屬两个連,8个排,30个班,另外还有一个金鋼姑娘連。由吳繼孔任教导員,韓月祥任营长。营地設在社党委附近的胡洼村,全营人数最多时曾达700人,以后因为参军和下放减少了一部分。

“劳武结合”是野战营的基本方針,每天早上練武一小时,晚上学习两小时,白天在田間集体劳动。

从1958年冬天到1959年春天这一段时间里,为了突击完成深翻地和薰肥的任务,民兵营的全体指战員,都在地头扎营,白天黑夜連軸轉,大干苦干加巧干,深翻土地3,000多亩,深度1.5—3尺,其中有一部分高产試驗田,翻的更深,薰肥3,000多亩,每亩20—30万斤,另外,还挖成美景水庫一座,面积5亩,深6尺,造护堤林200余亩,并經營了450亩小麦丰产試驗田。

在軍事技术上,經实彈射击,58%为优秀(其中30%为滿堂紅),32%为良好,10%及格;一般軍事动作,人人都会。这一系列的表现,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甚至吉林、黑龙江也有代表团前来参观,专区兵役局曾特地在这里召开了現場會議,省委检查团还写

了表揚这个野战民兵营的大字报。

1959年春,这个营有130名青年,应征服兵役,个个質量好,够标准,临走之前,他們打井两眼,植樹两万株,留在营地作紀念,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种了一行又一行,三年回来长成樑”。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野战民兵营的指战員們,始終干劲十足,特别是貫徹“八字宪法”,推广先进措施,一直走在全公社甚至全县的前面。比如密植小麦,每亩高达50万穗左右,为了保証水肥的充分供应,在返青、拔节、灌浆等关键时期,日夜輪流澆水,做到歇人不歇車;当时曾有部分麦田,发生倒伏現象,但經大力搶救,基本上都挽回了。夏收时,小麦获得全面丰产,其中有84亩平均亩产高达1,032斤,成为全县紅旗,在工作中出現了如赵純柱、范秀兰等許多男女劳动模范。1959年7月,在全县麦收总结大会上,这个野战民兵营被評为模范单位,获奖两挺机关枪。

我們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

我社党委会和社委会,对于公社的集体事业,一开始就給予了很大的重視,投下了很大的力量。从公社成立起,公共食堂、托兒所等等,便一个个很快地組織起来了,到1958年年底,全社共有5个嬰兒室、12个托兒所、52个幼兒園、12个妇产院和15个敬老院。另外,81个生产队,队队都有公共食堂。

應該承認,在最初創辦这些集体福利事业的时候,誰也沒有經驗。可是經過边做边学,慢慢地也就熟习了。比如堤西祝庄的公共食堂,一年来先后得到上級好几次表揚,县委的机关刊物——跃进杂志的創刊号上,就專門写文章推荐过它。

还有龙王庄的妇产院,万庄的托兒所,胡洼的敬老院和嬰兒室等都办得很有成績,范县日报上曾一再登照片,写文章,鼓励和表揚过它們。

公共食堂处处有,为什么西祝庄的特别出色呢?

这主要是因为这个食堂的全体工作人员,在支部的领导下,充分地解放了思想,发挥了敢想敢做的精神。比如,这一个食堂不但安上了土自来水管,而且还修起了地下水道。这样,清水源源流来,污水又不断流去,另外还砌了个高大的烟囱。一个厨房,具备了这些条件,清洁工作就有了基础,再加上几个炊事员同志特别爱干净,时时打扫,就可以经常保持清洁。所以这一个食堂一连得到了好几次的卫生模范奖。

这一个食堂的工作人员不但爱干净,还特别爱美。饭厅里,刷得雪白,这边是画,那边是诗,另一边墙壁上还贴着新文字拼音表。桌子擦得那么雪亮,使你不忍心随便把脏东西放上去,如果你去的早,要等一会,那就先瞧瞧壁上的诗画吧,保证不会让你感到不耐烦。

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他们的伙食实在办得好。就拿1959年来说吧,春节3天,一连吃了5顿饺子,其他节日,比如正月十五,二月初二,五月十三,六月初一,不是包饺子就是蒸卷子,炸丸子,做大包子,六月初一那天,光鸡蛋就吃了110个。

不要以为他们不注意节约,这个食堂,恰恰是节约粮食工作做得最好的一个,它从1958年6月一成立,就注意了这件事,每天都有计划地在主食品里面撿蔬菜、撿芋叶,农忙吃得稠些,农闲吃得稀点,因此他们在粮食供应问题上,始终很稳定,还得到过节约用粮的奖旗!

当然,他们所得的奖旗,还有很多。而由于公共食堂办得好,群众所得到的好处,那就更多了,下面的这首诗,也就是群众意见的集中反映:

自从挂上食堂牌,嫂子大娘笑开怀。
产妇病人有照顾,妈妈不怕闺女来。
老人吃的更丰美,顿顿都有好小菜。

社員吃飯象客人，婦女不再轉鍋台。
大哥不再嫌飯晚，大嫂不再打小孩。
人人都說食堂好，省力省錢又省柴。
解放勞力搞生產，生產戰綫添人才。
秋收秋種得紅旗，都說虧了食堂開。

這首詩，雖然很好懂，可是還有兩點需要解釋一下：第一是“嫂子大娘笑開懷”。據統計，經常在這個食堂吃飯的，共有60戶左右，這60戶的嫂子大娘，一年來由於離開了鍋台磨坊，而多做了75,600個工分（10工分等於一個全勞動力的勞動日）；第二是“省力省錢又省柴”。據統計，自己單燒每戶每天要用柴草10斤，60戶一年共得20多萬斤；而公共食堂每天平均只要300斤就夠了，一年可省柴草10多萬斤，折成現款就是2,000多元。

這個食堂在收支帳目上，一向採取民主公開的辦法：三天一小結，十天一大結，一月一公布。至於糧食的定量標準，更是及時告訴大家。

另外，食堂對病人、客人和產婦，都分別有照顧的辦法。比如對產婦，每人單發20斤米、30斤面、50個雞蛋、2斤紅糖和2斤挂面，自己領去做，或由食堂代辦都行。這就難怪要使“嫂子大娘笑開懷”了。

因為有這許多好處，所以當1959年5月，支部書記祝心平向大家征求對食堂的意見時，55歲的馬成敬說：“我要在這個食堂吃到底，那怕送我一口金鍋，我自己也不開伙了”。有三個孩子的婦女王富珍說：“公共食堂的伙食吃慣了，現在我只會下地干活，不會回家做飯了”。征求意见的結果是全體一致表揚了炊事員和管理員。

其實能使“嫂子大娘笑開懷”的事兒，還多着呢。婦產院、幼兒園、托兒所、嬰兒室，哪一樣不使嫂子大娘從心里高興，從心里感謝黨的好領導！

記得龙王庄妇产院剛剛开办的时候，产婦們还顧慮重重，不愿意来住院，那头一个叫楊秀荣的，經過好几次說服动員，才算勉强进来了，入院分娩以后，母子都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到后来平安出院时，她还流着眼泪捨不得走。

从这开始，妇产院就出了名，以后只嫌床位太少了。

不过妇产院的出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們这里有一位优秀的助产士，她叫馬二妮，已經 57 岁了，可是干劲很足，服务态度尤其好，有一次，堤东正发大水，石王野村恰巧有个产婦要生了，而且还是难产，深夜来請馬二妮，当时大水快要进門，大路上早已淹的几尺深，又沒有船，怎么办呢？馬二妮想起党对她的教育，想起一个医务工作者对病人的責任，于是，冒着危險，坐在水缸里漂到了石王野村，当夜，一个可爱的胖娃娃，在大风大浪的咆哮中，平安降生了。

据 1958 年下半年的統計，全公社的妇产院，一共接生了 460 个小孩，男的 239，女的 211，个个都白白胖胖，大小平安。

小毛毛出了妇产院，很快就可以进嬰兒室。本来，不到半岁的嬰兒，对嬰兒室來說，是很不容易照顧的，可是媽媽們要下地劳动呀，所以，請到胡洼的嬰兒室去參觀一下吧，在口字形的一大排小床上，尽躺着些半岁左右的小娃娃，有的在喝糖水，有的在玩小人小馬，有的却睜着两只大眼睛，連玩都还不会玩呢！

至于幼兒園，請到万庄去看看吧，这里虽然只有 58 个小孩，可是单只講玩具就有一百多件，这都是聰明的保育員徐桂蓮，利用休息時間自己做出来的。

看到活潑的孩子們，圍在大树底下，天真地唱着“毛主席說我是好宝宝”的歌兒时，便不能不使人联想起以前的情况。从前，当媽媽下地时，小孩便跟着在地里玩，玩得跟泥人一样；至于还在吃奶的嬰兒，就只好躺在旁边晒太阳了。

怪不得孩子們的媽媽都說，这人民公社是跟俺妇女办的，尽給

妇女办好事。

当然，这话还说得有些不够完全，不然，敬老院又怎么解释呢？

我们全社一共办了 15 个敬老院，比较起来，是胡注办的最好。

一方面领导重视，群众支持，比如住房子，敬老院的那栋坐北朝南的大房子，可说是全村第一，比如吃粮食，总是尽量让老人们吃细粮，1959年春节，全村居民节约了 300 斤麦子，送给了老人们。

另一方面老人们的政治觉悟比较高，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贫农出身，虽然都已经六、七十岁，甚至还有 85 岁的，但是除了下雨下雪，他们总要主动地找点活干，尽量地减少人们对他们的照顾，比如烧柴，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去砍的，房子漏了，他们也自己动手去修补。另外，这 46 位老大爷和老妈妈，还种了将近 10 亩地的菜园子，金瓜（南瓜）、西瓜以及各种各样的蔬菜，绿成一片，足够自给。

在旧社会，最受欺负也最可怜的是谁呢？妇女、小孩和老人。今天，在新社会，在我们人民公社，他们（或她们）却是最受照顾也最幸福的人了。因此敬老院又叫幸福院，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幸福院的老人们学习的时候，最爱写下面这两句话：“人民公社实在好，国泰民安亿万年”。

衷心感謝共产党

——結束語——

走出范县新城，穿过春景湖，繼續往东南，前面有一支 16 丈高的大烟囱。烟囱下，不远处，是一片翠綠的丛林，掩盖着几座紅磚紅瓦的小建筑，幽靜、美丽，那兒就是龙王庄。从龙王庄村再往东，跨过临黄堤，直到黄河岸，方圓 40 多里，遍地是庄稼，到处有牛羊，这都属于我們龙王庄人民公社。

站立在长城一般的临黄大堤上，举目四望，堤东綠柳成蔭，堤西田園如圖。再过几年，这里将建起成千成百的小工厂，大大小小的畜牧場。广大的田野上，現在已經出現了拖拉机，今后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我們一定要把 10 万亩土地全部深耕、改良，要把現在的試驗田的各种高产纪录，統統变成全部播种面积的平均亩产量。到那时，粮食作物的增产潜力将大大發揮，經濟作物和油料作物也将迎头赶上，而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制造业，势必随着粮食增产的不断跃进而迅速发展。堤东的柳树，堤西的果木，都会跟密植的小麦似的地，遮住夏天的太阳，盖滿所有的村庄。到那时，黄河不再泛濫，水庫遍地开花，公社的漁业生产总值，可能在全部生产总值中占上一个很高的比重。

美好的願望一定会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因为我們有偉大的共产党的正确领导，30 年来我們在党的领导下不断进行斗争的經歷，使我們的信心越来越坚强。

是的，30 年前的往事，我們决不会輕輕忘記，那时候，地主、恶霸、反动派，狠狠地压在我們的头上，欺騙、敲詐、剝削，誰还能好

好地去种庄稼!再加上黄水連年漫滩,更造成了所謂“犁无三寸土,亩产百斤粮”的衰落景象。人們吃不飽、穿不暖,貧病交加。老人們总结过三句話:“春感冒、夏瘧疾,秋冬到了拉痢疾”,患病率每年都在90%以上。許多人长年逃荒在外,根本不想返回家乡。

自从来了共产党,我們才看見了太阳。在党的领导下,打败了日本鬼子、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了地主恶霸,实现了土地改革,接着又开展了互助合作和农业增产运动,1958年更胜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踏上了奔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这是一段令人兴奋的历史,但也是极其艰巨的,作为老根据地的人民,我們記得最牢,也体会得最深。

远在七七事变前后,党就一批又一批地遣派它的优秀党员,冒着生命危险,耐心而又亲切地启发我們,帮助我們翻身鬧革命。不久,根据地建立了,党又遣派許多重要负责同志,突破敌人的封锁綫,来到这偏僻的魯西南,和我們同艰共苦,并肩作战。到今天吳桥的群众还記得,当时一些重要负责同志跟他們一塊劳动,以及对他們講述革命和抗日的道理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又领导我們重建家园,治理黄河,向自然灾害进行不懈的斗争。

記得1949年建国的時候,我們虽然已开始組織起来,初步进行了一些技术上的改革,可是由于长期的战争,和原有生产条件的落后,平均每亩粮食产量,不过130斤左右。而堤东一带还常常受灾,需要外来粮食的支援。最初几年,国家共发放生产救灾款45万元以上。

而今天,当我們欢欣鼓舞地迎接国庆十周年的时候,我們整个公社的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已經提高到550斤(1958年产量)。10年来增产达4倍以上,平均每年增产40%,实际1958年大跃进增产了一倍半以上。我們这个原来貧困的地区,現在已經成为富裕的余粮区了。自1954年統購統銷以来,年年都超額完成了征購任

务。黄河回归故道已經 14 年，14 年中會經歷过多次洪水泛濫，但是人民的河防工程，早已今非昔比，临黄大堤始終穩如泰山，14 年来从未决过一次口。更令人兴奋的是，自从建立了人民公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工农商学兵，在全面跃进；农林牧副漁已普遍发展，我們已經建起了 10 多个小工厂，創造了好几种农作物高额丰产的紀錄。

我們的公社还很年輕；我們的成績，和将来可能和应当取得的成績相比，还微不足道。然而我們不但一再获得上級的鼓勵，还引起了县内县外各兄弟公社、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的亲切关怀。自 1958 年下半年至 1959 年 8 月，先后到我們社里来參觀的达 10 万人以上，来开現場會議的达 100 次以上，有的来自省外，甚至国外。他們給我們带来了不少錦旗、光荣匾和其他珍貴的礼物，也带来了兄弟般的友誼。1958 年 12 月，我們龙王庄人民公社曾光荣地参加了全国农业展覽会，还被选为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設先进单位，并由公社党委第一書記徐德謙同志，前往北京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設先进单位代表會議。在会上他亲眼見到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會議胜利閉幕时，还获得了国务院周总理頒发的奖状。

我們这个过去是黄河边上的穷乡僻壤，我們这些过去受尽了天灾人禍的庄稼人，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而且还会有更加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明天。飲水思源，衷心感謝共产党，并願繼續努力，爭取以更多更好的成績，来报答我們最敬愛的毛主席。

